

出版说明

本书是费边社领导人乔治·柯尔论述费边社会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写于1941年,1943年4月和5月先后两次印刷出版。

在本书中,作者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即使在战争情况下仍有坚持社会主义宣传的必要,以便把社会主义作为战后重建的指导思想。当然,作者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而是要达到所谓“思想、使人人有同等机会、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民主自由”等四种目的的社会主义。作者甚至还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而仅仅是实行社会主义目的的一种手段,因而就不是一切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实行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作者主张在战争情况下首先应推行“战时社会主义”,这就是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动人民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它由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工具变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具;把燃料、电力、运输、生产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军火工业等关键性工业部门和银行系统置于政府手中,使之为国家利益服务,由政府付给企业租金;工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仍在企业中任职的雇主由政府支付薪金;把土地从私人所有转变为公有,以便为战后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高效率农业创造条件;工人不再是私人牟利的工具,而是为所有的人谋福利的公有事业的合伙人。作者认为,推行“战时社会主义”是为战后实行社会主义作准备,因此推行“战时社会主义”的工作做得越多,也就是

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

其实，柯尔所提出的“战时社会主义”与其前任韦伯所提出的“市政社会主义”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都不是为了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所追求的充其量不过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作点点滴滴的改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45至1951年工党执政期间，艾德礼政府对内实行的一些改良主义措施以及对铁路、煤矿等工业部门实行的国有化，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费边社“战时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改良主义措施和国有化并没有导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没有因此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而成为国家的主人，相反，倒是帮助了有关垄断企业度过了战后困难时期，有助于巩固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费边社所鼓吹的社会主义不过如此而已。

本书是柯尔在担任费边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时写就的，因此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现在我们把它翻译出版，供研究费边社会主义参考。

1983年7月

目 录

前言	1
一、人物与政治	3
二、基础社会主义	22
三、工业纲领	42
四、为每个人提供机会	59
五、一个艰苦挣扎中的世界	83
六、走向民主	104
七、现在就行动起来	125
费边社	150

前 言

这本书是 1941 年 8 月开始写的,当时我在达亨顿学院的费边社夏季学校里。在那里,人们坚决要求开展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以战时条件对社会主义作的新解释为基础;有感于此,我才着手写这本书。当时纳粹德国对苏联刚刚发动了进攻,报上天天报道苏联红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对纳粹的屠杀进行的既宏伟壮观又似乎是破釜沉舟的抵抗,我们完全处于又激动又高兴的情绪中。我们感到,虽然在这个阶段,我们几乎不能做任何事情去直接帮助俄国人进行斗争,但作为社会主义者,向他们伸出同志之手,并尽我们所能地在我国开展一场能为赢得战争与和平而起适当作用的社会主义运动,无论如何总是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事。

由此而出现的東西远不止这本书。从 1941 年秋季以来,费边社在加强其争取社会主义复兴的工作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新成员,扩大影响;地方费边社一直以我们所能组织的速度蓬勃兴旺地在全国各地发展着。在题为《向英国社会主义者简述未来》(A Word on the Future to British Socialists)的小册子中,费边社根据目前的状况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信条所作的解释;而我个人则在我的第二本小册子《费边社的过去和现在》(The Fabian Society, Past and Present)中讲述了费边社当前的主要活动。

使本书到达公众手中所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要长得多,这给我提供了对本书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订的机会。不过,一个突出的事件,即论社会服务设施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公

之于世，却发生在我的手稿已经全部脱手之后。实际上，本书论述社会保险那一章（《为每个人提供机会》）是在 1941 年写成的，而以后一直没作过任何改动。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章和贝弗里奇提案在很多地方极度相似，如果不加说明，就可能有剽窃之嫌。本书的这一章，也是在费边社的社会保险委员会给贝弗里奇委员会提出重要证据以前写的，而且是完全独立写成的。这份证据以后以《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 为题出版，在其很多特点上，同样也和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的提议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

我还要说明，我的这本书，不管其书名如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应视为费边社的机关出版物。我碰巧当了费边社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但本书表达的观点却是我个人的，并不代表费边社。不应当把我的观点当成“正统”的费边主义；因为我高兴说明的是，费边社并没有正统派，它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思考的团体。本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自由的”一词的。当然，我希望大多数费边主义者将同意我的大部分观点。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希望，而不是断然主张。我还要再提出一个进一步的希望，即希望那些明确同意我的书的精神的人能参加费边社，并能通过费边社为通情达理的社会主义工作，帮助把它培育成英国人民所迫切需要的精神革命的动力。

G·D·H·柯尔

于亨顿

1942 年 12 月

一、人物与政治

不久以后将会有一天，纳粹战败，恐怖消除，战争宣告结束；到那一天，如果你我仍然健在，就将不得不重建英格兰。我说“英格兰”，因为我是一个英格兰人，并且我觉得惟有英格兰才是我的家乡，是我寄予殷望的国土。但是，尽管我说的是“英格兰”，我的意思却不限于此，也必须不限于此。因为我们怎么能够希望在一个不幸而混乱的世界上建设一个幸福的英格兰呢？假如我是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或北爱尔兰人，我一定会首先考虑苏格兰，或者威尔士或者北爱尔兰（也许是整个爱尔兰）。假如我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俄国人，那我会首先考虑我自己的国家，考虑我所向往的那种生活，和我希望我的同胞能够过上的那种生活。但是，不管我的思路从何处出发，归宿于何处，我都应该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要考虑别的国家。因为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不论我觉得自己是哪个国家的公民，我的国家的命运同整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紧密相联的。

我希望我不一定要以这样广泛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因为这样很难思考。如果对于别国事务毫不思索，而要为英格兰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并寻求一种途径使我和我的同胞能努力把梦想变为现实，那将是十分困难的。至于英格兰究竟应该如何治理，或者我们应该如何着手重建备遭战争蹂躏的英格兰，要对此打定主意，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然而，当代已经发生的事情，甚至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已足以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光为自己打算，我们是不能成功的。由于我们不同其他国家商量如何制止希特勒的侵略

——就是说，由于我们未能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组成强大的足以使希特勒不敢发动进攻的共同战线，我们几乎给国家带来真正的毁灭。这个失着使我们至今还陷于痛苦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清楚：除非在反击希特勒的战争中，我们同时也能制定并实现某些有效的计划，使全欧洲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处于和平与友谊之中，我们还是逃脱不了这种痛苦的。

这样，我们不仅必须照管专属我们自己的事，还必须参预欧洲和全世界的事务。但是，尽管这样做是对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主要责任还是同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务相关联的，因为除了我们能竭尽全力帮助打败纳粹以外，对世界上其它事情我们却不能有很大作为，虽然我们能够做许多事情来影响英格兰的事态。倘若我们能洞察我们的行动对别国公民的意义，倘若我们能认识到我们和他们是同一共同任务中的同志，那么我们在英格兰就能把我们应做的事情干得更好。但是除了实际的战斗之外，我们行动的机会主要只限于在自己国家之内；因此我们主要只能希望通过我们在本国的行动去影响世界。

但是我们真能做点事吗？许多男男女女都会说，象现在这样的時候，他们真是一筹莫展，无事可做。当然，我不是说真正无事可做，因为他们大多数人目前就在十分勤奋地工作。他们在军队里，在国内防务机关，在军工厂和矿山中，在商船上，或在无数其它组成整个作战活动的部门中工作。他们也可能还在继续从事他们和平时期的普通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些工作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由于他们的许多同事都被调去参与同战争更直接相关的工作，他们比平时更要辛勤得多。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是异常勤奋的。当我们真有几小时空闲时，我们会觉得的确该休息一下了。可是如果本书读者真的和我想的一样——我确信许多人是

如此的——那么一旦机会到来，他们就不会那样安于休息了，因为要真正达到休息的目的，需要某种心灵上的宁静。而近来每当我休息时，各种各样的忧虑烦恼就会一齐涌上心头，使我不能得到真正的精神上的平静。毫无疑问，要想暂时摆脱这些感情倒是可以办到的——把自己沉湎于另外一些事情中。例如，跳舞、听美妙的音乐或根据个人爱好做些能使自己完全陶醉的事情，以便从活跃的思想中暂时驱除各种烦恼。但这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为兴奋的情绪一过去，烦恼立刻又会来纠缠。而由于曾在一段短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忘掉了它们，它们会变得更为强烈。

毫无疑问，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经验的体会要比别人深刻得多，无论如何，我们中的一些人对此深有体会。但我相信，近乎我们所有的人或至少所有一般正派的和敏感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此有所体会。它能够在我们并不很清楚地意识到的情况下影响我们，引起一种焦虑之感。这种焦虑或使我们坐立不安，脾气变坏，或使我们产生一种追求兴奋的热望，或使我们不能象以往那样熟睡和做美梦。我确信，在我们感觉孤独和在孤独中感觉惧怕时，这种经验对我们的影响最强烈。

当然，我们的担忧和焦虑能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在大部分时间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操心通常被称为“政治”的这类事，因为在绝大多数男男女女的思想中，政治只起很小的作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在操心自己的生活中以及丈夫或妻子、子女、父母及朋友们这些亲近的人的生活中将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想知道并操心的，不仅是那些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中现在正在发生或在大战结束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也是在战斗、军火制造、空袭以及撤退宣告结束而我们又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时，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现在想知道和操心的是我们的工作。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能够回到以前的工

作岗位上去吗？被强迫关闭的小商店会重新开张吗？我们过去在其中工作的工厂会重新接纳我们吗？我们被毁的房子能为我们重建得象以前那样或者更好或者不如以前吗？战后我们会在哪里生活？我们可能做什么工作？在绝对的意义上或是和我们的邻居相比，我们的处境会好些还是会恶化呢？而且还有，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到底想干什么？战后的英格兰会跟我们以前居住在其中的英格兰一样吗？或者有所不同，如果不同，不同又在何处呢？

绝大多数男男女女通常都是在一种变化甚微的老一套生活中消磨岁月的。在生活的进程中，他们只做几个对他们的幸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决定，例如，从事何种职业、嫁谁娶谁，是忍受生活的摆布还是怀着改善命运的希望冒冒险。但这样的决定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即使不论好坏做出一些这样的决定，也是在几乎不加思索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一旦做出，它们通常就决定了我们的很长一段生活进程，使我们在一个固定了的环境中生活，而我们则竭尽所能地去适应这个环境。在大部分时间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个环境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年岁越大，改变这种环境的能力通常就变得越小。

然而目前，这种情况不再适用。我们可能还是在依然如故的日常老一套中生活，也许有过之无不及。但我们并不希望老是过这种生活。我们正在使这种生活发生一些变化，也许是我们已经抛弃的旧生活常规，或是与其相似的生活常规，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不可能了解未来——我们的未来——将成为什么样子，尽管在平时多数人认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一个不再为我们确定界标，甚至不再为我们确定我们可借以找到道路的路标的世界中，这种对未来的无知使我们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

我已经说过，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在我们感觉最孤独时

对我们的影响也最强烈。但从肉体上讲，感觉孤独完全不同于处于孤独状态。在一大群人中，一个人能象是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感到十分可怕的孤独。孤独的问题并不在于肉体上的单独状态本身，而在于缺少伙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家庭和朋友为伴，他们也是我们在某种固定而有规律的事业——例如赡养家庭、培养共同的爱好或推进共同事业——的伙伴。但是，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已忍痛离开这些我们所熟悉的环境，停止这种交往，或者即使我们仍身在其中，也感到它们的基础在我们的脚下摇动。不管我们在书信中真心实意地讲我们感觉如何好，过得如何愉快，工作之余往往有一种令人苦恼的疑惑。归根到底，这一切导致什么？对我们来说，一旦政府和将军们停止把我们当作军事游戏中的兵卒使用，情况会怎样？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而我们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会允许产生这种荒谬的混乱呢？

于是，我们那些关于自己的未来、个人的生活以及家庭和朋友们的生活的考虑就把我们引向更广阔的问题——“政治”，而不管我们是否以此称它。但就在这一点上，孤独感最容易影响我们，使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思维。在帐篷和兵营中的人们会互相交谈家乡趣事，展示爱子照片，或在有信心时向那些在背井离乡中趣味最相投的同伴倾诉个人的窘困。同样的事情也会在防空洞中发生，或在工厂夜班纪律松弛时发生。或者十分偶然地在素不相识的人旅途中凑到一起恳谈时发生，虽然他们并无重逢之意。但是据我判断，这种谈话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个人及私人的事情的，而极少是关于政治的。或者更准确些说，那些关于政治的谈话来自报纸，并且只限于一些表面现象的泛泛空谈，而不是真正的交换意见。人们从报纸得到一些诸如这里或那里管理不当、这个或那个部长不称职、此地或彼地需要一些变动等消息，然后在闲谈中传播这些消息，而并不认为这些消息真正重要，或从个人来讲也并不认

为自己负有任何与之相关的责任。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每个人。有政治头脑的人到处都有,帐篷中、军营里、商船上、工厂里及酒馆里都有。但他们人数甚少,绝大多数人谈论及思考私事要比谈论及思考公众的事情认真得多。

在特定时刻,女人谈论政治要比男人认真得多,因为战争时期的政治——食物配给、衣物配给及大多数“政府控制”的形式——所造成的实际问题对妇女来说比对其它任何一部分人更紧迫。从某种程度讲,平时的作用已颠倒了:妇女在战时变得更富有政治性,而男人则相反。但绝大多数妇女也只是互相发发牢骚和交换随机应变的办法,而并不认为这是些她们应用政治方式来对待的事情。

男人在本性上被定义为“政治动物”,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对男人来说,生活在团体中是必须的。很难找到在长期孤独生活后而仍然快乐的男人。闭门独居是最可怕的惩罚,因为从本性上说男人是爱好社交的,并且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和别人讲话比自言自语要容易得多。独自思考是一门很高超的艺术,它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是异常困难的。但不论人们通常如何看待“富有政治性”,属于男人本性的“爱好社交”和“富有政治性”是很不相同的。“富有政治性”似乎意味着一种把团体共同事务的管理权明确地操之于手的倾向。从这点上讲,绝大多数英国人当然不是政治的,或者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是政治的。

其后果是,在普通男人和妇女发现他们不得不从考虑他们自己及家庭的前途而变为考虑他们应当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时,他们往往感到束手无策。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中,他们会认为这个环境是合理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但现在他们不能这样认为了,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所了解并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已被连根拔起。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并且由于他们从不惯于

认真对待政治,也不知现在该如何去考虑政治,因此他们即使开始对他们所遇到的这样的事情交换真正的看法,也感到莫大的困难。当他们探讨这样的题目时,他们继续交换第二手的报纸上登的琐碎小事。他们能够相当轻松地谈论个人的事情并能直言不讳,因为一般地讲,关于这些事情,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处境。而在政治事务中,他们则不知道这些,他们的大多数肤浅的谈话对自己或对方都没有真正的意义。

确实,我们英国人在这些日子里成了惊人地不问政治的人民。我们过去并非一贯如此。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在工人阶级居住区内,几乎每一家酒馆都是一个进行热烈政治辩论的中心;在农夫的“小酒店”中为了争论辉格党和托利党^①的政策是否正确,几乎大打出手;无选举权的人民对待政治问题要比今天的绝大多数选民积极得多。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宗教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力量,而普通人则以一种似乎是来自上帝的热情坚持他们的政治观点。我们英国人是有曾经为政治自由而战的伟大传统的,并且以我们作为民主事业的先驱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我们的议会是“议会之母”,在政府管理艺术与政治自由方面,我们仍然惯于把大多数外国人看作我们的晚辈。但是,近来这种热情已从我们身上消失了;我们中的大多数在认为这些事情理所当然的时候,就停止为之伤脑筋了。即使在考虑政治时,我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别人的事而不是当作自己的事。我们仍然聆听政治家们关于自由与民主的谈话,但我们大多数人已不再认为保卫它们是自己的重要事情。我们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了,或者说,一直到战争爆发都是这样。甚至目前,我也没有看到太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变得对政治稍微认真

^① 辉格党原指十七世纪英国反君主和教会专制的斗争中苏格兰方面的同盟者,后成为主张改革和增加议会权力的自由党。托利党原指十七世纪爱尔兰内部被没收财产、剥夺权利而争取复旧的反英势力集团,在英指十七世纪的保皇派,后改称为保守党。——译者

一些。

我想，这种漠不关心可以从一些同我们一样的国家中人们在征服自然的威力方面取得的成就本身中找到部分原因。生产财富的能力增长得如此地快，以致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已经不必再只争夺生活资料了，而这是早期为生存而斗争的标志。虽然有阶级制度，相当部分的新财富还是渗落到人民的主体手中。甚至在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时期中，穷人在物质条件方面就已经有了相当惊人的好转。衣衫褴褛的儿童或成人少得多了；四处游逛、蓬头垢面、明显营养不良或有缺陷的人少得多了；“穷困潦倒”或自尊心丧失殆尽、前途茫茫的“醉汉”少得多了；那些即使能使我们产生怜悯之心但也使我们对普通百姓产生厌恶之感的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的人以及那些社会反对者少得多了。社会苦难已减少，甚至变得不那么突出了。除了相对来讲个别地方，若非故意挑剔，社会苦难现在几乎觉察不到了。这一变化部分是由于苦难的真正减少——这是工资、劳动条件、社会服务以及知识和教育水平改善的结果，同时也部分是由于现代世界有了更高的技能把苦难隐藏到不让人注意的地方，即隐藏到为那些疾病缠身者、残废者、神经脆弱者、年老无靠者建立的社会机构中，隐藏到我们过分发展的城市中的无人问津的贫民区内。但事实仍然是，纯粹的肉体痛苦已经减少，而随着这种减少，在那些生活富裕的人们心中，坚持为底层穷人提供一个较好机会的热情也已丧失殆尽。因此，正是这个已经取得的进步本身减弱了社会继续向前的决心。

然而，这决不是事情的全部情况。帮助苦难者的那种冲动的减弱，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明这一点，因为在街头目睹要比从书本或讲演中得知苦难的存在更容易激起这种冲动。亲眼看见不幸的衣着破烂、满面饥色的儿童，比仅仅阅读关于他们的读物要令人感动得多，特别是当这些儿童的数目确实减少了时更是如此。在眼鼻

感官受到的刺激减少时,这种出于纯粹人性的冲动就逐渐变弱,而人们对那些已经无须看到的苦难也就变得更加麻木不仁了。但是政治观点绝不是完全出于人道的:它除了是同情心的问题以外,还是权利的问题。

在这里,热情同样减退了。这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民赢得了他们所要求的选举权,并发现它并不那么重要。与其说拥有选举权是特殊权利,还不如说没有选举权是极大的耻辱。并且,如果有谁要剥夺人们的选举权,他们会起而保卫自己的权利,但只要这种要求没有受到挑战,就不会使他们珍视选举权。除了使政治热情减退的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社会制度表面上固定不变的性质。面对最近三十年左右的大量社会立法,这样说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但这却是事实。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前,甚至尽管战前几年中出现了劳工骚动和主张扩大参政权者的激烈活动,大不列颠的整个社会制度却仍然显得稳定而又牢固,以至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他们这辈子中制度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1914至1918年的战争曾一度搅乱了这种稳定的感觉,但当德国战败而英国社会制度看来完整无缺时,这种感觉再度抬头。人们再次认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制度当然会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下去,并且也多半会在他们的孩子一生中持续下去。

在欧洲的其它国家中,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但我在这里讲的是大不列颠,特别是英格兰。1931年的危机对欧洲大陆每个国家的震动要比对我们猛烈得多。随着德意志共和国的垮台以及希特勒的登场,不安全的感觉得到处蔓延。而大不列颠却几乎安然无患地渡过了那场危机,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英国社会结构所承受的震动。尽管纳粹主义的崛起使普通男女感到不安,并且如果给予正确引导的话,他们会投身于有效的政治活动中去,他们仍然对正在发生的事不甚了了,也没有被激励起来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日益

增长的危险。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仍然对政治漠不关心，即使他们对安定环境的信心已经减弱，也还继续靠着这种旧的假设过活。

从任何意义上讲，在这样一种观点——即人民可以不必去操心政治，因为政治并不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已不再是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人民还继续相信这种观点呢？我已经暗示过，无论如何，从根本上讲，这部分地是因为缺乏领导。但是为什么没有领导呢？我相信，这部分是由于那些意识到对经济不满的社会阶级中的才智正在日益枯竭，并正在转移到现存秩序中的行政及技术岗位上去。这自然是由于生产技术不断变化而需要许多更有技术的人到“职员”岗位上去；也是因为公立中学教育的发展使有才智的儿童极容易脱离体力劳动阶级而上升到职员岗位上去。这些变化夺走了体力劳动工人中未来的佼佼者，而置他们于更无领导的境地。而那些这样转到“管理”部门去的人，决不会抱怨提拔他们的制度，而大概总是成为这个制度的拥护者。假如他们留在体力劳动工人的队伍中，他们将会设法借助政治或工会的领导来表现自己。鉴于技术和行政的状况，他们只好在工作中自我表现，并且一般都不认为有必要染指政治。此外，如果他们真的在有限的程度上参与了政治，他们也会倾向于保守，因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相当富裕，或者自认为如此，而政治变化看来似乎将意味着受制于他们曾从中崛起的那个阶级。

这种局势恰恰适应了那些主张保护现存秩序的人的心愿。商界及政界的统治阶级并不希望人民变成积极的保守派，因为那样他们就会试图驾驭保守党。保守党的领袖们需要人民的选票，而并不需要他们在两次选举之间参加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局面比下述情况对他们更有利的了，即剥夺普通工人领袖，把国家中很大一部分有能力的人的兴趣从政治方面引到别的方面去。只要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他们就会对他们继续以“正确的”保守路线进行

统治的权力感到放心——他们实际上所做的正是这样。

我想,很明显,这种能力所依靠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现存秩序的经济基础是稳固的。如果它不是稳固的,那种剥夺人民的天然领导人的社会挑选进程的后果就不是“正确的”保守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因为当那些非政治的能人发现经济情况变坏和自己的状况及收入受到严重威胁时,他们会为保卫这些东西而变得凶暴起来。他们把那些企图领导遭受苦难的工人的人看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要求强硬地镇压诸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工联主义等此类的运动。这可能在此地发生,但至今并无机会使它发生,因为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稳定的经济基础并未受到足以使其上层建筑动摇的震动,或者换言之,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技术和行政人员的主体感到严重不安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由于经济崩溃而失掉工作之类的事情。迄今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说,在战争爆发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战争进行期间,仍然没有发生表面上很容易显示出来的这样的事情。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有许多人对战后即将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一些目前就身受灾难的人也对战后的未来感到不安。但是,目前的灾难与不安所困扰的,与其说是那些拿薪水的技术人员及行政人员,还不如说是那些小企业的所有者。被剥夺了微小资本及生意联系的小店主、小商人或小作坊主容易成为无助的受害者。而拿薪水的人,除非年岁已大,重新求职的希望要大得多。只要工作职务相当充分,他们的日子会过得相当不错。他们不象小商人或小雇主那样只有一个单一的不稳定的依靠。

这些小商人和小雇主在政治上是得不到丝毫帮助的。他们并不是一个紧凑在一起的阶级,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具有政治头脑。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去领导或影响别人,即使他们大批陷于破产,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从潜在性来讲,技术人员及行政人

员难对付得多。他们一般来讲更有才干,更年轻和更富有朝气;他们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也重要得多。只要他们大体上继续对政治毫不关心或持冷淡态度,整个社会的政治热情大概就仍然是低落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一旦确信他们靠之过活的制度的基础在脚下摇摇欲坠时,他们在政治上就会积极自卫。而不论他们站在哪一方——不论是为尽力支援受到威胁的经济秩序而借助于法西斯主义,还是与一些人合伙企图以一种不同的秩序来取而代之——他们的活动都将是十分难以对付的。

除了失去政治领袖的人民趋向于业务工作外,还有其它因素使政治活动大量减少。其中有在数量上和种类上不断增长的廉价的娱乐活动,尤以电影为最;有上下班日益遥远的路程,这使家庭除周末外只是个宿舍而已,而工厂成为下班铃一响即急忙散伙的地方;有无线电广播,它只是把新闻和谣言传到家中,而不是使人们到酒店或政治集会上去;有报纸,其中的大多数处心积虑地在真正的政治内容上变得空洞无物而代之以大量琐碎的事情;有更加忙碌的现代生活,它使争辩和讨论的余地更小了;还有宗教信仰减弱了,特别是做礼拜的人少了。这一切是如此之多,对于多数选民来说,选票简直一钱不值,而对于为数不多的有政治觉悟的人来说,对广大群众施加影响要比对较小的团体施加影响困难得多。

在所有这些影响下,英国人民的政治精神减弱了。但是我确信,在很短时间内,它定将重新振作起来。它之所以能减弱而没有带来灾难,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基础在当时还是稳固的,所以不管大多数人在政治上积极与否,生活能大致照旧(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现在这些基础已不再是稳固的,而是很不稳定的了。由于这次大战,大不列颠已经失去了它的富有阶级重要收入来源的很大一部分海外投资,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国外市场,将来即使能重新获得这些市场也是十分不易的;还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船舶。由于军事部

门对劳动力的需要,已经使那些不那么为战争所需的工业下马了,而供给的短缺正在使大量个体商贩破产。高额税收对那些获取高额利润的人来说是容易负担的,但对那些由于战争条件而使收入剧减的人来说却是沉重的负担。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人们对此尚未清楚看到或完全意识到。即便战争现在就结束,也不会象 1918 年以后发生的情况那样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由于目前没有战争早日结束的前景,压力逐月增强,似乎很可能的是:大不列颠将作为一个与今很不同的国家出现,社会秩序的基础也必将重建。如果这样的话,政治将非常直接地影响每个人的希望,谁也不能摆脱。政治兴趣及政治活动将普遍恢复。但是,用何种形式呢?

机会将是巨大的,但危险也大。如果我们毫无准备,降临的危险将极大,而机会则甚微。如果因我们没有事先共同考虑我们将要干什么,从而草率行事,我们就将听任那些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深思熟虑并结合在一起的小集团的摆布。其中重要的是那些大的资本主义托拉斯和联合企业,它们在战争中已经在计划将来如何保持和扩大它们的权势。另一方面,象共产党这样的一些小集团也将是重要的,尽管它们的政策莫名其妙地动摇不定,它们却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能够指望追随它们的人会随着普遍混乱现象的增长而增加。法西斯分子也可能是重要的,尽管他们现在销声匿迹。我认为,未来的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将不是奥斯瓦德·摩兹利爵士(Sir Oswald Mosley)^①的追随者,而是在大企业的支持下从保守党的队伍中产生出来的。实际上,所有不依靠来自人民并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意见而依靠意欲控制多数人的少数人所认真制订的计划——依靠煽动而不依靠民主——的那些力量,都是重要的。

^① 1931 年脱离工党,另组英国法西斯分子的组织黑衫党,1940 年曾被英政府拘留。——译者

这就是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好而不得不面对战后普遍混乱时将会出现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之中的民主主义者来说，做准备并不仅仅是为我们将来要建设的社会制订蓝图的问题——尽管这一任务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使我们自己做好准备的问题。如果机会一旦来临，我们就抓住它并为民主的目的利用它，那么我们就必须使人民做好准备，而不仅仅是准备一个计划。我们必须在人民当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既使他们理解将来要执行的任务，也使他们有决心把这些任务执行到底。我们决不能让民主在这样的借口下沉睡，即必须先赢得这场战争，否则我们将无可挽回地失去和平。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大战以来让左派政治活动陷入销声匿迹的境地是灾难性的。我知道有许多借口。全国及地方政治选举的停止，使以前主要投身于选举活动的大部分组织和宣传力量在战争期间偃旗息鼓，这好像是很自然的。在并无竞选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保留一个代表呢？又将如何为他筹集资金呢？特别是工党，由于它接触的是选民的主体而不是积极的工人政治团体，其活动几乎完全是选举性质的，因而随着战争的爆发而销声匿迹。举行信徒会议并不能代表那种活动，除非信徒能够把集会的鼓舞人的精神传递给人民的主体。而一旦不再进行活动，或者甚至不再试图进行活动，举行集会也会失去鼓舞人心的作用。人民的主体知道在政府中有社会主义者，但工党的存在却几乎被遗忘了。

我同样了解，那些在战前曾非常积极地致力于工党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的男男女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全神贯注于重要的战争任务了。他们忙于国内防御、撤退工作及各种其它重要的战时活动。他们可以以工作之余再无时间为理由，说明地方工党和社会主义的组织由于没有他们的参加而支离破碎并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可以这样争辩；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管他们受到的

压力多大，能够接受这一托词吗？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准备接受这一托词的。我正在战争需要的紧急工作岗位上象大多数男人一样地努力工作。安排写作此书的时间，甚至花时间去考虑如何写此书，都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得到一个可以容忍的和平，我或我们之中的任何人为什么要赢得这场战争呢？我同意打败纳粹主义必须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因为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但据我看，赢得这场战争和赢得和平这两个目标并不是真的可以分开的。正如我们此时此地必须开始重建被炸毁的工厂及为无家可归的人民重建住房一样，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时工作的效力，我们必须开始重新组织工业，并以一定要对战后生活有所影响的方式重新安排国家生活。在许多地方都有一种强烈主张“战时社会主义”的气氛，这种战时社会主义既包含了真正社会主义的种子，也包含了法西斯极权主义控制的种子，因为十分相同的结构是可以被用于全然不同的目的的。此时此地，社会主义者争取实施一些被认为能扩大战时生产和以要求同等牺牲来提高人民情绪的社会主义措施，是完全合法的。另外，不论在何地，他们尽其全力防止“战时社会主义”被利用为法西斯主义的工具和被用来否定大不列颠正为之而战的理想，也是完全合法的。

国家控制的一项具体措施是引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归根结底是一个作为其后盾的权力问题。如果增强超越个人之上的国家权力，那么由谁控制政府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只要政府对大资本家集团唯命是从，国家政权实际上就只是这些集团的政权，并成为垄断资本家压迫的工具。而由真正反映人民意愿的国家政权掌握的同样权力，则是民主的权力。这后一种政权，对赢得战争来说，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因为它能够全神贯注地朝着这一目标进军，而不会由于既得利益者的压力而分神。

然而,在一个有效地以民主方式治理的国家中,谁将控制政府的问题主要是一个戒备性的和有效地使之倾听人民意见的问题。尽管议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并且在议员构成中也有某些不妥之处,但是已经证明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工具,因为甚至在战争条件下,议会仍能一直保证某些不同意见的公开申诉,并且能够迫使政府公开维护议会所提议采取的措施,只要这些措施能够在战争需要的借口下秘而不宣。假使在议会的背后有一个积极的地方组织,不断地提醒和检查政府每一部门的情况以及每个私人机构——政府通过它来决定工作——的情况,那么议会就将成为一个更加有用的工具。

目前,这种检查不是有效的。这主要是因为,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国土上,地方政治运动已经销声匿迹。从改善战争组织工作的质量以及为即将到来的创造和平和重建工作做准备这两方面看,使这些地方政治运动恢复日常活动是值得大大努力的。如果我们是民主而战,那么我们就不能让那些能最自在地偷偷摸摸活动的人都自行其是。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逐日检查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它同样是关系到人们进行这场战争的目的的问题。正如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这场战争是由于资本主义未能正确地组织这个世界而导致的结果。如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期间,不允许既得利益集团为所欲为的话,如果不允许为少数人而不是为多数人设立大资本家联合企业的话,如果世界不是由于这些大联合企业的阴谋而陷入三十年代早期的普遍萧条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希特勒就决不会在德国取得政权,并且也就不会有战争。这场战争是随着苦难而来的神经机能病引起的;而这种苦难并不是生产能力不可避免的不足所引起的后果,而是灾难性地滥用迅速膨胀的资源引起的后果;而这种滥用则是由于企图在二十世纪变化了的情况下,坚

持那种可能满足了过去时代的需要而十分不适合当代条件的经济组织形式而引起的。这种坚持是民主国家未能运用政治权利使经济制度为公共目的服务的结果，即使在它们已经取得了正式的政治权利之后也是如此；民主国家的这种失败是民主推动力衰退的结果，并且很明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失败对于人类安全与美满生活的希望仍然是灾难性的。

那么，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坚持这样的看法：我们绝不能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去恢复宣传社会主义。因为我确信，我们若不能成功地把建立社会主义作为战后重建的基础，我们就注定要倒在作为仅有的唯一可供选择的法西斯主义的脚下。我们迄今为止所熟悉的任何类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恢复的可能性都已荡然无存。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在两次大战之间未能防止把我们拖入这场新大战的灾难性的萧条与失业而遭到谴责。并且由于战争，这一制度已和作为它的保护者与合作者的政府紧紧缠绕在一起，以至于从此以后，除了作为政府的伙伴外，它已不能自立。但是，与政府携手共进并进而运用政府的权力来维护自己利益的资本主义，却正是法西斯主义；并且我们也已经注意到，这种混合而生的组织注定要把我们引向战争。

那么，如果政府依然如故地为了使工人处于被统治地位而不可避免地与大资本家集团结为同盟，我们就必须变更这个政府。但是，除非趁目前机会尚存之际，制造出一种自由的公众舆论，能对政府施加压力和使政府变为反映公众意志的工具，我们就变更不了政府。政府就是一个工具，是为那些控制着它并利用它为个人目的服务的人服务的工具。事实证明，政府不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然而，为了得到这种服务，既得利益集团是组织起来了，而人民则没有。社会主义者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否则将会灭亡，就象目前在德国与法国社会主义已经灭亡一样。我

们不能等到战争结束再去组织人民，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将在来得及组织人民之前就败于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之手。它们早已组织起来并一直如此。它们能够秘密地组织，而民主只能用公开的办法去准备与组织，因为它们所需要的工具极少并且易于掌握；而民主的工具除去那些对民主事业充满信心的普通男女的勇气，智慧与决心以外，再无别的什么。

这里所建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者应当立即恢复宣传活动并为即将来临的斗争公开组织起来，也包括他们必须怎样做这些工作。对付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强大之武器是信心，是普通男女那种为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而献身的精神，因为它使生活富有意义，并使政治斗争摆脱平时的妥协与权宜之计那老一套。今天的民主主义者需要重新获得社会主义先驱者的那种热情。他们为社会主义而尽力奋斗，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优越的经济组织形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今天这种热情之火已大大减弱，以致探索它的男男女女（有许多这样的人），在探索过程中很难领会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工党了。于是，他们便转而崇拜奇怪偶像，或者参加语言动听的似乎有理的运动。

我们为什么让这么多不知所措的好意，在那些并无现实内容并且除说空话以外并无任何成功希望的运动中白白浪费掉呢？为什么大多数政治领导人这样苟安、乏味、害怕不同意见，以至于拒绝接纳而不是欢迎那些准备站在他们一边的人呢？无疑，我们中的一些人，即工党的老“忠臣”，确信只有工党是代表某些坚实力量的，而其它的则除了愿望和模糊的理想外什么也不代表。我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尽管象我们一样批评工党没能在目前的危机中有效地引导人民，却知道只能把工党作为各种争取社会进步力量的团结中心，别无其它选择。他们明白这一点，因而仍然是工党的忠实成员。但是工党只作为团结的中心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发出战

斗的号召，并且欢迎那些真正有决心响应这一号召的人。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工党目前正在做的。相反，正在让社会主义宣传沉睡，甚至以一种排斥他人的怀疑态度而不是以欢迎的态度接纳新的成员。

我们必须改变所有这些状况。我们必须走出去，象我们的运动的先驱者那样，重新宣讲简单的社会主义真理。当人们不知道明天可能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维护那些古老的不可改变的真理：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只有靠和睦地、兄弟般地共同努力工作才能希望得到安全，才能希望充分利用我们的共同遗产。我们必须使人们懂得，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在持久公正的基础上处理世界事务，他们才能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还要使人们懂得，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只有在他们保证使他们的共同财产用来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成为攫取利润的垄断者——他们用以少为贵、以多为贱的办法来抬高物价和进行剥削——的玩物时，他们才能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我们必须在人民之中重新创造一种精神，一种使人们准备好为一个超越他们个人生活的事业忍受一切的精神，因为这一事业使他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并且使他们感到，在全部事情中，他们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浩瀚的汪洋大海中的点滴水珠。

我们必须重新创立社会主义运动，把这种运动作为一种道德信仰，而不仅是作为经济上喜爱这种社会组织形式甚于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表示。因为除非这样做，人们是不会以那种能够排山倒海的热情与精力来为我们工作的，尽管他们可能说赞同我们。我们这一代正在寻找信号，寻找行动的号召。但我们至今，除了因为怕使政府为难或使保守党恼火而发出安静的信号外，没有给他们任何信号。终止这种停战现象吧！如果我们要以民主的方法全力以赴地去击败希特勒，我们就不能这样静坐不动。

二、基础社会主义

我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这样称呼自己了。我很早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因为我所看见的周围世界，从我一开始观察它就似乎充满不正义和缺乏良好的组织去增进人类的幸福。我是一个幸运儿。我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在一个好学校里受教育，父亲给了我为自己打算的一切机会。他虽然是个保守党人，并且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均分配一切”，却崇尚自由。我很快就认识到我的机会是多么特殊。我因而开始奇怪，我为什么受到这样的偏爱。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是，没有任何正当的原因。我一得出这一答案，就开始要在会给每个人象样的机会的基础上改组社会。

这个愿望很快把我引向社会主义，并从此一直是我的社会主义信仰的基础。因为除了在以人权平等的设想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我过去和现在都未能发现怎样给每个人象样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应当是平等的。平等这个词本身毫无意义。在哪些方面平等？在聪明才智、身体素质、道德品质、办事能力等方面，或者在这些特质的任何结合上——如果有人能把各种特质组合得那么千差万别的话——显然无法平等。社会平等学说完全不同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人人平等的说法。它意味着所有的男人，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女人，都能被给予同等的机会，让他们发展他们所有的全部美好的东西，过上相当幸福的生活和愉快地同别人生活在一起，因为一个人的幸福和愉快是和其他人密切相关的，使个人幸福愉快的事物也会帮助别人幸福愉快。

当然，只靠同等的机会是不够的。一些人将失去机会，从而使他们的生活一团糟。他们将为此受到一种自我失败感的惩罚。社会并不会仅仅因为他们失败了就再惩罚他们。除了人人有同等机会外，我们还要怜悯那些没能利用这种机会的人，不管这是否是他们自己的过错。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并且自我开始思考政治以来就一直意味着，对所有的社会成员，不管他们是善还是恶，是强还是弱，社会都应为其提供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使之能够保持身体健康，生活相当舒适，并使他们能够设法把孩子教养得以后尽可能拥有改善生活的同等机会。没有一项社会措施能给那些不幸生长在一个不好的或不幸的家庭里的孩子提供真正的同等机会；但是，社会可以尽力做到不因父母的缺点而惩罚孩子。我没有幻想最完美的社会组织形式能使人人健康和幸福。但是，也不能因为认识到事物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我们就不做我们能做的一切。

为所有的人提供同等机会和保障人人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这两个想法，把我引向了社会主义。我想只是稍晚些时候我才有了第三种想法——我的态度中一直有这种思想，但最初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第三种想法就是民主思想。这个思想在我的脑海里是和自由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本能地把它作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两种思想来考虑。我的民主概念意味着，不仅每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应当有在公共事务中起其作用的同等机会，而且这些事务应当安排得容易些，以使尽可能多的人能在其中起积极的作用。另外，这个社会还应尽可能地鼓励公开讨论公共事务，并让人们拥有为公共及私人目的组织起来的最大的可行的自由。

这种民主自由概念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扩大。其结果是，对我来说，它就意味着，社会应当被安排来鼓励分歧，而不仅仅是容忍分歧。它应使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去致力于创造一个令人满意的

人类社会，并在一些非常广泛的区域内，不仅在爱好和习惯上而且在主张上彼此不同的人越多越好。因为民主进步来源于对立观点和主张的冲突。在一个自由日益增长的社会，今天的少数派会成为明天的多数派，强制要求思想或行动一致是灾难性的。这种思想，象一切真正的思想一样，是有其限度的；因为在考虑使社会团聚在一起的方式方法上，必须有某种基本的一致。但在健康的社会中，这种基本的一致几乎用不着寻找而会自己建立起来，因为过分强调一致会导致消灭个性，这比很少坚持一致的危险性要大得多。

因此，在我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主要就是这样三种——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也可说这样四种——思想，使人人有同等机会，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还有民主自由。你将注意到，很多人想像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就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应当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的原则，在这里一字未提。没有提到它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以及我想也对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我上面说的那些目的的手段。整个社会应当拥有生产资料这一命题，没有绝对的效力。的确，我完全能够设想出这一命题不适用的各种社会，同时我认为很难设想一个社会应当这样拥有全部生产资料。然而，我设想不出一个社会不应该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有保证的基本生活水平和尽可能多的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是目的，是所有正派的人应当一直期望和试图促进的目的。生产资料公有是实现这些目的的一种手段，主要适合于你我正生活于其中的这种类型的社会，但它并不是不管时间和地点，在任何意义上对任何社会都有道义的必要性的。

当然，我说的这些目的，无论在什么社会也只能达到一部分。它们是我们追求和尽力去争取达到的目的。鉴于人的现状是这样

的，我们不能期望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或建立一种完美无缺的自由民主。我们能期望，在我们的时代，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但是，我们既不能期望这种水平象我们企求的那样高，也不能在未来的长时间内使全世界各族人民达到类似的水平。我们所能期望的，只是迅速消除我们中间各种形式的贫困，从而使我们的全体人民更加接近于平等的机会并使人民中间的民主精神大大增长。然而，这是些高尚得足以为此而工作的思想，如果我们在临终时能够说我们为实现这些思想忠诚地工作了，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了那些一直在为此而工作的人，那么，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真能感觉到的话，这倒是一种阐述令人感到激情的信念的平静方法。假如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我应当做的，我的情感也会告诉我这是我想要的。在一个充满不必要的不公正和灾难的世界上，如果我不做些我能做的事去协助把事情安排妥当，我是不会幸福的。或者至少，如果我不为此做一些事，那怕我做的比我能做的少得多，我也是不会幸福的。我的良心是向着我的同胞的；这个良心要和我个人的自私及懒惰斗争，因为自私及懒惰要我致力于个人的事务或者把公事抛在一边。我不是圣人，但我将尽力去做。不过，如果不能诚实地对我自己说，我不是过着孤独的生活，也不是生活在我喜爱的人的狭小圈子里，而是在努力——虽然没有竭尽全力——总结人类不幸的教训和促进民主自由事业，我将是非常不幸的。

这确实是普通的经验。我们的机会各异；我们中的一些人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寻找对同胞有用的较好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则在较大的范围内寻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感到对我们同胞的福利责无旁贷。我们如果没有用处，那将是不愉快的。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强烈地感到这一点。一些人觉得他们的服务范围在个人

方面,而另一些人则主要在社会活动中。但是,这都是以正义感和同情心为基础的同一种精神的表现,而这正义感和同情心正是我们要拥有的部分感情。

当然,这些感情并不会使所有的人都成为社会主义者。在那些由于信念而不是由于环境的偶然因素而以社会主义为职业的人们当中,社会主义指一种比通常需要靠集体行动来促进社会正义和人类友爱的目的的观念更为强烈的观念;一种把政权潜在地看作与其说是使我们保持秩序的警察还不如说是促进美好生活的手段;一种认为立法虽不能使人类生活美好幸福,但良好的法律能大大改善人们美好幸福的机会的信念,一种认为人类社会应当为它的全体成员而不应当为某些有局限性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信念;社会主义还指这样一种信念,它认为为共同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应当扩展到既对人类幸福必不可少、又能集体组织起来而不消灭人的基本特点的一切事情上去。特别是,社会主义指这样一种信仰:社会经济生活不应当丢弃个人力量的作用,而应在某种公众控制的形式下组织起来。

同这种观点相反,过去经常有人争辩说,善良的天意如此安排经济事务,以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无意识地不知不觉地追求着所有的人的利益。过去常说,利润竞争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使消费者得到价廉物美的供应,因此,政府无论如何应当抑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在实践中,这种观点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时间得到充分探究,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还相信它。因为很明显,不管一个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什么样的情况,今天政府不干涉并没有导致这种臆想的慈善的竞争。相反,在所有的主要工业和服务部门,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某种形式的垄断。不是所有的工业在结构上都是垄断的,但是在某个时期,几乎没有剩下一个没有垄断的地方。即使在制成品的制造者之间还

存在竞争的地方，制造这些制成品的那些原材料的生产者也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垄断组织。金融——向生产者提供贷款——几乎到处都是高度垄断的。甚至在垄断还是巨大而不完善的企业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还是那样控制市场，以致谈论自由竞争成了笑柄。调整工资也愈来愈依靠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谈判。货物的出售价格常常由工厂主来决定，这样一来，甚至一个零售商想用削价去抢另一个零售商的生意，他也做不到。政府不干涉不再意味着竞争是经济世界的主要特征，而意味着，不负责任的垄断管理取代了为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管理。

假如这些垄断组织实际上在为公众服务，那就不足以谴责这种制度了。但是，对于大多数垄断组织和以垄断为目的的大多数联合企业来说，总怕市场供应过剩是自然的趋势。控制这些企业者的目的就在于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情况说明，这一定是他们的目的，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很快就会失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总是获得最大的利润，或者看来非常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但不是靠尽可能多生产，而是相反，把生产限制在能用相当高的价格出售产品的水平上。说到商品，这一规则也有例外，只要能大大扩大商品的需要量，甚至可稍稍降低价格，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更适合垄断者扩大生产。它适合于福特公司生产非常多的汽车，以便保证最经济的大规模生产。但是，这样的例子是不寻常的。更常见的情况是，企业生产的东​​西要比它们能生产的少得多，结果许多工人被解雇，而不得不期待政府的帮助。

这种事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很多人对此习以为常，在他们自己和千百万其他人缺少他们能够做的东西的时候，便把千百万人失去工作当作十分自然的事。当你认真思考一下这件事时，你会发现，事情竟然如此明显地不道德和荒谬。如果制造产品的手段存在，而人民要有一定的生活水平又需要这些产品，那么，不制造这

些产品显然是错误的。导致这种结果的任何经济制度在道德上和常识上都会受到谴责。毋庸置疑，人们在安排自己的事务时可能如此无能以致不能做好任何事情。但是，他们应当试试；而最广泛地提倡的医治这种邪恶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方法。

在这一点上，过去总是这样回答，社会主义不容置疑是非常美好的崇高的思想，但是不能强迫实行。有人告诉我们，是“人类的本性”使社会主义不可能实行的。这种论点现在已失去了市场，因为社会主义在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这个1917年在苏联建立起来的制度犯了很多过错，但它消灭了失业，并开始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力生产产品。过去常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垮台，因为它的公民会坚持消耗掉他们能生产的全部东西，而不为积累新的生产力留下足够的资金。这种论点也没有市场了，因为苏联投入的基本建设投资积累在其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概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要大——尽管它需要为保卫自己而把大量的钱用在军备上。

再也不能说社会主义行不通了。但是，当然还能坚持社会主义要不得。一个中意的论点就是社会主义毁灭普通人的自由。这是较难回答的，因为关于俄国的自由情况很不清楚。我听了许多关于俄国和大不列颠的自由情况比较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一方强调俄国压制被认为不利于苏维埃国家安全的教义，强调它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思想的基础，强调它检举揭发那些被认为背离了正确信仰的“同志们”。另一方争辩说，苏联工人认识到他们拥有自己在其中工作的工厂和国家本身，他们从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而成为较高的社会阶级的成员，比阶级压迫社会里的大多数人多得多地享受自己选择的个人生活方式，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享有大得多的真正自由。实际上，每一方都在强调自由的一些特殊方面，而置其它方面于不顾。双方都是对的，同时也是错

的。但是，这种争论毫无结果这一事实说明，政府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控制本身非不足以保证令人向往的各种形式的自由。苏联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另一方面，大不列颠也不是苏联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民主的国家。

这里显示出，如果我们全神贯注于使所有的人获得同等的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不顾本章前面所讨论的那种类型的民主自由，不顾我们正在变得和在俄国几乎不存在而在我们这里却常充满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传统发生冲突，那是真正危险的。每一个国家在修正它的社会结构时，都必须建立在它的过去上。俄国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因为沙俄就是过去那个样子。而不列颠的社会主义，如果有朝一日掌权，也将打上不列颠传统的标记。这也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人号召我们照搬俄国人的做法是愚蠢的。我们的情况是如此不同，以致我们的革命到来时，将必需采取不同的形式并导致一套不同的结构。我们现在尊重并享受的各种类型的自由一定会带到我们打算建立的社会中，并且一定还会增添现在被我们大多数人拒绝的其它类型的自由。

我无意忽视那种使我所重视的民主自由受到威胁的危险。但是，我继续认为，这种危险的出现不是由于社会主义，而是由于使社会主义成为必需的那些基本条件。我已试图描述，资本主义从竞争转变为垄断时，由于害怕失去利润而怎样拒绝使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资本主义造成资本的大量集结，从而使操纵这些资本的人对人们的整个生活实行极大的强制权力。除了把这些大的垄断组织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来限制这种反社会的力量。但是，我同意，这样做并不能消除它们践踏个人的危险，因为这种危险来自垄断组织的庞大性，而不管怎样控制这些垄断组织。这种庞大性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不可避免的特征。它是科

学进步、生产力增长以及伴随着这些变化而来的都市形式发展的直接后果。

我们不能靠拒绝社会主义来摆脱这种危险。说实在的，对于我们来说，拒绝社会主义会发生的情况是，我们将得到法西斯主义——这个作为唯一有足够力量维持资本主义生存的政治工具。因为如果我们不接受垄断组织，它们就会把法西斯主义作为迫使我们服从的一种手段。正象很早以前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生产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地走向日益增长的“社会化”，即全部经济过程变得越来越互相依存，这是一个明显的真理。这种发展的顶点是控制的彻底统一。但是，不管这种控制是由全体人民的名义来行使，还是由那些成功地把其统治强加于整个社会的集团来行使，它仍留下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是这个“社会化”过程的一种形式，法西斯主义是另一种形式。不存在和现代经济技术的要求一致的第三种选择。

如果我们拒绝法西斯主义，我们就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有自由给社会主义最适合我们愿望的形式。在现代社会结构不可避免的巨大性内部，通过为多样性表达方式和为各个集团自由结社提供足够的手段，我们可以自由建立抵消这种巨大性的民主机构。这些机会一定要在巨大性的结构内部提供，因为如果违背科学进步的趋势而行动，我们就一定会失败。这种巨大性的确为保证我们社会里的每一个人获得适当的全国生活水平提供了手段，而这种好处在任何其它条件下都无法得到。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情况，我们的任务是在接受它时使它和民主自由的要求一致。

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并更严密地考虑一下，在我们社会的这种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知道，老社会主义口号就是要把“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社会化。我们必须问一句，

为了建立对经济体系活动的共同管理，为了保证充分利用生产力或者为了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树立正义，究竟需要走多么远。

为什么我们要使任何工业或服务业都社会主义化呢？这里有一、两个理由。一个是因为在私有制下，它运转得不好，没效力：它既未能给消费者公平待遇，也未能给它雇佣的生产者公平待遇；另外也因为它给私有者太多的权力，从而使他们能使用这种权力来达到反社会的目的。让我列举两个明显的例子作为我的意思的初步的不完善的说明。煤炭工业明显地应当社会主义化，因为在私人管理下，它既不能给消费者提供公道的廉价的煤，也不能维持矿工的工作和付给它雇佣的人适当的工资。把煤炭工业作为一个统一行业来经营，能获得的经济实惠是非常大的。这已一再得到了说明。普通抽水设备，去掉煤井之间的障碍物，把矿井的开采变成较大型的，新煤区的一般销售和有计划发展——所有这一切提供了可以取得的巨大机会，只要管理是统一的。但是，统一必须是在社会所有制下的统一，因为统一在私人手中将意味着更强有力的垄断。

我们拿报纸业作为另一个初步的例子。这里主要的问题不是效力的问题，而是反社会力量的问题。近几年来，少数几个大辛迪加吞没了一家又一家报纸。在很多地区，独立的地方报纸完全被扼杀了。要进行新的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巨额的资本。其结果是，极少几个人在散布、制止或歪曲新闻报导以及操纵舆论上拥有极大的力量。他们这样做或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或是完全为了利润，或是这两种动机都有。无论怎样，后果都是恶劣的。由富人不负责任地运用这样大的权力，或由富人仅仅在抽取尽可能大的利润的基础上来指导报纸，显而易见是错误的和不好的。报纸应当既是反映舆论的机关，也是报导新闻的喉舌。报纸应当尽可能反映广泛的不同舆论，而不是一个传送狭小圈子里少数富人意见的传声筒。

大家公认，这件事比煤矿的事情要困难得多。煤需要的是有效力的生产和销售，再加上对矿工的良好待遇，这就是一切。新闻和舆论令人遗憾地不能象煤一样按吨销售。我们不要一个“统一”的报纸业，不要用所有的报纸去重复同样的话，即使是那些对公众负责并确信是在为公众利益说话的人的话，也不要重复。因此，我并不建议所有的报纸都应当由国家来办。确切地说，需要的是公共的分发机构，公共的花费浩大的新闻收集机构，我想，还有可以租借给愿意出版报纸的团体的为公共所有的报社。在这里，最要紧的，应当是把创办报纸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以便废除那些最富有者的垄断。

我宁愿选取这个困难的事例，而不选一个较容易的，因为这个例子十分清楚地说明，由于生产规模的增大而使我们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把报纸委托给“私人企业”，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或者能有自由民主的报纸；它只意味着，报纸受少数几个百万富翁的控制。另一方面，社会化可能陷入只存在政府报纸的危险，从而随之失去发表各种意见或不为政府欢迎的新闻的机会。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条不偏不倚的道路——废除百万富翁的控制而又不为没有自由的另一种形式所代替。

赞成社会主义化的事例，象我迄今所阐述的那样，是不完善的。让我们再回到煤矿的例子上来。可以完全有理由地说，我们一定能把各矿区管理好，使之能雇用全部矿工和生产尽可能多的煤。煤矿工业的单纯社会主义化并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为生产的煤比所能找到的市场需要更多是无用的。煤的市场仅仅部分是为满足消费者市场的需要，如果我们给每个人以适当的生活收入，那么在家庭的火炉中以及在生产私人消费用的煤气和电力方面以及其它方面将使用更多的煤。但是，煤的市场大部分是为满足其它工业如炼钢业等的需要。如果我们让钢铁工业受私人垄断组织

的控制，而这些私人垄断组织为了保持高价巨利继续限制钢铁的产量，那么，即使煤矿工业掌握在公众组织的手里，也将会有被解雇的矿工。

实际上，社会主义化并不是置其它工业于不顾的这个工业或那个工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制度后面总的推动力问题。这就是那些比较进步的自由党人容易犯大错误的地方。他们声称，他们准备根据具体事情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任何一个经营得没有效率的工业的社会主义化。但是，由现代经济制度所引起的失业和生产不足，主要并不是哪一个具体工业缺乏效率的问题，而是普遍缺乏效率的结果，是由整个制度的反社会性质决定的。根本的病症在于，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不是按需要生产，也不是按其生产能力生产，而是一味屈从于它的占有者攫取最大利润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医治的病症。而我们医治的方法不是仅仅把少数几个办得特别不好的工业转为由公众管理就算了。

一个经济制度正确的第一个原则是，应当使用一切可用的人力资源，使其按其天赋进行劳动，直至人们宁愿有更多的空闲时间而不愿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在不是需要而是利润成为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的地方，这个原则是不可能实施的。只有通过根本改变制度来完全废除利润动机或把这一动机放在从属的地位，这一原则才能贯彻。它应当为整个社会，而不是为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去决定产品的价值。从人类需要的观点出发，任何人在其劳动能够增加生产总值时而不能找到工作，都是荒谬的。

我们应该怎样使这个原则付诸实施呢？显然应靠计划，也就是靠集体负责任地决定怎样使用可用的人力和生产工具。稍后我还要探讨在社会机器方面怎样才能最好地做到这一点。目前我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打算结束贫困和失业而不打算白白丢掉科学正在交到我们手中的伟大机会的话。只要缩减生

产比维持生产可获取更多的利润，或是某种新的发明使之可以裁减工人，从而使私人能够自由地把他们的工人赶到街上，就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不是在责备普通的私人雇主，按照现状，他通常没有选择的机会，因为不能期望他亏本还继续生产。我甚至也不是在委婉地责备那些操纵着大资本家垄断组织的人，因为他们也只是按照利润成了生产准绳的制度行动的。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制度是根本上完全错的，需要整个改革，而不是只在这里或那里进行改革。

为了改变它必须做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让我们看一看苏联的情况——那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较好地认识，不是如何模仿俄国，而是如何把俄国的教训运用到我们自己大不相同的情况中来。

在苏联，生产是按照五年计划进行的。这个计划由一个政府机关起草，而这个机关又根据许多机关起草的较小的计划工作。整个计划将必须通过这些机关付诸实施。这个计划基本上是一个使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来尽可能多地生产苏联公民所需要的货物和服务的计划。它是一个按尽量完善的比例出产这些产品的计划，这种比例既是不同种类的消费品之间的比例，也是以这种消费品为一方面以生产未来产品的机器为另一方之间的比例。起草这个计划时首先要提出的问题不是“生产这些货物合算吗？”而是“需要这些货物吗？”或者，更确切些说，“什么地方需要这样多的东西，何种需要应当放在第一位？”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一些有用的工人没有使用价值的问题。因为，十分明显，在如此多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地方，每一个体格健壮的人都是值得使用的。除了极少数变换工作岗位的特殊情况外，失业现象完全消失了。如果说苏联仍旧是贫穷的，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很穷，而不是因为它没有尽快地去消灭贫穷。

当然，苏维埃计划并没有以完善的效率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出毛病，不得不一一进行改正。计划在整个执行时期一直在不断地进行修正。它不是一个死板的设计，而是一些打算，只要发现错了就改正。它也不是把一切都僵硬地集中起来。苏联的每一个共和国和每一个城市都有订计划的专家权威。每一个成功的计划都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分给较小的计划单位较大的责任。只有很少几种工业的计划才集中贯彻执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的中心都是作为地方或区域计划的协调者行动。目的是分散责任，而不是集中责任。负责计划和贯彻计划的人越多，它的民主基础就能得到越好的保证。

目前，在这个计划已开始实施的时候，大多数专家，包括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直截了当地说，这个计划一定行不通。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由于头重脚轻，由于机构如此庞大，以致大大超出人们的控制能力，计划必然失败。其他一些人，特别是职业经济学家，害怕的就是这种排除利润动机的刺激而生产任何东西的概念，因而干脆声明，这种和他们教学生的内容太不一样的制度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他们每时每刻都怀着焦急的心情等待着苏维埃崩溃的消息。但是，俄国的制度没有崩溃，它奏效了。甚至犯的错误——有很多错误——也恰恰证明了它的力量；因为它能够纠正这些错误并迅速地去从事新的事业。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来说，毫无疑问，这证明了，它不仅可以废弃刺激生产的利润动机而不招致灾难，而且没有这种刺激，在工业效率上比任何国家以前有过的前进速度还要快得多。

我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写这本书的，甚至那些面对全部事实多年来一直认为苏维埃计划的这些胜利是不真实的批评家们，也由于苏联军队对纳粹军队突然的背信弃义的进攻所进行的雄伟壮烈的抵抗而闭口不语了。不管这场战争的结果可能如何，俄国人所

已经做到的一切就足以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的效能了。如果没有后方在工业上做出感人至深的努力，苏维埃军人就是再勇敢也难以阻止纳粹的前进。而在工业上做出的这种努力，记住，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在一个非常缺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落后国家中，实际上还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实现的。它是靠社会主义计划实现的。这种计划释放出了人民被压抑的能量，而不是因为怕“损害市场”而阻止这些能量发挥出来。

这种苏维埃计划始终依靠对大型工业、运输系统、电力供应、银行财政和一切对外贸易实行公众所有和公众管理。在农业方面，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依靠的是和国家集体主义相比更近似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在小型工业方面，依靠技术工人的合作形式——劳动组合；而在分配方面，则依靠国家、合作社和生产者企业的一种混合。它的结构既不是始终如一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迄今还没能找到它的完善的形式。但是，它的基本特点是无可怀疑的。这个特点是，牢牢控制其它部门所依赖的关键工业和公共事业，它们的产量则按照对需要的共同概念来进行计划。从一个五年计划到另一个五年计划，重点有所改变。重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消费品商业依次成为注意的中心。这种变动，不是由于偶然事件或市场“波动”而是因为从作为整体的社会观点出发，才被认为是正确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机构是在一场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这场革命是以前的社会秩序几乎完全瓦解的结果。在战争和革命的过程中，俄国的工业完全崩溃了，产量一直下降到1913年产量的百分之几。苏维埃计划人员在建立一个完全新的经济制度时，不得不几乎从零开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有利因素，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干净利落地从头开始。但是，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这意味着极度的痛苦，意味着比所需要的要多得

多的管理集中化，如果计划制订者在接办一家营业发达的商行的话。计划必须从中央开始，而在地方组织增强到足以承担责任时又不得不逐渐分散责任。这个分散责任的进程仍在继续。这是计划人员要做的事情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我们大不列颠的情况完全不同于 1917 年的俄国。和苏联相比，我们有足够的熟练工人、经过培养的技术人员和胜任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員。我们的经济制度在起作用，虽然起的作用不充分。战争的打击远不是摧毁这个制度，而是强化了它，并在强制实行它以前丢弃了的协调管理。我们已经开始计划——因为计划是战时的紧急需要；而且战争暂时消除了失业现象，并使我们的生产几乎接近了我们生产能力的限度。我们确实还没有做到尽我们所能地进行生产，但也差不多了。我们勉强地、半心半意地求助于计划，而没有摆脱既得利益集团。这种集团仍在到处阻碍组织工作。但是，自从我们的民族危机成为显而易见的并迫使我们认真进行改组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现在的确有了初具规模的计划制度，只要我们决定这样做，这种计划在和平时期也能和在战时一样实施。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虽然我们的计划人员尽力不去触动利润制度，继续允许私人商行和政府签订合同，而不是接办工厂，不是不考虑任何利润问题地按需要进行生产，尽管这样，利润动机还是部分地失去了作用。不限制利润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不限制利润将有引起强烈抗议的极大危险。但是，免征超额利润所得税的结果是在所有忙于战争工作的营业活动中，几乎每一个雇主都获得比允许他得到的要多得多的利润。这样，对于每一个雇主来说，年终时不管账簿上显示出的利润是大是小，都无关紧要；其结果是，今天很多雇主在任何意义上几乎都不能说他们是在利润的动机下工作的。支配他们行动的不是获取厚利的欲

望，而是他们要在全中国争取获得战争胜利的努力中出一把力的愿望。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谈过话，我知道，他们觉得这种情况很奇怪。虽然他们过去受的教育是相信利润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唯一刺激剂，现在却发现自己被一种完全不同的动机激励着。他们对此迷惑不解。在许多情况下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他们的经济观念和现在他们心目中出现的另一种经济制度奇怪地混成一团，而后者仅在一两年前还被当作完全不切实际的东西而加以拒绝。

我不是说所有的雇主或大多数雇主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相当多的人是这样的，而这种情况是一个特别有希望的迹象，因为如果我们打算在不经过俄国人所不得不经历的混乱和痛苦的情况下向新的工业制度转变，那末，我们能够有尽可能多的知道怎样经营工业的人，而不必去寻找和训练一支全新的队伍，就是非常重要的事。

我认为，这种态度上的变化在中小雇主之中要比在处于大垄断企业顶端的人之中普遍得多。自然是这样，因为大垄断者太习惯于遵循反社会的政策并使他们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以致他们的资本家感情根深蒂固得多。他们也失去很多东西，不仅失去财富，也失去权力。普通雇主可能还是在社会控制下为公众利益担任业务经营者好些或更好些，如果他在战争结束后不得不面对自找市场的任务的话——更不用说这一个或另一个大型联合企业可能把他挤垮的危险了。另一方面，大垄断资本家不愿为社会工作，他喜爱自己拥有权力。从气质上说，他十之八九是个强盗男爵，而不是技术人员或业务经理人员。他恨政府控制他这一思想——除非这样的政府能由他自己管理。

和大大小小雇主一起的，还有拿薪金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一直习惯于作资本的奴仆，设法为他们的主人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些人也在度过一场奇怪的经历，因为他们也发现，他们

现在工作主要不是为利润而是为国家的事业。在睁一眼闭一眼地面对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能够在实践中运用这一事实时，他们受的影响和小雇主差不多，这种经历使其稍稍有点迷惑不解。他们甚至比众多的雇主还要多，是生产效率直接依靠的关键性人物。对于他们来说，除非爬上了很高的位置，拿的是很高的薪金或者分享利润，否则，他们就没有正当理由认为，如果工业实行公有制并为公众的利益而经营，他们的生活从物质上说会因此更贫困。如果考虑到两国财富不一样的情况，在苏联，与他们地位相等的人所得到的薪金是比得上他们的薪金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收入上的平等——远不是这么回事。根据苏联的实际，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了不劳而获的收入，而不是把所有的人的收入都降到同一水平上。

的确，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在按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经办的工业中发现许多吸引他们的东西。他们中的哪一个不愿意他的工厂总是开满工并且有一个保证销售其所能生产的全部产品的可靠市场呢？这就是他们的俄国同行在最初的动乱平静以后苏维埃计划定下以来一直所处的地位，并且显然为他们提供了做好工作的最好机会。

虽然如此，很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接受社会主义这件事上还是十分勉强。这部分是由于他们一直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属于“资本”一方的，而不是属于“劳动”一方的。他们自认为是上层人上。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感到“工会管理”不可靠。这些感觉都是自然的。在一个仍然由利润动机控制着的社会，在一个把财富当作成就和威望的标准来崇敬的社会，任何一个收入高于一般水平的人在精神上都和他的“上司”结盟，反对那些境况不好因而可能嫉妒他并希望把他拉下来的人。同时，在这样一个社会，在工业管理中被排除承担任何积极责任的工会，被迫主要采取一些消极

的和约束性的方法来保护工会会员的利益。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观点来看，工会总是阻止他们有理由希望做的事情，他们担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的阻碍力量将大大增加。我相信这种想法是和真实情况正好相反的，俄国的情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成了管理部门的富有建设性的合作者，不管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还是在减轻工人的任务方面都是如此。工人们不再害怕被利润追求者剥削，他们变得关心起他们在其中工作的工厂的生产效率来了。并且他们也热心于在公共事业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这种“合作精神”，这种正是很多资本家公司使用各种手段妄图激发的精神，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了。而管理人員和工人也从仇敌一变而为合作者。当然，摩擦和不和还会发生，但是，这种摩擦不和已不再带有根本的阶级对抗性了。这种阶级对抗，把小小的牢骚不满夸大为原则性的事情，小题大作，使正在尽力工作的管理人員备受折磨。

这个探讨的结论是，限制利润动机发挥作用的战时环境，为雇主和管理人員中的变化同样做了重要的心理准备工作。同时，战时环境也加强了作为小公司对立面的大联合企业的地位，因为这些联合企业大都被允许参加代表政府和行使政府权力的“管理”活动。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利润动机的作用并没有停止。收入大于知道如何使用的数额的大资本家，一般总是对未来比对现在的利润更为关心。他们宁要资本增殖，而不要作为他们权力的贡品的收入；他们现在不能抑制自己的目的在于加强他们战后地位的诡计。这常常使他们妨碍在战争方面作出的努力，因为他们生怕他们所管理的工业拥有“过度的生产力”，因而不愿意在战时扩大生产，甚至在极端需要时也不愿意扩大生产，这样的人很难变得信仰那种会毁掉他们的力量基础的经济秩序。即使在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反社会的活动时，他们也仍然是“公敌”。

要求他们改变观点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求助于雇主或拿薪金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则会大有好处，因为这些人一心扑在做好工作上。这种人想知道——至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想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究竟怎样运转和社会主义者究竟打算干什么。在下一章里，我将尽力告诉他们，并同时也向其他人阐述，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并进行随之而来的重建工作的目前社会主义纲领的基本要点。这要涉及到工业、商业和财政的所有制和管理。当我们清楚地记住这个纲领的要点时，我们就能够进一步探讨，取得成就的是些什么力量和怎样才能组织好这些力量以使转变尽可能轻松安逸和毫无痛苦。

三、工业纲领

我并不想在这一章里为社会主义工业制度描绘一张蓝图。对于那些要求我除了在这里对建议作一简述外再作更完满的阐述的读者，有一本我写的书名为《一个民主的大不列颠的设计》(A Plan for Democratic Britain)，我在其中试图制定目前社会主义政策的要点。这本书是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出版的。如果我现在写它，我将增加许多相当不同的东西。战争改变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需要更为迫切了，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但就未来而言，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特点所受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的。各种“战时社会主义”的暂时性问题发生了。如果我们打算集结我们的全部力量打败纳粹，我们就不能不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已经发生并和战后时期有关的全部东西就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瓦解大大地接近了，以致我们需要更快地和更彻底地应用社会主义良药。社会主义的基本情况仍然几乎和过去一样，把工业作为公共服务事业来经办的问题和以另外不甚反社会的刺激代替利润动机的问题，实际上仍然是老样子。所不同的是，首先，战争环境给了我们一个冲击利润动机的新出发点和失业问题暂时处于隐蔽地位；其次，欧洲大陆的战前制度遭到比这里更为全面得多的破坏，这使其包含的重建工作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以前所想象的更为全面，并且随之将出现建设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秩序的更大的机会。

在这一章里，我将从某些直接产生于战争需要的迫切问题开始。我将力图阐明此时此地更多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能怎样改进

战争努力的质量和能怎样为夺取胜利而更充分地动员我们的资源。然后我将转到重建的问题上,并尽力提出,我们将需要多少社会主义,作为在令人满意的民主路线上着手重建不列颠的最起码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的战争努力乃是奇迹和混乱、致力于公众事业和盲目拒绝面对事实的奇妙的混合。我们是在把“信赖私人企业”作为官方口号的张伯伦^①政府的领导下进入战争的。在那些明显需要“管理”的地方,大部分“管理”权却交到大企业头头的手中。这也就是说,那些在前几年为了维持利润一直竭尽全力消除“多余生产能力”和限制产量的人,被委以把产量提高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以便满足战争需要的重任。同时,政府发布命令,要尽量不干扰私人企业的事务,或雇主协会和工会之间集体谈判的办法,或国内外市场的正常贸易活动。当然,政府的订货量大大地增加了,于是很多新企业开始或者直接为政府工作,或者更常常作为向政府部门固定供应物品的转包商而工作。但是,甚至面对战前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德国工业全面动员,却仍然完全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战时生产对真正计划的需要和把每一盎司经济力量都投入战争努力的必要。

结果是灾难性的。1940年初夏在法国崩溃而一支派往大陆的较小的英国军队几乎损失了其全部备用品和装备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来弥补这些损失。我们有人,但是我们没有武器。而那些本来一直能生产极端需要的战争军需品的雇主,直到这时仍然被鼓动去出口尽可能多的机器等诸如此类的货物,以便减轻我们外汇的紧张。如果希特勒在1940年夏侵入大不列颠,他将会发现,他一旦能把他的军队越过狭窄的海峡,前进道路上几乎全无阻挡。

^① 指阿瑟·尼维尔·张伯伦,1937—1940年任英国首相。——译者

以后情况确实来了个大突变。雇主和工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一起决心“干”。他们在持续不断的艰苦劳动和扩大直接生产方面创造了奇迹。但是这种不寻常的努力虽然本来就是了不起的，却是临时凑成的。它背后仍然没有计划，也没有为制定计划做大量工作，虽然任何一个稍具常识的人都很清楚，照目前的样子，这种努力只能维持一个很短的时期。过度紧张使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而且要不了几个月，过度的精力消耗有使这种努力陷于崩溃状态的严重危险。

有效的计划仍然由于各种原因而拖延不行。最大的原因是，任何一个有效的计划所受到的私人企业干扰，甚至比新的丘吉尔政府准备坚持的还要大得多。如果打算开足马力加快军需生产，同时国内市场保持必不可少的供应，那么不太重要的工业和商业显然必须大大地合理化或“集中化”，以使工人、机器和工厂有余地去承担更紧急的任务，同时在那些扩大到战争工作的商业中实行同样的合理化，保证最充分和最有效地使用各种稀少的熟练工人、供不应求的机器和其它装备以及各种难得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这里也必须有一个既为了进口也为了使用稀少的物资和运输力量的规定明确的“优先考虑”制度。与此同时，还必须对消费支出进行管理，以使限制供应的普通货物做到尽可能公平合理的分配。

这些事情中的一些已经一点一点地做了，但是做得既犹豫又缓慢，而且还有许多最需要办的事情几乎完全没有做。甚至到现在，直到战争进行了三年多以后的现在，很多事情仍然没有做。只是暂时地在极少的行业中“集中”了不太重要的工业，而且还是半心半意地“集中”。除了小规模地整理了一下承包合同的方法以外，战争工业的合理化工作几乎完全没有开始。奇怪的是，直到1942年仍然没有清楚地设想优先考虑制度。尽管设置了生产部，各个供给部门甚至至今仍在争夺主要材料和机器。至于消费支出，定

量配给已经扩大到包含布匹和各种附加的食物了。但在许多方面，消费者仍然争夺有限的供应，以致富人自然几乎都比穷人好得多，而懒汉也比那些忙得不能在商店之间来往奔波的人好得多。工资仍保持没有调整的混乱状态，以致流言四起，随意夸大军需生产工人的收入和领取军饷的应征士兵中扩散不满情绪。新兵的招募一片混乱。太多的矿工招收到军队中去了，以致国家面临缺煤的危险。工厂中也有不满情绪，不是因为工作过度，而是因为由于材料没有送到，或者由于飞机或坦克的设计突然改变了而没有工作可做。雇主仍然咒骂那些使他们在走廊上长期徘徊，或者使他们来回奔跑、没完没了地寻找主管官员的部门，咒骂那些造成混乱的部门。

应当承认，这种混乱有一些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大概发生着同样的混乱——我们希望这样。但是大量混乱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有意拒绝把国家组织起来进行极权主义战争的结果。没有一个人，无论如何没有一个英国人，喜欢按照极权主义的路线组织起来。但是，战争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需的问题。我坚信，在雇主和工人中，今天有很多人将宁愿接受直截了当的命令，而不愿被左右摆弄和感到他们的工作只有一半用处或没有任何明确计划的指导。我的意思不是像严峻的军官一样，想把整个国家都置于军事纪律之下。决不是这样。这样的事情不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是人们喜欢的。但是，首先，我确实要一个明确的生产计划，其次，我的确希望，每个工厂、每个雇主、每个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每个工人，在这个计划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并且被告知去最紧急需要他或它的地方。

让我们从工厂开始，它们基本上是整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允许企业获取过多的利润，然后又力图通过征税去拿回这些利润，这样做的道理何在呢？当然，接管国家想要的所有工厂，按照它们的

价值付给适当的租金，并使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直接由国家雇用，这样对国家会有更大的意义。如果这样做了，一些最希望的结果将会随之而来。不是每个工厂都作为一个单独的企业，也不是只把属于同一公司的其他工厂组织起来，而是工厂可以按照最便于军事生产的类别组织起来，高水平的管理人员也可以提升为负责关键的类别。在需要的地方，工人和机器都可以毫无困难地从一个工厂转移到另一个工厂。工资和条件可以在广泛的范围内规定一定的标准。专利产品可以有效地合伙经营；可以为继续运转有价值的机器和避免生产中的“瓶颈”小而做出好得多的安排。这些变化将导致产量的大大增加，并且更加肯定未来的供应将会充足起来。

的确，在那些被接管的营业中，这个制度将暂时完全消除利润动机。但是像我们在上一章里注意到的那样，这个动机已经基本上暂时中止了。而在它依然发生作用的地方，它在对抗战争努力，而不是促进战争努力。现在，利润动机在战争贸易中只能以雇主考虑他们现在所做的对战后利润的影响这样的方式起作用；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要他们去考虑的东西，而且这种思想激发的行动妨碍战争努力。我们消除军事工业中的利润动机将不会有所失而只会有所得。

非军事工业由于正在收缩，成了困难得多的问题。在军事工业中，不管战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目前有大量的事要做。但是，在其它工业和行业中，此时此地有很多人正面临崩溃的前景。在“集中”的工业中，规定用安排合伙经营的办法来给予被迫关闭的企业某种补偿。但是，这种安排有崩溃的危险，因为重新集中会进一步削减本来还能生产的公司数目。毫无疑问，大量关闭的公司能想方设法转移到战争工作上来。他们，特别是那些小雇主，主要担心的是战后他们将发生什么情况，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于

他们是否能够重新开厂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在许多行业中，调换工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困难是严重的。此外，在其它职业中，有很多人的处境甚至更糟，店主无力继续开业也没有因失去生活手段而获得补偿的希望；很小的公司甚至不能维持为保持工作而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劳动力，也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和他们合伙；商店由于防御地区疏散人口或由于猛烈的空袭而破产。对于这些单位的人，除了说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地工作和在他们真的无以为生时将得到救济以外，没有为他们制定任何计划。

现在，这样的事情有了真正的困难——特别在分配行业中。从常识的观点来看，小商店太多了。这些小商店使人力和资本都遭到很大的浪费。一些小的生产企业效率很高；但是大量企业没有效率。事实上，它们处于被大生产者排挤的过程中，更不用说战争的影响了。靠更好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来结束贫困，希望所有流离失所的小商店战后又能够重新开业，这都没有多大意义，也和我们的愿望不一致。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对小人物来说，把这一点告诉他无法忍受的，除非使他也同样清楚地知道战后将不恢复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允许失业现象广泛存在，不依赖计划，从而鼓励他开办小商店或小作坊来免于陷入救济或拿工资的不安定的生活境地。毫无疑问，他的作为小店主或小作坊主人的地位也一直是很不稳定的，但是为此提供了补偿。如果没有补偿，南威尔士的店主将不会在不景气中一直增加，虽然当地的人口在很快地下降，而购买力下降得更快。

让所有的“小人物”抱着战后一切又会平安无事的希望是不诚实的。如果“平安无事”意味着恢复他们战前的生活方式，即恢复到事实上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就是极度贫穷和不安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将不会“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不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平安无事”；因为他们战前的生活方式，就他们中的很多人来

说，不管在个人的意义上还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都是不经济的。他们的未来不应不顾能力的大小重新回到他们的小店中去，而应让他们按技术和才能去找另外的谋生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方式。对未来没有任何这样的允诺，没有任何以大规模生意方式作为准备给予雇主的补偿，而在现在排斥他们是完全不公正的。

如果在军事贸易中完全去掉利润动机和让每个雇主和管理人员领取国家薪水（并且每个工人拿国家工资）是正确的话，那么在战争时期让每个人领取固定的收入难道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吗？我完全认识到，这里包含着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必须为一座大房子交付房租的人，或者为生活保险或购置房子或为孩子教育承担大笔费用的人，会碰见什么情况呢？那个雇用佣人的阶级在其房子依靠随要随有的仆人来收拾整理时，要下降到做全部家务吗？太太和绅士在整个战争持续期间，不管以后可能为他们准备什么，都应当停止做太太和绅士吗？

不，我并不建议那样做。我确实用不着太太和绅士，如果这里说的太太绅士指的是不做任何工作却要求牺牲社会利益来过奢侈生活的那些人的话。但是我同样不相信，给所有的人同等的收入是切实可行的，或者暂时是人们向往的。我不反对市政府秘书或有技术的管理人员年收入高达二千甚至三千镑，如果他是依据给予他的报酬的大小而进行工作的话。此外，我清楚地认识到，最好不要突然全部剥夺那些习惯于不劳而获的有产者。只要不是在革命的进程中，这样做就会造成不幸的感觉，并且实际上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痛苦。目前，不劳而获的收入一定要继续下去，因为它是我们社会的真正基础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还没有能力从战争中间的基础上重建社会。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一切照旧。虽然不能废除不劳而获的收入，但对之进行限制是切实可行的。给每个失去正常生活手段

的人可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也是切实可行的，唯一的条件是他准备听任国家支配，去那最需要的地方，做那最需要的工作。把流离失所的“小人物”置于和大雇主一样的补偿基础上也是切实可行的，即使不能允诺战争结束后他的店将原封不动地回到他手中。

征税是限制收入的一种坏办法。在用征税的形式对超额利润征税时，即使税率提高到百分之百，要使一般公民相信它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业务开支”究竟花费多少，而他能够用偷偷增加资本的形式搞走多少钱，这些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向个人收入征税时，影响范围要清楚得多，因为它不同于业务利润。但是，即使如此，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不在超出防止苦难所需要的以外避免收入分配，却代之以在付出过剩部分后又去征税呢？只有其它收入按有效的规定处理才会有合理的工资政策。在战争期间，考虑到承担的义务，没有一个人应有比他的真正需要更多的收入。如果我们想阻止工资和物价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将不得不得出的结论。

就劳动而论，并不需要置于严格的军事纪律之下，也不需要其他类似有军事思想的人所主张的措施。在战争时期，按照我们建议的方法把工业置于公有制之下，把劳动力调到需要的地方去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就像把一个邮局工人从一个区调到另一个区一样简单。工人像和平时一样继续从私人雇主那里拿到工资袋，并随时可能被企业主而不是被政府解雇或罚款的时候，期望他自己具有正在为社会工作的感情是错误的。政府在其制定的专门计划中已经向国家雇佣的码头工人、建筑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机动小组实行少量的分期付款办法。但这些是小规模的，而且仍然在工人和私人企业之间的普通工资关系的条件下。在产业工人完全像前线战士一样也在作战线上时，那样做是荒谬的。但是不能期望工人接受没有同样加在其它阶级身上的纪律。

我建议，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需要刻不容缓地向称之为“战时社会主义”的目标大步前进。自然，前进愈大，我们为战后的重建工作所做的准备就愈多。在上次大战以后，1919年，在利润追求者的煽动下，政府急急忙忙尽可能快地废除了战争需要的压力下建立起来的“管理”，而把“通常那种营业”恢复了。其后果在1919年和1920年的罪恶的和灾难性的繁荣兴旺中显现出来。当时，物价暴涨到令人惊奇的高度，投机赚到巨款。接着而来的是1921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和严重困难，以致工业一直到1939年才完全摆脱困境。我觉得，这次战争以后，重复这些大错误大概行不通了。不管既得利益集团喜欢不喜欢，不管政府是由谁掌权，“管理”一定会继续维持下去。由于物资和船运量还很短缺，配给制必将继续实行。建筑业在几年之内将必须由国家管理，以便修复战争损坏的建筑和根据战后的需要重建城市及工厂，并且必须有庞大的培训复员军人和军火工人计划，使他们在新的条件下能适应工作的需要。

无论政府由谁执政，都必须保持管理。但是，同样的管理机构能够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在一种类型的政府下，“管理”能被用来牺牲小雇主和普通公众的利益而巩固大托拉斯和联合企业的地位，并建立一种“工业封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就会变得和大商行及大金融手中的工具差不多。在另一种类型的政府下，“管理”能够被用来作为制定新工业秩序的工具，而这种秩序是建立在为国家服务的计划基础上的。

在经济领域，像在战争领域一样，某些位置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掌握了这些位置的一方就掌握了整个局势的关键。经济领域的关键位置，据我看，是银行系统，是那用来管理货币和供给信贷的银行系统；是基本上决定其它工业生产过程费用和所在地点的燃料和电力工业；是运输业和生产基本原料、耐用的资本

货物的重工业以及军备生产或半军备生产的行业。谁控制这些关键性的位置，谁就是工业体系的主人。如果这些工业和服务行业能置于民主管理之下，并且组织得能为国家利益服务，那么其它工业和服务行业由谁拥有和管理便是次要的事了。

这些关键部门是追求利润的垄断组织所选中的基地。最大的康采恩、最强有力的托拉斯和联合企业都主要来自其中。把这些部门直接纳入国家所有和国家管理之下，其余部门的处理便是相当简单的事了。

因此，战后紧接着的工业改组纲领应该以这些基础部门为中心。银行应该实行国家所有制并由国家管理，这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事，以致我几乎为花时间争论这一问题感到惭愧。我将尽可能说得简单些。首先，银行政策限制着整个工业所能提供的生产和就业的数量。如果银行遵循通货紧缩的方针，并坚持限制信贷以使物价下跌，那就没什么办法能避免工业大萧条。注意我是从反面提到这一点的。我没有说，银行只靠信贷就能导致生产增长或充分就业；我说的是，它们不提供信贷就能妨碍生产和就业。其次，任何生产计划的成功都指给予要参加计划的各种各样生产代理人适当数量的贷款。银行政策一定要和生产政策一致，否则生产政策就不能实现。第三，银行将在这次战争中表现为巨额公债的有名无实的所有者，因为这些公债是凭空制造出来然后借给国家的。如果它们是私人公司，公债可望偿还。公债为什么将偿还，这里说不出一点理由。银行若收归国有，国家就将成为国家本身的大部分债务所有者。没有人会容忍由于这样做而导致的充公。银行股东的真正资本将不会受到影响。但是银行随心所欲地凭空制造钱的权力显然应当转为公有。这是留在牟取利润的私人企业手中最不恰当的权力。

燃料和电力供应也应完全转为公有。第一，因为它们是影响

其它各项工业和服务行业的关键部门；第二，因为它们需要统一管理，因此，如果不归公有，就有可能变成危险的垄断组织。还有一些其他原因。煤炭工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简直没有效率，需要全盘改组。电力的供应和我们城市的重建以及工业的重新安排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计划，这个计划自始至终都应在社会管理下贯彻执行。它已经部分地通过市政府和“高压输电线路网”实行公有。完成这一过程和着手建立能为每一乡村及每一城市服务的电力供应系统，以及随后消除城市不适当的集结的一大原因都是简单的事情。煤气的供应需要和电力事业协调一致。石油供应是船舶运输吨位的大用户，也是造成种种国际困境的有力原因，因此石油供应需要由一个负责的政府来管理，这个政府要能建立进口的油和国内“用煤生产的油”之间的正确关系。

陆路运输在 1939 年处于公路和铁路之间的一片混乱竞争之中。为了节约和社会的方便，显然需要协调一致；并且只有拥有铁路和大部分公路运输业的政府当局才可能导致这种协调。此外，货物的运费影响所有的工业，而货物和乘客运输的设备，是我们计划未来的工业布局 and 人口分布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是整个战后建设事业的重要因素。海运是最恶劣的垄断组织选中的部门；允许大规模重建商船队是罪恶行径，因为这样的船队必然会随着战争结束落入私人垄断企业之手。航空运输主要是国际性事业，在战后的商业和交通中一定会成为异常重要的。它应当由超国家的当局公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掌握在私人手中。

还有重工业。保持重工业在国家手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是军备的主要来源。我们既不要让军火利益集团又作为武器贩子在世界活动，也不要使国家在面临危险而要做准备时受军火利益集团的摆布。另一个原因是，这些工业是资本货物的主要供应者。这

意味着,第一,它们在工业计划中占据着关键位置——因为它们必须首先生产任何生产计划中打算生产成品的工具。第二,它们也在国际贸易中和欧洲重建中占据着关键位置。还有一个原因,它们作为半成品的生产者,如钢和有色金属,很容易屈从垄断组织,因为进行这种经济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本。

这是处理若干非常大的问题的一个纲要。其目的不是描述这些工业应当怎样社会主义化,而是指出它们来显示,工业体系的关键部门控制在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下毕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到现在所提到的所有工业都社会主义化了,而其它的没有这样,那么大部分现存的企业仍将留在私人手中。

我不是说任何其它工业都不应当社会主义化,而只是认为它们的社会主义化是——有一个例外——次要的事情。如果上述工业置于公有制之下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的中心,大部分其它工业在所有真正必不可少的方面一定会赞同这计划。

这个例外是农业,或者不如说是土地,因为在涉及战后的计划时,城市土地是和农业土地一样重要的。每当纳粹的轰炸机炸毁我们的某个城市——假如说伦敦,或南安普敦或考文垂——的某一部分,我们应该怎样重建被摧毁的部分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假如把这些地区当中的一个空地为未来保留下来,而在别处建设新的房子、商店、办公室或工厂,这似乎最好。可是这样,我们建议空着的那些地方的所有者就会要求为此补贴该地的全部建筑价值,同时我们建议使用的那些地方的所有者也会要求以一次总付或付租金的方式付给他们该地的建筑价值。因此,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允许在老地方进行重建将会便宜得多,即使这意味着恢复旧市区那种拥挤不堪的状况,而轰炸机已经给我们造成消除这种拥挤状况的机会。但是,如果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财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困难。我们将能选择最好的地方来进行重建,并能保证它们全被

使用。这样，城市中心留空地而城外造房屋并不比城中造房子而城外留空地花钱更多。

如果土地仍留在私人手中，这个国家的重建工作和重新计划是不会令人满意的。每个人都抱怨的坏事——城市拥挤现象，长条形的城市发展，地面上的建筑过多，游艺玩耍的场地和能自由进去的空地太少——是土地私有制造成的结果。这是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被轰炸地区的私有者已经在制定重新发展的计划，而这种计划的实施是严重违背社会利益的。我们应当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化。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计划和重新建设的基础，我们应当坚持现在就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化。

这一点对农业的影响也同样具有说服力。不列颠农业的困难在于，它非常缺乏资本，它不能给没有资本支持的农民提供生活过得不错的前景。如果一般的农场对于进行真正有效率的生产来说太小了，那么这大部分是因为很少有农民能够拥有较大面积的土地。在农业上有才能的人无法搞大规模生产，除非有人能出钱支持他。大部分出租土地的和大部分自己经营农业的土地所有者都没有足够的多余资本来适当地发展它。结果就是土地被肢解成一些不经济的单位，而甚至这样的单位也是装备不良的。如果国家接收土地，国家就能投入资本——不管需要什么，它能给真正有能力作为管理者或者作为佃户的农民提供较大规模经营农业的机会，它能提高耕作标准，以付给合适的工资而不向消费者索取过高的价钱，或者采取保护性措施来促进那些没有经济基础的耕作如甜菜等。当然，国家可以接收了土地而没有做到这些事情。但是它能够做到这些事情，而在私人所有制之下则完全做不到。

关于社会主义化的基本纲领，我希望在战后时期增加另外一个基本内容。国际贸易大部分都成了大公有公司之间有组织的交易，这种公司或者为各国政府所有，或者为各国政府所承认。战后

暂时坚持这种形式的贸易将是绝对必要的，那时一些国家有大量积累的剩余物资要处理，而另一些国家则有挨饿的人需要提供必需品。我想，正确的路线应当是明确地使主要的基本日用品的贸易成为国家的事情，这不仅是暂时的，而且是作为重新建立经济秩序的总方针的一部分。

这样，这里就有一个可以管理的社会主义化纲领，只要一个具体的贸易或工业部门处于混乱状态，就可以给这个纲领进行补充。不需要做的是这样危险的事：仅仅为了社会主义化而使每样事情都社会主义化。需要的是一个总的社会主义化的关键工业和服务事业的结构——一个其它工业和服务事业——不管是否社会主义化——在其内部都能够适应的结构。为了成功地重建我们的城市和工业，为了贯彻没有限制的生产和“充分就业”的政策，这是必不可少的。比这更多的东西是不需要的，而且突然强加给那些将不得不控制变化的人过重的担子，反而可能妨碍执行这一任务。

它必须由谁管理呢？如果我们考虑把管理放在行政部门手中；那将是最应当制止的想法，因为从垄断组织的罗网中逃出来而陷入官僚机构的罗网将不会有大的增益。行政部门的部级机构不是管理工业的，也完全不适应这个任务。不列颠的一般行政人员是忠诚的，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是胜任工作的。但是，他们基本上是遵守常规的人。他们承担不了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是被培养来负责这样的事的。他们习惯于把政策的每一件事都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制度，以致没有大量单独的决议就不能有较大的变化；并且他们是谨小慎微的，因为他们通常大都是为了有一个固定的和有规律的工作才成为一个公务员的。通常的高级公务员以自己是一个“可靠”的人而自豪，但是这样的“可靠”不是建设新的工业秩序所最需要的品质。

如果行政部门不应该管理工业，那么谁应该管理它呢？我这里

不是说重大政策的管理,这种政策的管理是政府本身的事,是政府为设计和总的监督国民经济计划而建立的那种专门经济机构的事。我是说在计划当局给予的总的指示之内的行政管理。很明显,进行这种管理最合适的人选就是说在为私人拥有的企业和联合企业干事的那些人。只有这些人具有必需的知识和锻炼;而社会主义化将意味着,不解雇他们,而是使他们转为社会的公仆。

当然,一定会发生变化。那些因循保守、不信任社会事业的人一定要让开,而由警惕性更高的人来代替,因为他们准备精力旺盛地投入新秩序的建设中去。青年人将有迅速崭露头角的机会,将建立不考虑财富或社会联系的民主提升做法。一些新人将直接由寒微发迹,但是主要的新行政人员将必须从现在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产生。

此外,业务活动将必须摆脱繁琐的政治干涉。规定经济政策的主要路线是作为人民代表的政治家们的事。但是,一个人如果天天受到那些不懂业务的人的干涉,那就很难期望他搞好业务工作。管理人员不称职,或破坏捣乱,或不遵守现行的经济计划的主要要求,就必须撤换。但是,在他们仍是管理人员时,必须给予他们放手处理事务的大权。

如果打算给予他们这种权力,那些总的指令——他们应该在这些指令下工作——就必须阐述清楚和设想附合实际。这意味着,政治领导人有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计划组织来为他们提供意见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组织内的人也必须主要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顾问的队伍中产生。它也必须代表工人,因为一个成功的计划的基本部分就是把工业劳动力能够做的和愿意承担的任务交给他们做。一个人员配备得很好、没有行政权力但有检查整个工业的全权的计划委员会,是新经济秩序必须设置的一个机构。政治责任必然要落在其身上的议会议员和内阁大臣也应照此

很好地选出。但是,现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未免离题太远。

同样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中,实际上在全部工业中,整个工人的地位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化的工业中,无论如何,工人将不再是私人牟取利润的工具,而是为所有的人的利益劳动的公有事业的合伙人。这个变化虽然提供了一个大机会,但其本身并不足以使工人对自己的工作持根本不同的态度。为此,他必须真正而不仅仅是形式上成为伙伴和决定其工作条件时有真正的发言权。导致这种改变的首要的和最明显的方法是在每一工厂中建立劳动委员会(在大工厂中附有车间委员会),不是作为对立的“双方”代表的开会场所,而是作为代表工厂每一级每一组的一个机构,这每一级每一组在其中就如同在共同事业中使事业成功的合伙者一样。这些机构将完全不同于工会,工会将被用来尽可能多地表达工人集体的不满和要求。这些机构应当是管理所必不可缺的部分,应当和定期召开的各部门领导人或技术专家会议一样,对于工厂进行顺利而有效率的工作是必需的,同时履行的是建设性的职能。

可以说,现在大多数大军事工厂建立的生产委员会是符合这些要求的。事实上,这些委员会在其权限以内是有用的,但在三个重要方面有所不足。第一,它们没有包括各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代表,使之同手工工人并肩工作。并且因为这个原因,它们没有好条件处理很多最基本的生产问题。第二,规定任命的规则是在工会的影响下起草、企图阻止“鼓动家”占据职位的,以致它们的代表性比它们应当具有的要小得多。这特别适用于这样的规则,即除了新机构的情况外,要求工人在生产委员会有资格占有一个位置以前须有一个很长的服务期限。第三,规则还阻止这些委员会处理任何被认为属于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集体谈判范围之内的事情,这不适当地限制了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但是,即使有这些限制,

生产委员会的设立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进步，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在适当的时候将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很有价值的车间民主和集体管理生产过程的形式。

这种类型的车间组织比大工业管理机构——虽然这可能也是需要的——的工人代表性要大得多，它是要求“工人管理”的现实基础。没有它，工业就不能充满民主的服务精神，工人为公众工作时就不会感到他是真正自由的。

四、为每个人提供机会

西博姆·郎特里(Seebohm Rowntree)^①以前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是经典性的，现在又在他的成就上增加了一个伟大的为公益服务的贡献。他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约克，对几乎每个工人阶级家庭的收入和情况都作了新的认真的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是在1935年作的)的结果表明，在五万三千个工人阶级的成员中——不包括家庭佣人和生活在公共机构中的工人阶级成员，也就是说，不包括更多的大批非常贫穷的人——有不少于一万七千的人被迫在得不到基本人类需要的标准中生活。郎特里先生所持的标准是按1936年的价格以一周四十三先令六便士加上房租维持包括一对夫妇和三个孩子的家庭为“贫穷线”，比这收入多些或少些则相应地维持大些或小些的家庭。在确定这条“贫穷线”时，他没有询问这些家庭实际上怎样用掉他们的收入。他假定，他们的收入以完美的启发和自我约束，用可能的最好方法用于维持适当的生活水平。他在书里完全承认，大部分人没有这样花费他们的收入，并且实际上，那些仅仅稍微高出他的“贫穷线”的另外一万人中的一大部分，非常短缺维持适当而又健康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这一部分人的数目无法精确地计算。他的书证明，约克全部工人阶级的几乎三分之一，在1935至1936年，不能依靠对家庭收入作可能的最好的安排来达到适当的人类生活标准，而另外的百分之二十是处在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严重危机中，再加上那些躲到公共机构中的工人，你就可以看到一张关于战争爆发前英格兰生活水平的惟妙惟肖的

^① 英国法学博士，二次大战前任英国朗特里公司董事长。——译者

图画。

有人可能说，这一证据仅仅和一个城市有关。这是对的，并且的确近来也没有以任何同样的彻底性考察过其它城市。但是，照各地的情况来看，约克决不是一个贫穷的地方。对全国的考察也很不可能产生比较鼓舞人心的结果。例如，众所周知，比郎特里先生的考察早几年的默西赛德（Merseyside）考察，揭露出同样糟糕的情况；1929年的新伦敦考察亦一样。希望对此有更多了解的读者，可以看《英国状况》（The Condition of Britain）一书。这本书是由我和我的妻子在战争爆发前两年共同写成出版的。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即使实际收入大大提高了，社会调查者仍会发现普遍贫穷的证据，因为他们将随着实际情况的改善而提高他们的标准。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必须记住，郎特里的标准不是任意制定的，它基本上建立在由英国医疗协会作出的关于维持健康必需的饮食的结论上，再加上对其它需要的估算和一小部分花在学习舒适方面的剩余收入。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就是，有些支出在理论上不是必需的，但是要使得出的结论接近现实，就一定要包括在最低标准里，因为实际上，处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将花钱去购买这样的东西，甚至以短缺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东西为代价。这意味着，为了保证最低限度的物质需要，允许有点富余是必要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是需要的，尽管这种支出不一定用来买任何具体的东西。忽视这个需要而计算出来的结果，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和不近人情的。

所有最近十二年中作的大量社会调查的证据都表明，整个工人阶级人口的三分之一一直过的生活标准，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人民的习惯，甚至不能认为对维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说是足够的。决不能忘记，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痛苦的是子女众多的家庭的成员。工资制度没有考虑孩子或其它被赡养

者的多少,而领取工资的人却必须供养这些人。人口众多的工人阶级家庭,多年来仍然远远处在“贫穷线”之下;很多较小的家庭则度过了“贫穷”期,但是,只是在孩子们长大并能给家庭提供收入时才超越了这条线。任何时期,度过“低级贫穷”的家庭都比在那条线下面受苦的家庭多得多。

这些事实现在已经众所周知,而卫生官员和其它专家积累起来的营养不良的证据也同样广泛流传。约翰·奥尔爵士(Sir John Orr)^①计算的用在购买食物上的款项和健康生活所需要的款项比较一下,在人口多少不同和收入水平不等的家庭,都导致这样的同一结论,即总人口的几乎三分之一处于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姆戈尼格尔博士(M'Gonigle)在蒂斯河畔的斯托克顿的调查表明,消除贫民区在某些情况下实际上反使穷人的健康状况更坏,因为他们被迫为居住花费更多的钱,而剩下买必需食物的钱就更少了。比较一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学校里同样年龄的男孩子的身体状况就显示出,前者的身高体重都超过后者。每个在贫穷地区的学校和富裕地区的学校都教过书的小学教师都会同意,贫穷的小孩不管在身体还是在智力的发展上,都比不上不甚贫困的家庭的孩子。

当然如此,人们有时对认真仔细的调查变得不耐烦了,因为这些调查只是为了证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即人民在吃得饱、穿得暖和住得舒适时就会更健康地更好地成长。但是,甚至在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时候,也还必须提供证据,因为只有展示无可辩驳的事实才能把富裕者从自满中唤醒。

我们在上一章里已经看到,过去,事实常常自我暴露,街上到处是苦难,人人都能看见。今天,贫穷的实际情况比起上一代来不

^① 苏格兰营养专家,反对英政府限制食品生产的做法,为二次大战期间政府的食品政策奠定基础。194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译者

那么突出了。这有三个原因：第一，绝对苦难相对减少了；第二，城市穷人街区同富人街区更加分开了；第三，失业者，特别是长期失业者，大部分集中在有限的“萧条地区”，这使那些不一定访问这些地区的人不一定看得到他们。其结果是，相当仁慈的人现在比过去更容易忘记那些不强使别人注意的苦难，或者普通吃苦耐劳的人现在也比过去容易对一切事情都心满意足。我记得小时候在一次反榨取血汗展览会上曾听过吉尔伯特·切斯特顿 (Gilbert Chesterton)^①的讲话。我记得还听过威尔·克鲁克斯 (Will Crooks) 关于伦敦东区^②情况的报告，并碰到来自托因比学院的社会工人们。我记得我被这些经历深深感动了，这使我心里能够把我所听到的同我在周围看到的联系起来。如果这些悲惨的叙述，仅仅是旅游者讲的故事，我是几乎不会如此感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它们很容易仅仅成为一些故事。

然而，苦难仍然存在，虽然有所减轻。不过比一代人的时间以前好得多了，这种苦难十分明显可以防止了。的确，就在现在这个时刻，在我们面对德国的封锁实行配给制和供给全国粮食的时候，正在防止大部分苦难发生。这只是因为劳动力缺乏，被列为“不能被雇佣者”的男男女女又在获得工作。当然，甚至在战时，也仍然有一些“不能被雇佣者”，但是他们比和平时期被解雇的人要少得多。

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能比战前给人民供应好得多的食物，甚至在整个民族的正常供应来源被切断一半时亦是如此。此外，我们供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是作为赈济施舍——不管是社会的还是私人的——而是作为工作的报酬。在和平时期，一个男人或一

① 二次大战前英国诗人、小说家、新闻工作者、评论家，著有《英国简史》等。——译者

② 劳动人民聚居区。——译者

个女人,如果雇佣之而无利可图,就是“不能被雇佣的人”。今天,尽管利润仍存在,生产的数量则是由其它因素决定的。

在和平时期也应当这样,并且一定要这样。为了消灭贫穷,我们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消灭失业,或者更富于建设性,使全国人民得到工作权利的机会,直到人们宁愿要更多的空闲时间而不愿要更多的物质东西为止。从社会的观点出发,一个人的生产虽然不一定足够支付他和由他供养的人的消费,但如果除了雇佣他而不是不雇佣他的成本——这不同于他们的消费——还能有余,那么,这个人就是值得雇佣的。如果完全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只要这个人能靠生产对他和由他供养的人的生计费用作出贡献,他就是值得雇佣的。这一标准是和人情标准不同的,按照后一标准,他之所以值得雇佣,是因为让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在闲散中堕落下去并让他成为自己和他人的负担是不好的。但是,两个标准都导致相同的结论。

资本主义社会不会也不能这样办。除了一些个别情况外,不能期望私人雇主在看不到雇佣工人有利可图时去雇佣工人。如果他们那样办,他们很快就会破产。在社会和资本家的观点之间出现这种差别,原因是十分明确的。社会如果不准备让人民饿死,就不得不抽取它的劳动力的总产品来养活它的全部成员,这个负担不能强加给任何其他方面。私人雇主解雇一个人时,对被解雇者不再负任何责任。他能够并且真的把支付这个人费用的担子强加给其他方面——加给另外一个雇主(只要这个人能找到别的工作的话),或者加给整个社会。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从社会的观点出发来雇佣人时,人们仍会失业。

这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根本缺陷。并且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随着资本主义愈来愈受垄断组织的控制,它的缺陷也变得愈来愈严重。任何经济学家都将告诉你,这是因为垄断者通常要比自由

竞争的资本家更早地停止雇佣人。较老的经济学家有时甚至否认“非自愿失业”能存在。因为据他们说，只要愿意接受足够低的工资，每个人都能找到愿意雇佣他的某个自由竞争的资本家。我并不认为真的曾经是这样，但它一度显然比今天真实。垄断资本家在靠雇佣人能获取任何利润时就不继续雇佣人，而在这种情况下大多自由竞争的资本家是巴不得这样做的。垄断资本家在其使用的资本获得的总利润最大时突然收缩，这意味着，他害怕更多的生产将不得不降低物价，从而破坏市场。垄断资本家十之八九宁愿短缺不要丰裕，因为短缺意味着高价。但是，货物短缺也就意味着就业不足。

社会主义计划的目的，应该是安排全体人民为总的利益做有用的东西或有用的服务工作。在上一章里概述的各种措施的目的，就是打算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的事，并因此使不能为维持自己和由他们供养的人而获取必要工资的人减少。但是，甚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做了我们能做的一切去实现这一点，贫穷问题仍旧不能解决，虽然其严重程度将会大大减轻。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工资既不考虑必须靠工资生活的人的数量，也不考虑他们的需要。一个有十个小孩的人，并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比单身汉得到更多的工资；一个需要花很多钱照料多病的妻子和生病的孩子的人得到的工资不会比一个其家庭健全并能够照顾自己的人得到的工资更多。一个因偶然事件而半残废的人就成了一个“领取补贴费者”，收入比过去更低，因为工资是同一个人能够生产什么联系在一起。如果由于偶然事故他的需要增加了，工资制度对此并不考虑。

因此，即使我们重新安排从而使每个愿意并能够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贫穷将依然存在。贫穷将继续使人口众多的家庭、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及主要养活家的人是残废者的家庭苦恼。除非我们从根本上修正我们为病人提供生计的方法，要不然主要养活

家的人一旦生病或暂时不能工作，贫穷将继续使大量的家庭苦恼。贫穷也将使许多老人痛苦，除非我们对养老金更为慷慨得多。贫穷将使寡妇、孤儿和大量由于体质上或精神上的缺陷而不能工作的人苦恼。而最糟糕的是贫穷将使在这样一些家庭长大的大量儿童遭受痛苦。自然，全国有相当高的比例的儿童属于子女多的家庭，而贫穷的重担也最广泛地落在这些家庭。这种情况不断加剧，因为从整体来看，薪金较少的人比薪金多的人有更多的孩子，这是由于前者较少控制生育。即使我们采取了明显切合实际的方针，保证每个有一双能劳动的手的人都有工作，仍然会存在可怕的贫穷问题。

使社会全体成员在生活中有一个不错的机会，使他们免遭不必要的痛苦，仁慈而又友好地使那些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受苦的人得到安排，乃是任何象样的人类社会应负的责任。这应该是十分明显的，以致几乎不需要阐述。社会主义者承认这些责任，很多不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也承认这些责任。但是，对这一点的承认并不形成我们共同的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并且在此基础上试图进行我们的社会事务会遭到强烈的反抗。这有一些原因。有一批人总是害怕可能采取的行动会妨碍“父母的责任”和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家庭的神圣性，因而反对国家为全国儿童承担新责任的任何建议。过去有一个时期，这些“家庭生活”的支持者常常反对国家提供的教育、医疗检查或治疗，反对实际上我们现在作为正常而必需的事物接受下来的任何社会服务设施。他们现在不再反对这些服务设施了。但是，不管这些设施扩展的情况多么强有力，他们的确仍在反对它们的任何扩展。

第二部分意见虽然有些重复，但决不同于第一部分。它反对国家采取行动，理由是这种行动破坏“私人负责”的基础并使人依赖国家的帮助而不再自行谋生。这种反对意见主要在建议帮助成

年男女的时候起作用。像“家庭责任”的辩护人一样，他们通常是在反对到最后一刻以后才接受既成事实，但接着反对再做任何事情。有关工厂立法的长期斗争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态度。这一斗争早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工厂法的反对者们，甚至承认普遍雇佣五岁和五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劳动多达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的时候，也还是以十足的放任主义为理由反对童工立法。他们被迫容许这种立法后，又反对关于青年男女的劳动立法，一直到工厂中的可怕恶行一再揭露迫使他们在这一点上再退让为止。以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反对任何关于成年人的立法。一连串严重的煤矿事故迫使议会采取行动，不得不同意关于煤矿工人的专门立法——一项后来扩大到某些其它危险行业的原则。但是，甚至这时，工厂立法中关于劳动时间的规则也没有直接应用到成年男人身上，尽管很多成年男人在妇女和青年确实从立法中得到益处的同一工厂里工作。同样，除了极少例外，工资法规只在妇女占优势的行业中实施。一般地说，我们的活动仍以成年人应当有能力照顾自己的设想为依据，尽管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证据表明许多成年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在许多比较分散和缺乏组织的职业中，令人憎恨的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依然存在。很多拿低工资的劳动者都是精神上和体质上低下的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实情况。但是，对于社会来说，这毫无疑问更是承担一定的责任照顾这些人的理由。这些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弱者被抛弃一边孤独无依时并不能成为强者，他们的情况更加恶化，从而使问题更为严重。

我没有篇幅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一点。想得到更充分的证据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我的小册子《现行工资》或在最近几年任何大的社会调查中找。一次又一次揭露，提出的事实被顽固地置若罔闻，甚至被很多职业改革家（以及大多数工会）置若罔闻，这清楚地表

明,这样的传统力量还很强:个人要为自己的不幸负责,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如他是一个孩子或是盲人,或是精神上有缺陷的人,或是女人,国家没有义务进行帮助。

第三种反对形式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并不把立场建立在个人或家庭负责的教义上,他们反对国家采取行动的理由是它会置利润制度于死地。自从经济学家纳索·西尼尔(Nassau Senior)杜撰出他的被人嘲笑的论点以来,这种争论方式是人们所熟悉的。纳索·西尼尔的论点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来自雇佣劳动的“最后一小时”,因此,如果从工作日中去掉一小时,利润便会消失,工业将停止不前。这种论点问世以来,劳动时间一次又一次地减少——这通常是工会采取行动的结果——但并没引起这种预期的灾难。尽管如此,这种论点以一种不那么太荒谬的形式继续起作用。今天持这种论点者争辩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经不起努力扩大社会服务,因为这种扩大的花费将使不列颠的工业在世界市场上无法进行竞争,或使资本的投资能力枯竭,或使资本家继续雇佣劳力成为不合算的事。

这些论点是半真理和谬误的混合物。没有人否认,一个国家能使其人民达到的生活水平是受它的生产能力制约的。这是如此清楚明白的常识。没有人否认,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成本增加到超过竞争者的生产成本,成本增加了的货物就会赔钱,因而在国际资本家的竞争下,任何为世界市场生产的行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和条件都受到限制。另外,没有人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是为了利润,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利润。因此,在利润下降时,私人资本有投资下降的双重倾向。但是,这一点也没有证明反对进一步发展社会服务者试图证明的事情。因为,第一,较高的工资和较好的条件往往导致较高和较好的产量。第二,较高的工资导致更大的和更可靠的国内市场,并比市场上的其它东西更少受

上下波动的影响，因而很多行业都倾向于在高标准上建立稳定的雇佣关系。第三，只有资本家在别处能为他们的钱找到更为有利可图的出路时——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容许他们不顾本国的需要而去漫游世界寻找有利可图的发展方法或投机机会时，他们才停止投资。第四，如果资本家投资少了是因为国家从资本家手中取走而转付给较穷苦的人民，那么，钱并没有消失。让较穷苦的人占有这些钱，对资本家不断地提出需要，可能比钱留在反复无常的富人手中会结出更多的果实。如果因此而使私人的投资太少了，政府可以以社会的名义用社会最迫切需要的企业形式自己投资来弥补不足之数。

反对搞较好的社会服务的人们说，啊，到底在这里露出马脚了。你们是在打算用发展这些社会服务的办法作为使私人企业的资源干涸的手段，然后再求助于社会主义，使被你们自己的行动弄得干涸的河流重新流动起来。对了，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呢？如果，像这些批评家所主张的，如果资本主义无力给社会每个成员一个良好的生活机会和对付资本主义灾难的令人满意的安全措施，为什么不实行能做到这些事并至少能达到为保证做到这些事所必需的程度这样一种制度呢？如果资本主义不能提供社会安全的保证，那么，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下去的最好论据。的确，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遭到失败才使社会主义的需要越来越迫切。

但是，这些批评家说，国家为提供你们所需要的社会安全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它为所有的人提供免费的初等教育和为正在成长的少部分人提供免费的中等教育。它免费为学校儿童进行体格和牙齿检查，并向确实需要的人提供补助金。它允许不断增加免费或廉价牛奶的数量，并给地方当局权力提供免费或廉价学校膳食。它支持工人获得生病和失业保险，并在工人花光保险津贴时通过援

助委员会或社会援助委员会为其找到解决其需要的其它方法。它与民办公事业机关一起提供免费或廉价的医疗。它给老年人养老金和给一些寡妇抚恤金。它强迫雇主付给那些由于为他们服务而致残的人以赔偿费，甚至对不是由于雇主的过错而致残的亦是如此。它付给失业的儿童补助费。对于那些不包括在专门规定内的人，最后还有社会援助委员会。要想不出现奖恶欺善的危险，要想避免使那些自己养活自己的人觉得应当少得的邻居是在被国家不公正地供养，穷人还能要求什么更多的东西呢？还能更多地给穷人什么东西呢？

在这些方面，就算国家现在做的比它过去做的多得多，而且结果已经大大减轻了人民的痛苦，但这些社会服务机构却是通过一条奇怪的偶然道路发展起来的，其中仍存在很多差距——更不用说其主要的过失是，它们大部分仍然是为了掩盖那些不应当让其产生的邪恶。例如，为什么一个有疾病保险的工人，其妻子和孩子却得不到保险？为什么失业者有被其供养者的补助费，而生病者却没有？为什么疾病津贴比失业津贴要少得多？为什么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上述两项津贴都比象样的生活收入低得多？为什么工人必须从他的工资里扣除一部分对一些服务机构的花费进行捐献而不对其它的花费进行捐献呢？为什么为健康保险费用捐献的比例必须大大高于为失业保险捐献的比例呢？为什么有时候有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而在另外的时候却不调查？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有如此多不同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为什么拿工资者就能享受一定的社会福利，而一些自立的工人，如经济情况并不好的小店主之类，却得不到社会福利？为什么一些公共福利设施因地而异，或者就健康保险来说，一家家“得到许可的公会”^①都不同，而另外一些公共福利设施却建立在全国相同的基础上呢？为什么付给的赔偿费

^① 英国的一种健康保险公会。——译者

限制在以前的工资的一部分以内而不管需要多少呢？为什么学校的膳食和学校的牛奶，在一些地方供给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则不供给，或者根据完全不同的条件供给呢？为什么国家不能下定决心取消各个服务机构用不同的标准给被供养者补助费的办法而负担起赡养儿童的费用呢？

这些问题可以几乎无限地写下去。这些严重的畸形物的存在是因为没有人把社会服务机构作为一个整体计划过，或者打算提供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各项具体服务机构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设计和扩大的，常常更像选举时的财产登记，而不是考虑优先需要的任何正当理由。这样，疾病补贴可能维持在低水平上，主要是因为政治家们不愿意和大保险公司及友好社团作对——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严重浪费的、极端邪恶的私人生活保险制度仍被容许存在下去。地方上的差别大部分仍存在，这是因为农村工人收入很低，而国家担心在农村地区给予相当好的社会福利会使农业工人在生病或不工作时比健康和有工作时生活还要好。出于类似的考虑，也把失业保险控制在低收入水平上，以免超过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的工资。只要可能，援助委员会就有意实行一种“以工资为限”的做法，以免社会付出的款项超过正常的工资。

整个情况乱成一团。只要国家拒绝承担总的责任来使有工作的人得到相当的工资，就一定是这种情况，因为人们没有工作时得到的维持家庭生活的收入比有工作时得到的收入还多，那是件坏事。但是，甚至在失业补助和救济金各等级少到只够或者甚至不够维持身体健康的需要时，有工作的人应得的工资仍然那样低，同时又没有过舒适生活的其它任何补助，那就更坏了。

除了解决就业人员的收入问题，没有其它可行的办法来逃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解决就业人员工资的可行办法有二，当然，这两种办法可以结合起来。一个办法是，把合法的工资章程（这种

章程现在只适用于少数几个——主要是妇女的——行业),扩大运用到所有的行业。要做到这一点,部分靠建立有权决定合法的最低等级工资的新行业会社;部分靠规定最低等级的法定工资,低于这个等级雇佣任何人都将是不合法的。另一个办法是,为那些从国家得到的补助——包括现金的和实物的——显然过少的人提供有效的收入。

就我个人来说,我欣赏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的做法。在我的小册子《现行工资》里,我曾试图表明,许多付给最低工资的职业不是在不景气的工业里,同时存在这些低工资不是因为工业没有能力付给更多的工资,而是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就如此低。在我们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存在大量几乎完全丧失讨价还价能力的工人。他们没有组织到工会里来和工会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穷得不能对工会作出贡献。他们被迫从事能得到的任何工作,而不管工资多少。几年以前,失业保险法律委员会出于本身的目的编辑了一张行业一览表,在这张表中,成年人的工资少于一周二十五先令。这张表包括下列人员:舞厅服务员、剧院看门人、酒吧间男招待、跑狗场狗舍收拾者、影院工人、汽车间雇工、鱼贩子助手以及大量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属于不景气行业的其他人。给这些人支付工资只是因为我们的文明到处都留下那些被抛弃的社会最低层的人。他们没有学过任何正规的手艺。他们从一种低工资的工作游荡到另一个这样的工作,毫无改善状况的希望。

这种状态是耻辱;除了靠法定的工资章程外,没有改善这种状况的任何办法。如果有人争论说,这样一些人不再有任何价值,那么,上述委员会的报告便提供了答案。从三百八十九个每周收入少于二十五先令(1937年)的成年人中,委员会发现其中二十二个受害于明显的身体缺陷,二十四个属于智力低下者,还有十一个年老的,而余下的三百三十二个干这种苦差事的人则完全不是由于

上述原因。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问及雇主为什么付给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工资时，他们的唯一回答是，这些职业——请注意：不是这些男人本身——“属于下等”。也许大部分男人实际上也“属于下等”。长期生活在这些工资所意味的生活水平上，谁又能不“属于下等”呢？

当然，有些很低的工资是在不景气行业中，如棉织业，但是，大多数低工资并不在这种行业中。有些行业如果不得不支付给全部工人以能维持普通家庭生活的工资，它们实际上就会消失。还有些行业雇佣的人有所减少，这既是由于生产规模缩小，也是由于使用机器的情况越来越增加。在这些条件下维持工业的活力难道不合意吗？在一些地方用人力劳动来代替机器只是因为人力劳动可以付给血汗工资，这不是非常好的事吗？

然而，我承认，实际上有如此多的行业仍旧只付给血汗工资，以致把所有的工资迅速提高到完全可以容忍的标准而又不引起很大的混乱，那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了。我愿这种反常的低工资尽可能快和尽可能多地提高。我确信，最低工资总条例，包括劳资协商会制度的附加部分，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方法。但是，要迅速把工资提高到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可以过象样的生活这样的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必须另外用其它方法来增加最低的收入。

给予家庭补贴，即为每个学龄前儿童或学龄儿童付给母亲一种额外收入，是我一直欣赏的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我希望这种补贴由国家付给，由一般税收的钱开支，因为这是唯一较好的办法。这样，就不用号召各个私人雇主付出这笔钱，因为要让雇主付出这笔钱，他就会不去雇用结了婚的人。“雇主联营基金”是应当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管是不是被雇佣者，也不管他是否暂时有工作，都应该付给补贴。在工人离开工作时，或生病或参加罢工或失去工作时，补贴都不应当取消。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像他一

样，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吃饭和穿衣。靠雇主联营基金支付补贴会把太多的权力交到雇主的手中，因而也就认识不到这种支付代表对整个社会的要求，而不是对任何具体的工业或是总的工业的要求。最后，任何把补贴放在捐献基础上的建议也是应该反对的，因为工人通过扣工资的办法支付的钱已经太多了，即使他们还能够出钱，那也应当用来改进捐献的现有福利设施，而不是用于新的福利设施。

这样，国家应当支付这笔开支，靠一般税收来增加需要的金额。但是，在这一点上碰到两方面的批评者，他们以这项计划违背工人本身的最大利益为理由进行反对。工会领导人——不是全体，而是其中的一些——争辩说，家庭补贴会被利用来达到降低工资的目的，或者，不管怎样，会被用来阻止增加工资，因此，它对大部分领取工资者的损害将大大超出其对“底层穷人”的帮助。我不否认，在战争时期，在国家真的控制着工资时，家庭补贴可能被用来作为一个理由不使工资随着生活费用的增长而增加。我确实完全否认，在和平时期家庭补贴可能削弱工会讨价还价的力量，相反，通过给予工人更多的权力去反对不合适的低工资，家庭补贴一定会加强这种力量。在战时，如果确实没有达到足以维持早先的生活水平的程度，人口众多的家庭就没有权利优先要求那些可以节省下来的东西吗？

工会反对家庭补贴的论据，正如对和平时期的条件发生的影响一样，是建立在完全误解的基础上的。由于对战时条件发生影响，只要工资以外的收入仍是没有控制的，工会的论据就有一定的效力——但也仅仅因为一种非正义导致另一种非正义。

另一条战线的批评更加似是而非。他们辩解说，实际上，国家只能为全部社会福利设施提供一定限度的金额。如果使人口众多的家庭得到的补贴达到所期望的程度，给予实物——学校牛奶、学

校膳食和带有生活费补贴的更多的奖学金、更好的健康福利设施等等——不是比把钱发放给那些可能把钱用在酗酒和赌博上而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的父母更好吗？好，我就是要所有更多这样的东西。并且，如果我必须选择的话，我可能把它们中的任何一项优先于用现款支付家庭补贴来考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必须选择，我两者都要。如果资金真的短缺，那就让我们对有两个被供养的孩子的家庭实行家庭补贴制度好了，这是比较经济的。不过，我们至少要有这样一个制度，因为没有一个我见过的实物救济制度真正为所有人口众多而苦于丧失劳动力的穷苦家庭提供生计，或者能为这样家庭的孩子提供一个生活有良好开端的合理机会。

那么，让我们要求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使我们社会的每个家庭都能正常地得到一个可以容忍的生活收入，无论如何要足以使其成员的生活高于郎特里先生的贫穷线。作为劳动报酬的收入应该付给多少，对那些不能赚取足够收入的人应根据需要付给多少，或应支付现金多少，通过公共福利机构付给实物多少，这些都是重要性稍次一点的事情。重要的是应该完全排除非常匮乏的情况；而向这个目的前进的首要步骤就是刚刚概述的那些东西。

就人口众多的家庭来说，除了提高工资和给予补贴以外，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一个生了病或者家中有病人的人，比他或他的家人健康时需要的收入更多而不是更少。不把疾病津贴增加到可以容忍的生活水平——至少达到郎特里先生的“人类需要”的最低标准，或者继续把妻子、儿童和无工资收入的人排除于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之外，都是不能原谅的。应当有充足的普通开业医生服务机构——另有专家医疗机构作为补充——对每一个愿意利用它的人都敞开大门。这种国家医疗系统应当和设备齐全的医院联结在一起，为各种偶然事件致伤和疾病医疗。义务医院和由地方当局所有的医院应当融合到一起，扩大成这种新的医院系统。同时，应当

使疗养院、诊疗所和适当的全面医疗系统的所有附属机构得到发展。我深信，整个医疗都将会是免费的，因为对于国家来说，鼓励人民及时去看病治疗而不要等到病重才去求医，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一个人生病时需要收入，那么，失业时也同样需要收入。国家的目标，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应当首先是防止失业。需要任何大规模的救济，其本身就是承认失败。但是，即使国家打算认真地防止失业，某种程度的失业仍然存在。任何一个被解雇的男人或女人的收入，也不应当低于郎特里的最低收入。但是，仅仅救济被解雇者是不够的。应以最大的努力去训练他们从事有用的工作。一个工人可能因其行业衰退了而失去他的工作；如果这样，应当训练他去干另外的工作。他可能因健康不佳而失去工作；如果这样，应当采取措施恢复他的精力。他可能因自己的过错而丢掉工作；如果这样，应按照其过错的性质给他改正的机会。最重要的是，每一个男孩或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既要为能从事一定的职业而受到一定的训练，又要为使他们能在将来需要时容易获得另外的工作而受到一般的“灵活”训练。我们现在教育制度的严重失败就在于没有为此作准备，很多“不能被雇佣者”和近年来遭到挫折的人就是这个仍然完全没有明确教育目的的教育制度的产物。

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谈。现在，我要谈的是失业。在这次战争结束时，将有大量男男女女从军队、后勤部门、军火工厂和所有那些他们暂时占据着别人位置的机构中复员。让成千上万来自军队的没有学过任何行业的青年人在这个工作非常稀少的世界上自寻出路时，除非给这些工人一个战后碰巧要大规模重新生产什么的适当机会，否则，就会产生巨大危险。这次将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战争变得高度机械化了，军事部门本身不得不对大部分新兵进行某种训练，而这种训练在民间生活中是可以用得上的。但是，不管是来自军队的人，还是来自军火工厂的工人，他们战时获

得的才能要适合和平时期的需要，就要重新调整。为了适应战后工业的需要，必须大规模地重新培训。如果这一任务被忽视或被草草处理，那么，将灾难性地制造出“不能雇佣的人”和不称职的人，从而使国家生产能力和让全体公民过象样生活的能力下降。

在男男女女都在受这种重新培训时，他们将不得不保持在一般老百姓的水平上；因为如果有谁以为，在任何条件下不需要的战士都会答应别离妻子和家庭而仍留在部队里并接受培训，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郎特里的最低标准必须付诸实施——当然，这一标准要按照战后实际价格的水平调整。

一个对于就业者、病人、失业者和正在受就业训练的人都适用的恰当的最低生活标准，把我们向我们应当追求的“社会保险”目标带了多远？稍长一段路，但不是全程。因为失去工作能力者、长期体弱者、老年人——事实上，所有经常不能过象样生活的人，都全部或部分存在。还存在一大批因战争致残者，他们在战后的世界上无法找到空缺，又不适合于做普通的拿工资的工作，也不能受训从事新的职业。实际上，从为那些因这理由或那理由而不能自己谋生的人提供收入的广泛意义上说，补助金的整个问题依然如故。

被普遍失业所激动的改革家们，一般总要把人们退休的年龄尽可能地降到最低限度，以减轻劳动力市场的拥塞情况。但是，如果政府行使其责任，未来就不会存在这种拥塞情况。这样，战争一结束，国家就特别需要所有的劳力来修复战争创伤，弥补一般的未了工作，建设一个新的不列颠，以便更好地为它的全体公民提供美好的生活。因此，除了那些实在体弱而痛苦的人，退休年龄过早是不可取的。更确切地说，必须保持尽可能多的人工作，同时在他们不能赚取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过人类生活的需要时，还要给予他们工资补贴。需要补助金并不是为老年人本身，而是为由于任何原因而阻碍了做有用的工作的各种年龄的人。像工人补偿金这

样的非政府办福利，一定要接办；同时还必须作一个总的安排，给那些年老的或年轻的不适合工作的人发补助金，给那些仍能做些轻微工作或非全日工作的人发收入补贴。此外，所有这些补助金和补贴都一定要能保证每个领受者至少达到郎特里的最低标准。

十分清楚，这些社会保险条件不应当只运用于赚取工资者，任何需要这些社会保险的人都应有资格得到它们。那些丢掉了营生或者不能和过去一样继续经营的小店主，那些不能再劳动和从土地上没有获得好收成的农民，那些被取代了职业或工作的人，都应该能够向政府求助，不仅是在任意确定的年龄领取养老金，而且也在需要时能随时提出要求。这样，政府就能对他们说：“你真的不需要补助金。你需要的是帮助，我们会训练你做另一种工作的。”或者说：“是的，你不能工作了。我们会设法使你在合情合理的社会保障中度过晚年的。”

毋庸置疑，这里也含有“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和“健康合格检查”的意思。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能干工作时不去工作而靠公费维持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在有非常好的工作维持生计时要求社会供养。这第二种情况包括一些棘手的问题，即那些申请国家帮助的人应被迫出售自己的产业和靠这样的收入生活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老的济贫法通常采取这样一个原则，即只有完全“赤贫的人”才能申请救济。现在我们认为，在国家答应对某人的穷困进行救济以前，强迫其出售房子或挥霍掉仅有的一点储蓄，是罪恶行为。但是，必须有一个界线。一个人为了保持自己的一座大厦而申请救济，就不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同样，一个人在估计自己的需要时，认为自己已尽了一切努力自助，因而不考虑规定的最低金额，拒绝使用他的储蓄收入维持生活，这也不能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考虑表明，在战后，作为堵塞我们社会保险制度的漏洞的

工具,我们需要产生于现存的援助委员会的某种东西,而且它要有非常广泛的权力和完全不同的基本行动原则。因为,在新时期,标准不是“我们至少能给多少东西就能使这个家庭不陷人名符其实的赤贫和物质上的困苦”,而必须是“这个家庭为保证过人类需要的还算不错的生活需要多少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东西”和“为了使这个家庭的成员将来能用可能的最好方法有成效地为社会服务,我们能做些什么”。

这里尚有一件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关于这件事,这一章迄今还几乎没有提到一个字。这就是教育。一旦当我们决定按照下面这样的原则行动,即国家的职责是使国家的生产力成为最好的,并在社会服务中量才使用每个公民,教育就必然会经历一场令人瞩目的革命。仅仅靠保证每一家庭获得还过得去的基本生活水平,我们就会避免潜在能力和生产力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目前还被允许存在。特别是,如果我们供给每个地方合适的学校膳食、合适的医疗和牙科医疗以及恢复健康的合适机会,我们就会把大多数发育不全的孩子们解放出来——这种发育不全既包括身体上的,也包括精神上的,这是由于早年生活中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的教养造成的。当然,我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坏的遗传和双亲无能的影响,但是,我们将比现在更有能力拯救和发展全国儿童的绝大部分才能,并可满怀信心地期望我们的居民在精神和身体素质方面得到不断的改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用和过去流行的完全不同的精神探讨我们的教育问题。对于父母是工人阶级的儿童来说,迄今为止,受中等教育就意味着有从工人阶级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全部高等教育都明显地歧视被称为“职业训练”的教育。实际上,高等学校中被人喜爱的书本教育,如果不是完全的话,也差不多和职业教育一样是职业性的。其学生大都是宁愿成为教师或职员而不愿成为技

工或家庭主妇的男女孩子。这是由于需要教师和大大增加职员工作造成的，而职员增加是资本主义处在目前“金融”阶段的结果。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非常恶劣的。它导致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发展，不是为自由选择的职业和大部分学生实际想要从事的职业作准备，而是拙劣地模仿我们的旧“公”学为教育特定的统治阶级人才而提供的文化教育。它导致在那些同学关系最新的人中特别努力培养这种“同学关系”，同时，它易于造成势利小人和自封的“绅士”，而不是造就作好了充分准备为在社会普通工作中起应有作用的公民。就自然科学的学生来说，实际所受的教育比别的较少偏离轨道，因为自然科学和生活实际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那种“悬在空中”的教育在自然学科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科学家、甚至确实实的技术学院的学生受势利的影响，受认为高等教育即上等阶级而因此要求社会上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的意识的影响，都不比其他人少。

很多教师努力反对这些倾向；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受这种倾向的影响。但是，这些倾向是很流行的，而且受着英国教育制度结构本身的鼓励。因为在英国国家教育制度中，为下层阶级儿童开办的收费低的学校，一开始就是和为富人孩子开办的收费多的“高级”学校完全分开，至今这种两重性仍控制着英国教育。即使很多普通中学求地方当局给予财政援助，而很多较小的“公立学校”提供的教育比由地方当局开办的较好的中等学校坏得多时，亦是如此。

尽管存在这种两重性，近些年来初等教育的质量仍有很大的改进，同时大多数中等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是高标准的。但是，整个制度可悲地缺乏明确的社会目的，而且只要这种两重性不改变，这种情况就会依然如故。国家教育需要的是培养出有知识的公民，使这些公民了解这个他们将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世界，运用他们

在学校里学会的东西去解决这个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问题。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文化”学科并不比“职业”学科有什么特别的价值。真正要紧的是精神，是用什么精神教课。现行的制度导致荒谬地轻视手工技能，导致荒谬地对艺术和创造性的动力缺乏鼓励，导致培养出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这个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真正机会。那些接受某种形式的中等教育的大部分人，是在十六岁时离开学校的，他们常常只完成那些打算在中等学校里学到十八岁而后继续上大学的人所受的教育的一半，而不是受完这种教育。另一方面，那些在学校学到十八岁的人，一般都没有使用双手的知识——除做游戏之外——他们离开学校时，对于现代生活的技术基础只有极端模糊的观念。那些真正获得这种技术知识并无论如何达到一定程度的科学家，对于其它东西则总是陷于一无所知的境地。他们完全搞不清他们的国家是怎样管理的，他们仅仅涉猎了一点点产生我们的文明的伟大文化传统。

改革这些弊病并不仅仅是更换教育行政机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修改课程的问题，虽然二者都是必需的。教育制度只要直接达到这种程度，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具有清楚的目标和关于教育为之服务的那些目的的知识。我们现阶段所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下决心给每个孩子最充分的机会受益于他们所需要的和能接受的全部教育，就是为新的创造性的思想敞开大门。我们一旦把我们的社会观念安排就绪，这些思想就将开出灿烂之花。社会本身一旦为富裕和为保证全体公民过上好生活所需的一切作出计划，教师就知道应做什么，而教育也就会发生极大的变化——现在要预言这种变化简直是不可能的。书本学习将失去其唯我独尊的地位，而技艺和艺术的创造性将得到适当的承认。甚至初等教育的最低共同学业标准有所改进，高等教育也将标准化。技术教育将不再被认为无关紧要，因为它的社会目的更清楚了，并且将以较大的社

会意义和文化内容进行不同的教授。文学将不再是纯文学，它将和当今世界上的生活艺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痛苦会不断增加；但是教师会更加幸福，因为他们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我认为，幸福的而不是受挫折的教师是成功的教育制度的首要基础。

按教育的形式和数量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并不自以为完全清楚。我深信，头等重要的是，在某种富有意义的形式方面，教育将继续处在青春时期，将直接导致形式完全不同的成年人教育，将吸引比今天更多的各种各样气质的人。我深信，我们的学校，特别是我们的高等学校，应当比今天更紧密地和一般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例如，应当和社会团体中心以及文娱活动俱乐部联结起来，因为这些机构会把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和睦地带到一起。我深信，学拉丁文并不比学化学更好些或更坏些，因为二者作为无生命的记录或者作为活生生的人类价值的体现都可以学。我对男女孩子们学什么比他们怎样学更加不注意。对于崇尚古代学科的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于只为经济机器培养大脑粗糙的人的实际狭隘性，我同样不感兴趣。帮助男女孩子成长为热爱真善美和能做好工作的好工人、好公民和好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个既不知自己在何处也不知自己打算往那里去的社会里，这种教育的特有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这一章里，我试图广泛地说明普通男男女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需要，这是在这些目的能够由集体行动来促进的范围内说的。我在论述的结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国家使男男女女成为健康的和幸福的人的力量在于，那些管理国家的人以怎样的态度寻求这些目标并相信国家能达到这些目标。因为我们只有在真正试行时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同时只有我们中的一些人——一些有足够影响的成员——真正相信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去试行。国家从它的比较积极而又勇敢的公民的信心中得到能力

和质量。“社会保障”似乎象是某种胆怯的思想——宁愿要求保护而不愿冒险的愿望。但是,在那些使他们的目的普遍扩散的人中,做到这一点需要高度的冒险精神;如果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有解放大量创造力的能力,这种创造力现在在童年时期和青春时期被压抑住了,或者在成年生活中受到阻挠,因为这种创造力由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明显盲目性而导致无用。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事业就在于,它在这一点上确实提出了一个清楚而又值得花时间的目标——证明巨大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在苏联二十年来通过社会主义被释放了出来,因为社会主义在那里已经有了机会。我希望,在我们这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机会。这不是为了使们模仿俄国人,而是为了搞出一条走向平等社会的我们自己的道路,这个社会将在我们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基础上设计出一种新的社会准则,并在为人类获取新的征服地时不丢掉我们祖先已经获得的征服地。

注:这一章写在贝弗里奇报告发表以前,这一报告加强了本章的很多结论。

五、一个艰苦挣扎中的世界

但是只为我们自己寻求保障，我们能有什么保障呢？根本没有。社会保障的整个纲领一钱不值，除非我们在自己的国境内以及国际范围内寻求它，或者，除非我们能使世界避免已经横扫欧亚大部分地区并正在威胁其它大陆的毁灭重新发生而得到安全。我们现在全都清楚这一点，就象我们以前不了解它一样。虽然上次战争没有教过我们这一课，但希特勒已经给我们上了这一课，而且目前我们还没有出现忘记这一课的危险。战争结束之后，在政治家们——不管属于什么党的——坐下来安排新欧洲和新世界的面貌时，这种危险便会随之出现。

我们期待他们依靠我们和所有受苦的人民的帮助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和什么样的世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让自己沉溺于梦幻中是无益的。从1918年以来所发表的各种美妙的言辞已经足以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厌烦了。我们要的是比国际友善的言辞或倒霉的国际联盟盟约可靠得多的东西。我们要的是实际而可靠的安排。由于这种安排包括人民之间的真正合作，而不是政治家们在日内瓦或凡尔赛侈语空谈，它的确会带来和平和繁荣昌盛。

过去数十年的经验给了我们什么教训——我指的是在面对明天的问题时，能有什么对我们有用的教训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只是被征服的国家单方面裁军是行不通的，无论如何，在凡尔赛和约的制定者们所坚持不变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结构内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其他“有主权”的国家中是“有主权”

的，只要它的统治者要武装，谁也不能阻挡它武装。那些应该负责强制解除武装的政府，如果打算达到目的，必须用大量武装力量来控制被打败的国家，不只是短时期控制，而是无限期控制——因为一控制它，民族仇恨就继续下去，而一停止控制，它就开始重新武装。如果企图这样做，这种控制的重担对战士和对那些不得不负担费用的人都会很快变成不能忍受的。不要多久，某一个进行控制的国家便会厌弃这种工作，撤回它的派遣军，随之胜利者之间将开始争吵。

这就是上次和平的一个教训。第二个教训是，使被征服的国家贫困是得不偿失的。对那些企图强求赔款者来说，赔款不是收获而是损失。赔款打乱了世界贸易，引起了世界性的萧条，并且，即使撇开赔款在引起这次战争方面所起的作用，它们带来的经济损失也比它们的价值大得多。再则，对被征服国家的贸易采取惩罚性的措施，撇开这种做法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不谈，它还使世界贫困。因为正象经济学家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国家的确要靠各自繁荣而兴旺起来。例如，如果德国人穷到不能够买别国的产品，中欧和东欧要繁荣是不可能的。假如一个大国能从地图上一下抹掉，象希特勒曾一再宣称他要抹去大不列颠的意图那样，这伤口可能及时愈合，世界贸易也可能重定方向。但是与此同时，那些依靠不列颠市场的国家将因此大受其害。此外，如果不是从地图上抹掉一个国家，而仅仅是使其贫困，那么只要贫穷存在，困境就会继续下去。

第三个教训是，说服那些爱好政治独立的政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有效的经济合作是不实际的。每一国家的资本家集团必然为自己的目的想方设法利用其政府，并把困难推给其它国家。大国的每一资本家集团都要求本国政府奉行牺牲它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这样的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并且，在资本家自己形成

超出国界的国际性联合集团的地方，没有哪个国家能控制那些联合集团的所作所为，或阻止它们剥削普通人民群众。

我知道，这样分析问题是把两个教训合并成一个。我是在同时归咎于国家主权和资本主义制度，其实，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它们是不同的，但它们又是非常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从历史上看，独立的主权国家是和资本主义肩并肩地发展起来的，并且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每个政府都是为了本国的资本家，是国内外财产权利的维护者，是商人和商业帝国的建造者及在其国外冒险事业中的租借地猎取者，是国际交易上层领域的本国银行家和财政金融家的保卫者，总之，是在本国资本家利益和其它国家资本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的本国资本家利益的代表者。这不是偶然的，也不仅仅是资本家精心策划的阴谋的结果。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政府允许国家财产被利润追求者集团所占有和控制，它就必然会保护这些财产。这些财产是国家收入和人民生计的源泉，它不会因在这样的控制下而减少一点。如果本国的资本家赔钱，国家就失去收入，工人就失去工作。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共存的必要条件是它们必须共同工作。这是无法改变的。

两次大战之间的第四个教训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在相互独立的主权基础上彼此平等纯系空话。小国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除了被默许的之外。在今天的世界上，小国是无力武装对抗那些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它或践踏它的大邻国的。没有一个小国能够或有资财维持可以抵抗大国武装力量的一支陆军、海军或空军，甚至能抵抗到足以使大国进攻它要反复考虑或者足以使那些愿意援助它的其他国家有时间援助它。小国的武装力量是无用的，除非作为大国的辅助力量。一个小国除了从大国购买物资外，也无法装备它的武装力量，因为只有大国才拥有现代战争所需要的全套工业设备。

小国在经济上也不能独立自主。它们必须使它们的货币同大邻国的货币联系在一起,并且必须调整它们的经济,使之与大邻国的需要相适应。如果这条规则在这里和那里似乎有所例外——譬如瑞典——那么这是由于这个小国拥有特别受人欢迎的物资这样的好运气,或是由于这个小国特别贫瘠,以致它不能成为掠夺性的大国想占有的一个目标。

在日内瓦政治的伪装下,小国在某种程度上尚能扮演平等的角色。但是,它们的命运和未来丝毫也不因此而少受少数大国行为的操纵。

我们早就该吸取的第五个教训是,资本主义不管过去可能有过多少成就,再也不能创造出富足了,再也不能保持人民充分就业了,再也不能开发世界的资源来使普通人发财致富了。无论在哪里,大资本家已经成了争取垄断特权的呐喊者,成了反对“产量不受控制”的坏处的鼓吹者,成了被他们称之为“多余能力”的破坏者,成了新发明创造和新资源的收买者。他们收买这些不是为了充分利用,而是免得竞争者掌握它们并利用它们去创造他们不愿要的丰足东西。每个资本家集团都为税则、限额和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吵嚷呐喊,每个资本家集团都尽力限制新竞争者进入其贸易或市场的权利。每个大资本家都积极地收买较小的资本家,以铲除他们的营业。而较小的资本家们无论在哪儿也组织约束性的贸易联盟来控制销售情况和防止物价跌落这个祸根。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再也不能骄傲地宣称,资本主义意味着“企业自由”;他们不得不讲些“合理化”的好处。但是“合理化”通常意味着使别人的工厂关闭,以便增加自己剥削消费者的力量。

有五个教训,此刻每一个虚心的人都应当吸取。让我概略地重述一下吧。

1. 在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体系内,要长期有效地解除一个大

国的武装,那是不可能的。

2. 使别国人民贫困对一国人民是无益的,尽管对个别资本家可能有利,因为各民族的兴旺昌盛要靠各民族的繁荣。

3.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独立主权国家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因为各国政府必须尽力为本国资本家的利益效劳,只要这些资本家仍控制着经济,生产、就业和税收能力就取决于他们。

4. 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国和小国,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能真正地平等相处。

5. 资本主义已经明显地显露出,它不能最好地利用生产资源,它已经愈来愈乐于垄断、限制和通过大极权主义国家来消灭那些较小的企业资本家。

如果这些是教训,那末,为了实际上指导我们,我们打算从中吸收些什么教益呢?回到被希特勒毁灭了的旧欧洲并不符合我们的目的,这是清楚而无疑的常识。如果作为军事胜利的后果,我们恢复了旧欧洲,我们就会不仅使我们自己陷入另一代人时间的人为贫穷,并且在贫穷结束以前又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就人的精神而言,甚至这样的结果也比纳粹暴行取得胜利要好。但是任何明智的人所打算达到的都不是这个结果,除非他被民族主义迷了窍或者坏到把资本家本身的利益放在社会福利之前。卑劣的政客和胆小的君主可能追求这样的目的,因为他们不能正视那种他们再也不能作为高贵者在其中大摇大摆的欧洲思想。半盲目的民族主义者也会追求这样的目的,因为他们看不到真正的民族精神在一个有计划的超国家的秩序中才最能找到表现机会。愚人会追求这样的目的,因为他们不需要思想,并且只要求忠于死板的传统。资本家骗子会追求这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哄骗卑劣的政客将比哄骗新世界秩序的领导者更容易。普通明智的人都希望世

界更富足更安全和有摆脱战斗休息一下并过自己的生活的机会，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他们希望有一种世界秩序坚强到足以防止战争、废弃垄断，打算以丰裕取代匮乏和使他们的目的不是政客或国王或财政家或垄断资本家的目的，而是由政府追求的和由社会制度的根本特点保证的目的。

如果我们要计划一个超国家的秩序，我们应该怎样计划它呢？如果我们要计划一个摆脱资本主义限制性和解放人民大量劳力的制度，我们应该怎样使计划这样一种制度和动员每个可能的同盟者反对纳粹企图统治世界这一当前需要结合起来呢？十分明显，在我们为战胜纳粹必须使用的力量中有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现在似乎否定唯一能够保证和平和安全的超国家秩序。我们的困难任务是，使民族主义者相信，民族主义的真正利益不在于主权独立，而在于共同完成建立超国家秩序的任务；我们要使他们相信，人民决不能靠“各人自扫门前雪”得到安全，而只有关心和自己的事混为一体的世界事务才能得到。如果我们要欧洲和平或欧洲与其它大陆之间的和平，作为这种和平的基础，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继续存在就能保证和平和繁荣的社会秩序。不建立这种秩序，我们只能面对持续不断的国际敌对局面，结果只能是纳粹统治下为战争而武装到牙齿的欧洲，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福利，除非“贫穷”达到对优越种族的计划发生坏影响的程度——实际上，这是大奴隶农场制度，主人在这里关心奴仆的福利，只是达到“福利”意味着他自己的利润的程度而已。

民族的真正价值是文化价值。文化价值不要求拥有绝对的政治主权，也不要求拥有不顾及更广大的共同利益的经济自决权。文化价值要求在那些影响个人日常生活及与别人的重要关系的事情上有自治权。文化价值要求在社会以及私人事务中都使用民族语言，要求用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知识教育孩子，要求自由地庆祝民

族纪念日和用各种人文学科和生活礼节教养民族的天才，要求对于所有在民族范围内能有效地处理的事情都由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权。文化价值要求办理民族事务的公务员说民族语言和遵守民族思想习俗，要求对犯罪者由本民族来处罚和由具有同样民族传统的人来审理。但是，这些民族要求和对更大的社会单位的责任完全一致，也和比民族更大的区域的主要经济和政治事务组织一致。如果民族打算生存下去，就必须如此，因为民族孤立主义明显地和现代世界的技术情况不相容。在二十世纪，民族不能孤立生活，它们必须想出共同安排它们事务的办法，或者屈服于由“优等”民族来安排它们的事务，而这些“优等”民族已经使民族主义转变成帝国主义，它们把自己看作被历史选中的充当在其他民族头上作威作福的角色。

在超国家秩序内，没有任何普通男男女女所要求的作为自由伙伴不能享受的东西。在这样的秩序内，他们能用自己的语言和自己选择的民族官员管理民族和地方事务。他们可以有结社自由，有发展他们的民族爱好和文化遗产的自由，有庆祝民族的节日和成就的自由，有崇敬或不崇敬上帝的自由。但是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征服自然界达到如此程度的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小得无法获得完全的独立。今天，独立的民族就象几个世纪以前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形成的独立城市一样，已过时了。当今民族不能独自生存。它必须或者统治其它民族——只有大民族能奢望这种统治——或者本身被其它民族统治，或者设法建立一种既没有统治者也没有被统治者的超国家的国际礼让来逃脱这种困境。一个象爱尔兰一样的岛国，或者一个象瑞士一样的山地国家，可以根据对这种真实情况的认识设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除非欧洲其它国家能够建立超国家的统治形式，否则象这样一些国家是不能站立起来的。它们将被消灭掉，并被吸收到较大

的民族帝国中去，除非欧洲各国人民在超越国家的区域内团结起来。

如果真打算实现这种团结，它必须建立在可信赖的经济基础上。欧洲各国人民必须开始为增加他们的共同财产而工作，这种共同财产包括大陆的全部自然财富，包括在这些财富上由人的劳力创造的全部基本资源，包括今天用来开发这些财富的全部人力和智力。为了指导这一工作，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经济计划；而为了专门执行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个协调整个超越国家的区域的共同服务机构。例如，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运输系统，它必须要建立在主要铁路、水路和公路系统的国际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在国际商船队和国际空运机构的基础上。必须有一个协调的动力系统，它必须建立在电力发展的总计划基础上，用煤、石油和水力资源给大陆的每一部分提供廉价的电力。还必须有一个国际通讯系统，它必须包括一个既为了传播新闻也为了在各国人民中鼓励国际觉悟的由国际管理的无线电服务机构。

把主要的开采工业、冶金工业、机器生产和飞机生产置于国际管理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军备生产所依靠的工业，也是资本货物的重要供应者。协调一致的欧洲计划意味着，工业发展工作必须为整个大陆着想；给予新的生产设备哪一种类型的投资和给予何处都将由国际决定。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大事，因为新欧洲最难对付的任务之一将是促进最落后的地区工业化。没有进一步的工业化，象波兰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就必然会在贫穷中衰退，并受到人口过剩的压力。开发它们的资源，决不会对发达地区的工业产生不利影响，而会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为它们提供较好的市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没有外来的援助，要为其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本是不可能的，通过完全独立的国家的国营企业或政府采取“外国投资”的形式给予援助也不合乎需要。这样的外国投资会

造成帝国主义和一国人民剥削另一国人民。就主要经济发展而言,需要的是,把整个投资事业置于纯粹国家范围之外,需要在国际范围内把这种投资组织起来,使之作为负责国际计划的权力的一个职能。

再以“外贸”问题为例。在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内,当货物从一国运到另一国时,显然应当不存在关税问题。在超国家的区域内,边界应当象兰开夏和约克郡之间的“边界”一样,或者象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之间的“边界”一样无关紧要。大概要想一下子消除关税壁垒太困难了。如果如此,那就必须分成一些阶段来做。但是,也许除了突然完全倒转过来以外,就没有完成此事的办法。

在合起来的超国家地区的边界上是否将存在关税或其它贸易壁垒,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就这一点来说,没有同样的缺点——关税壁垒和共同的超国家计划发展不一致。在单一权力下计划全世界生产,目前可能还是一件野心太大的事业。在新时期将控制世界生产的大经济单位之间,必须有管理商品流通的规则。我深信,关税不是实现这种管理的最好办法;但是我宁愿现在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如果整个超国家地区要组成一个巨大的自由的内部市场,那么它显然需要拥有一种共同的货币。在该区域内,货币必须按照共同规划的票值到处通用。因此,主要的银行业务将不得不国际化。此外,使整个银行体系国际化还有一些非常强有力的理由。任何协调一致的经济计划一定不仅是一个生产计划,而且必然也是一个财政计划。计划的所有各个部分在财政上所需要的贷款必须是随要随有的,而整个信贷制度必须适合超国家计划的需要。一个国家将再也不能依靠操纵货币随意把本国的困难转嫁给其它国家;稳定生产产量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将成为超国家企业的事。因此,所有的银行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管理通货和贷款条件或者

为生产者或商人提供贷款的银行，都必须成为大超国家银行体系的一部分。

整个这个计划的目的将是增加有用的货物和服务，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十分明显，这个目标必须是尽可能多地在全欧洲建立一种近似的生活水平。必须有共同决心结束折磨许多农业国家的严重贫穷状态，使它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到接近于比较先进的国家。经济统一不会自行实现这一点——美国的例子就是证明，纽约或加利福尼亚的富足和南方以及很多农业地区的原始贫穷状态同时存在。能医治这种贫穷的只有计划周密的行动——在落后地区进行资本投资，加强生产技术方面的教育，在人口密集而不适于高度经济发展的地区，促使人口自由流动。

我在上面已经尽力概述发展一个有成效的国际经济计划的基本条件。在这样做时，我丝毫没有涉及用来实现这个计划的经济制度。但是，十分清楚，除非在基本工业和服务设施公共占有制的基础上，否则，这样的计划是实行不了的，甚至稍微有点类似的计划也实行不了。如果苏联的主要资源和生产工具仍是私人占有，它在其广大地区实行计划会前进多远呢？就计划来说，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并不需要所有的工业和服务设施都实行集体所有制。但是，其它部门所依靠的基本的工业和服务设施，必须由指导计划的人直接控制，不为任何私人利润而是为整个社会得到好处而经营。如果社会本身国际化了，那么，这意味着这些基本服务设施不是国家管理而是国际管理。银行、主要的运输手段、电力站、煤矿、油井、邮政机构以及为制造资本货物（或军备）而提供主要材料的重工业——所有这些都应当不是由加入超国家联盟的各国而是由该联盟本身来掌握和管理。

这样，计划超国家秩序的必要条件就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导向建立在超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一个国家要求有权违反超国家

社会福利而滥用其经济资源，并不比一伙私人资本家这样做灾难小。

我有一个感觉，对我的很多社会主义者伙伴来说，我在这一章里写的许多东西似乎可能是乌托邦，甚至可能是不可取的。因为尽管社会主义一直声称是一个国际运动，实际上它主要是在国家路线上发展的，因为每个国家的社会党都企图在本国取得政权和要求由本国政府为本国人民的利益实行基本工业和服务设施的国有制。这是很自然的，只要是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一样，就不得不在独立的民族主权的国家结构内工作。他们不可能要求银行及煤矿为国际所有，因为并不存在一个能拥有和管理这些行业的国际机构。他们只能在他们本国的结构内做工作，只要这种结构仍然完整。

我的观点是，今天整个欧洲已不是完整的，希特勒已经破坏了这种完整。现在企图恢复原样是愚蠢的行为。如同从前未有过一样，现在有一个机会建立国际秩序；对这种秩序的需要，不管是为了建立可靠的和平还是为了使各国摆脱贫穷，都是非常迫切的。我已经试图陈述建立这种新秩序的理由；现在我设法使那些同意需要新秩序的人了解，它在经济关系领域内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不准备建立一个国际性政府，并把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交其支配，你就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国际主义，或任何真正防止战争的安全保障。

许多大陆上的欧洲人比大多数大不列颠人容易理解这一点。他们国家的独立已经被毁，而大不列颠却仍然保持完整。此外，大不列颠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在欧洲只占一半。它和英国的自治领及把它从欧洲分离出去的美国联系在一起。它的统治者控制着一个巨大的附属帝国。大不列颠不能简单地和它的欧洲邻国结盟或联合而不考虑其它的这些关系：想象大不列颠帝国的所有

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了——成为主要建立在欧洲大陆基础上的联盟社会的成员，也是不容易的，即使我们只考虑一下它对不列颠自治领的影响这样的问题——加拿大怎样适应一个把美国排斥在外的泛欧秩序，南非联邦怎样适应一个拒绝根据人的皮肤颜色而给予不同权利的民主联盟？

国际联盟的所有计划都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不管这些计划只局限于欧洲还是伸展到全世界。在一些“联邦主义者”强调大不列颠和美国之间“现在结盟”的必要性时，其他联邦主义者着力于计划西欧“联邦联盟”，而另一批设计者则梦想着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如果不是从东京——扩展到爱尔兰西部——如果不是到温哥华和旧金山的话。一位有学问的设计者甚至写信给《泰晤士报》，建议所有的国家成为英联邦成员，说这无疑是最显而易见的正确解决办法。

大多数这种计划的困难不仅在于它们相互排斥，而且在于它们企图包括的愈多，应该取得的对于真正联合必不可少的基本统一管理就可能愈少；而它们包括的愈少，就愈能把新的大国或联邦之间未来发生冲突的危险置于一边。此外，完全越出战争的军事结局去考虑欧洲或世界的未来政治结构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们假设纳粹战胜——除非这么假设，否则，对于象你和我这样的人来说，考虑未来就完全没有价值——新欧洲必然按照取得这种胜利所依靠的武力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只要假定苏联持中立立场是可能的，无论如何，在苏联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的西欧，假设一种解决办法是可能的。设想纳粹和苏联，在它们非常不同的社会制度共有的极权主义因素的基础上，会形成任何真正而又持久的同盟，对我来说总似乎是荒谬的。不过，苏联置身于斗争之外，并最后对西欧和中欧未来的政府制度不进行干预，却的确似乎是可能的。这的确总是成问题的，因为十分可能的是，纳粹和西欧的“民主国

家”会从事一场互相灭绝的战争，从而让中立的苏联独自屹立在欧洲文明的废墟上，并因此使其能够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精疲力竭的邻国。但是，也可以假定战胜纳粹主义，从而不导致上述结果而让西欧的民主力量在没有苏联干涉的情况下确定新秩序的各种条件。

从纳粹对苏联发动猛攻的时刻开始，形势就变得完全不同了，因为从那时起，俄国在决定即将到来的解决欧洲问题中的作用所主要依赖的，肯定已经不是欧洲战斗者相互削弱的程度，而是俄国人抵抗和最后击退纳粹侵略者能力的大小。如果苏联的武装力量万一被纳粹的猛攻所击毁，以致不能在欧洲事务总解决中再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西欧新秩序将由西方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建立，并将按照西欧政府的传统形式解决。另一方面，如果苏联武装仍然强大，足以抵抗纳粹的进攻，并接着在纳粹崩溃时刻，横扫东欧和中欧，那么在新秩序的形成中，苏联的影响显然不仅在东欧而且在西欧都将是举足轻重的。

鉴于人的智力现在还不能预言将发生哪些事情，关于欧洲未来情况的预言必将大部分是猜测，而提出来的形形色色计划也必然包含很大的假设成分。特别是德国本身的未来仍然完全模糊不清；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大部分国家的未来也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德国万一发生了以俄国范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革命，那么几乎用不着怀疑，中欧、东欧和东南欧所有较小国家也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一来，或者将出现一个包括俄罗斯以及所有这些地区的扩大的苏联，或者出现第二个模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苏维埃联盟，但这个联盟是在德国的领导下工作，并以德国的工业技术作为其主要推动力。但是，即使如此，我仍怀疑欧洲西边的国家会淹没在其中的哪个政治组织中。荷兰也许会，但我不相信。斯堪的纳维亚也许会，但我更不相信。法兰西，我觉得一定不会；而

大不列颠绝对不会。在那种情况下，苏维埃制度将至少扩展到欧洲的三分之二地区，剩下的三分之一或比三分之一还少的地区不能独立自主，将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支持，而作为不同于“苏维埃”的“议会”国家集团的领导将必然落到美国头上。

另一方面，如果苏联对未来解决办法的影响局限于东欧，而德国的革命宁愿采取“西方”的范例而不采取“苏维埃”的范例来建立新德国秩序，那么形势就会完全不同。因为假如那样，一个在“西方”影响下重建的民主化的德国，将成为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和法兰西在超国家基础上为西欧建立一套新机构的天然伙伴。大不列颠将不是投到美国的怀抱，而是更强有力地被驱使去和一个西欧联邦携手联合，即使在超国家管理下共同经营附属帝国也在所不惜。但甚至处在这些条件下，大不列颠仍将强烈地感到从欧洲拉向说英语的自治领和美国。而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可能不是用于创立一个有效的用协调和管理的真正权力装备起来的欧洲联邦，而是用于防止创立这个联邦，以便由此可能造成一种双重地位，使英国一半在欧洲之内，一半在欧洲之外，防止任何有效的西欧国家联盟的发展。

为了告诫我的理想主义者伙伴们不要受诱惑去相信新欧洲秩序的美妙景象这一审慎的目的，我尽力无动于衷地写出这些选择办法。实际上我说的是，我们只有知道战争怎样结束和随之而来的解决过程中力量均势如何，才能真正知道欧洲可能建立什么样的秩序。在现阶段，我们只能知道，有些事情是行不通的——即使机会的确来了，恢复独立民族国家的旧制度，建立一个和其前身一样没有超国家计划和管理权力的新国际联盟，也是无益的和灾难性的；以某种方式建立一个其规模比一个国家大得多的具有计划和执行权力的大单位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些大单位的共同政府，不把经济和政治协调的主要职能包括在其职权范围之内，这些

大单位将是不容易管理的。

战后为了什么目的而工作才是正确的这一问题，必须看战争期间发生的事情如何，因为为不可能的事工作是无用的，而可能的事将大部分靠军事的进程来决定。然而，只要偏爱成为成功建设的一个可能的基础，那么表示偏爱并根据偏爱行事就是完全合法的。

让我以我能做到的坦率尽力说明我自己的偏爱是什么，和今天我力图使我的偏爱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时，我面临一些什么困难。一方面，如果不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即计划发展的基础，依靠对关键工业和服务设施实行共同所有和管理，并计划把它们作为人民富足和社会正义的工具来使用——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看不到欧洲可靠的和平和繁荣。这使我欢迎加强苏联力量的每件事，因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政权和高度成功的超国家计划的唯一榜样。另一方面，我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强烈地相信一定的权利和自由的价值，这些东西的确存在于大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它一些西欧国家，而目前不存在于苏联。由于残酷和无情，使我厌恶追求甚至明显可取的目标，我痛恨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特别痛恨极权主义那种所有人的想法都应当一样的设想。我不仅尊重容忍差异，而且尊重在广泛的范围内作为一种思想自由的基本表现的差异本身。我重视议会制度，因为它赞成公众言论自由、批评政府的自由、让政府公开回答它一直在做什么的自由；我希望以这些自由的形式为后盾而建立起来的传统在新时期继续存在。因此，我不希望大不列颠或西欧——也就是基本上有这些传统的地区——在那种意味着忽视或抛弃这些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即使这种新秩序拥有我们的生活中至今没有过但可以在民主的极权主义形式中培育的同样有价值的其他自由形式，我也不希望。我希望把俄国群众

由于已从沙皇统治和阶级压迫下被解放出来而正在取得的新的自由增加到我们西方人已经部分享受的较老的自由上去。我不相信这些完全不同种类的自由是矛盾的，相反，我认为这一种是另一种的最适宜的补充，并且两者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结构内都是可以实现的。

困难在于，这些“自由主义的”美德和传统目前深藏在这样的国家制度中：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还是由资本主义政党统治，经济事务也仍在资本家手中；而社会平等的愿望和通过社会主义计划追求富足的愿望却体现在这样一个国家的制度中：这个国家从来也没有吸收“自由主义”美德的机会，尽管它经历了革命，其传统中大部分仍保持着野蛮状态。

这样，我还是希望尽最大可能地增加苏联的力量，以作为推动欧洲社会主义事业的手段；但是与此同时，我继续希望，在西欧各国集结足够强大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力量，以便把其文化价值的模式强加到即将到来的解决中去。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使大不列颠和苏联之间结成同盟的这场战争结束以前，将使俄罗斯“自由主义化”和使大不列颠“社会主义化”到消除我提到的各种矛盾。我对战争的“自由主义化”影响是非常怀疑的；我承认，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迹象表明社会主义在大不列颠以相当高的速度前进，而使大不列颠在即将到来的解决中将放在天秤的社会主义一边。因此我的困难仍然存在，我也没有最终解决它的办法。

然而，象不满意只受命运摆布的每个人一样，我不得不在此时此地寻求一个行动的基础。并且到了一定时刻，在决定这个基础应当是什么时，我不会碰到什么困难。打败希特勒对世界的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对于给予苏联尽可能充分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一点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除此之外，根据我的观点，有一个强大的能影响整个欧洲解决条件的社会主义力量是可取的，这

一点是如此明显，以致我不能不欢迎加强苏联的政治以及军事地位的每件事。然而，这不妨碍我希望使西方社会主义成为尽可能强大的力量，也不妨碍我期望西欧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拟订自己的联合行动计划，并使这些计划建立在力图保证欧洲（最少在西欧）即将到来的解决将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在行动的时刻来到时，如果这意味着俄国共产党人和西方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政策冲突，那就糟糕透了。但是，我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建立他们自己的共同国际阵线中愈是成功，他们就将愈容易和苏联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因为俄国人是重视实力和决心的，并且在他们对西方社会主义者的揭露中，最可怕的是，西方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而工作和抵抗各种法西斯政党对本国自由主义制度的冲击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

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我能心情愉快和问心无愧地工作，不仅是为了苏联的军事胜利，而且也是为了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假如我也在努力重新加强我国和有“自由主义”传统的欧洲其它地区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力量的话。我也相信，我与苏联并为苏联工作愈多，“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拥有新的活力的希望也就愈大。不管普通英国工人可能怎样思考共产党——而一般地说，他们很少思考这个——但他们对苏联的确思考得很多，并且真把它看作是一个“劳动”而不是“资本”当家的国家。张贴在各工厂的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①声明说，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每辆坦克将交给苏联，这使产量有了相当可观的增加，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主要的工人的确感到，苏联体现着一种虽然不完善但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理想，他们将坚决拒绝任何允许敌视共产主义从而发展到对英俄合作冷淡的政策。这一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飞机生产大臣，还任过供应大臣等职务。——译者

点在 1941 年的职工代表大会上表现得非常清楚，而在军火工厂的真正工人集会上似乎更为明显。

这种对“工人国家”的俄国的深切同情，丝毫不意味着要把俄国的办法运用到大不列颠来。目前这些办法根本不适合英国的情况。如果在长期战争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濒临破产的边缘，而工党政治家也已经使他们和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秩序如此紧密地混在一起，以致不能领导国家反对它也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代替它，这样，俄国的办法对英国就可能适合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政治舆论可能一方面转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转向法西斯；而工党可能和正统的自由主义以及正统的保守主义一起被淹没掉。但这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并且这将意味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应付摆在面前的机会的明显失败。

我想，没有一个明智的人会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其实，也在任何先进的西方国家——如果没有法西斯主义也成为强大的，要想象共产主义成为真正强大的，那是非常困难的。同样的影响会使二者产生。如果社会瓦解和经济生活崩溃会把大批工人阶级群众驱向革命的共产主义，那么它们同样地也会把一些人驱向法西斯主义，其中不仅有渴望保护其财产的大批中产阶级和资本家，而且还有一大部分下层阶级——天生的“恶棍”、奴性十足的和愚昧的被收买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将并肩地成长，并在它们之间的斗争中，不管结果如何，许多财富将被彻底毁灭，人和人之间的文明行为方式将受到很大的损害。发生下述情况也许会成为无法避免的，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除了靠上述两种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外，没有任何解决大不列颠命运的办法。但这在一个基本生活资料依赖外国供应和因而依靠持续不断的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的国家，带来的痛苦将是巨大的。

赞成采取少流血的解决办法的一方将占压倒的优势，只要这样的办法能够找到。但是只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构成有效的新秩序拥护者，并且总的说来，不仅获得主要部分手工工人的支持，而且也获得大部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集团以及“进步”舆论的支持，才能找到这种办法。然而，只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成功地使其社会主义具有建设性的国际的而不仅是一国的规模和内容时，他们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今天的普通公民已经终于认识到，除非在一个保证安全的国际秩序内，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安全，除非在一个有效地宣布扰乱社会和平为非法的国际秩序中，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

总之，对英国人民有好处的东西，对于西欧其它各国人民也同样有好处。在目前的条件下，实际上，我们和这些人民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无线电宣传以及通过连纳粹主义也不能压制的权威的特殊的公开声明来进行的。我们的无线电宣传显然应当由这样的意志来掌握，即在欧洲煽动如果不是立即进行民主革命的话，无论如何，也将煽动起准备机会到来时进行民主革命的心理状态。同样的考虑也应当支配我们的公开声明——我们的“战争目的”宣言和我们对于纳粹正在寻求用鲜血来巩固的欧洲新秩序的意图的回答。如果我们要把被奴役的各国人民争取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在我们这一方必须使我们的新秩序具有为其效力和为其牺牲的价值。

但是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各国的政府不是我们的政府，也不支持我们所持的理想。甚至像在英国那样在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参加政府的地方，他们也是站在“全国团结”的旗帜下的；而这意味着，不允许他们说出他们信仰什么，或向欧洲人民提出建立他们所向往的新秩序的希望。我不争论这个，因为这是联合政府本性所固有的。但是，如果联合政府必须禁止参加政府工作的

领导人自由发表意见，那么他们的追随者或者那些把他们抬到当权岗位上的运动就有更多的理由发表意见。如果艾德礼^①或贝文^②不得不保持沉默，那么工党和职工大会就应当有更多的理由大胆地说话，而我和你也同样应当更有理由说话，因为如果我们全都在团结的名义下保持沉默，我们就是背叛我们所声称拥护的事业。我们让欧洲被奴役的各国人民相信，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提倡者，没有为他们办任何事和说任何丘吉尔先生不能为我们说的话。丘吉尔先生得到保守党的认可并有英国工业联合会和蒙塔古·诺曼 (Montagu Norman)^③先生在背后欢呼。说实在的，我们支持丘吉尔根除纳粹主义的意志，我们必须做一切会加强战争努力的事情。但是这不构成我们应当沉默的理由，相反，我们在战争努力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清楚地向正在纳粹的枷锁下受苦的各国人民说安慰和有希望的话。

俄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并说了出来。他们的宣传成绩辉煌，因为他们能够说出来，而我们却缄默不语。哎呀，今天竟没有一个人在有效地对英国人民说话——更不必说对遍及整个欧洲的希特勒的囚犯说话了。是结束这种自我牺牲和立即在国内外发动一场社会主义运动的时候了。是越过统治人民的头头们向各国人民呼吁的时候了，让那些向我们大喊大叫什么我们的首要职责应该是“打赢战争”的人去反对吧！当然，打赢战争是我们的首要责任。但是，除了靠各国人民——包括德国人民在内——站到我们一边来，我们还打算怎样去打赢战争呢？而如果我们不能毫无保留地说出我们的意图和向他们提出真正的建设性的希望，我们又怎能做到

① 英国工党领袖，二次大战期间任英国战时联合政府副首相兼自治领事务大臣，1945—1951年任英首相。——译者

② 英国工党领袖，二次大战期间任英国战时联合政府劳工大臣兼国民兵役大臣，1945—1951年任英外交大臣。——译者

③ 1920年后任英格兰银行总裁多年。——译者

这一点呢。现在，由于苏联在战场作战和它的辉煌的抗击敌人的新闻报导响彻云霄——现在就是我们的机会；如果在允许我们说真话就会危害“全国团结”这样的错误借口下，我们让这一机会错过去，我们便是傻子和瞎子。

六、走向民主

我们常把我们的国家称为民主国家，并把我们的制度的民主和纳粹极权主义政体的反民主性质相比较。但是，英国或者在这一点上也有美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称这两国的政权为“富豪民主政体”，也就是富人利用民主形式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常常说出同样的话，虽然他们在听见象希特勒这样的人说时可能不喜欢，因为希特勒不是要更多的民主，而是根本不要民主。希特勒痛骂民主政体，斥之为堕落的明显象征，并宣布以 Führer^① 原则——领导原则——取代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否认英国是民主国家，但目的要使它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信赖民主，但认为英国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获得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肯定，英国有着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所没有的非常重要的民主因素。

这些民主因素是什么呢？说英国几乎全体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因而是民主的，用这样的老套子来回答是毫无用处的。德国也是这样的，但它使这个珍贵的东西变得多么不同啊！希特勒同其他人一样清楚地知道，怎样用一张深受群众赞同的表皮把他自己的领导遮盖起来。希特勒不通过选举夺取政权以后，再通过选举掌握政权就成了轻而易举的事了。掌握这种并不复杂的权术并费不了希特勒多大的劲。在希特勒还在为推翻魏玛共和国而斗争的时候，小小的巴尔干半岛上许许多多政治家就已经熟知这种权术并

^① 德语元首之意，特指希特勒。——译者

运用自如。一旦权在手，普选权就不能妨碍你保持权力，只要你实行普选时能保持足够的冷酷。而只要你能使那些企图投另一方票的人相当不愉快，群众的决定就几乎毫无疑问地会给你一个接近一致的信任投票。

但是，恐怖主义不是完整的解释，远远不是。投 Führer 票的许多人，是出于对他的喜爱，喜爱他否定人民作主的权利的领导原则。民主主义者所信仰的是，应当由人民作主——这就是希腊语“民主”一词的含义。但是，如果人民不愿作主呢？如果人民无法去操心作主呢？如果人民或人民中的大部份确实宁愿被统治呢？

希特勒不仅宣称人民需要接受统治，而且断言能够使他们甘心情愿地接受统治，并且人民现在真不，将来也真不愿意由他们作主。希特勒说我们的民主是虚伪的冒牌货，这不仅是因为富人用这种民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因为这种民主是建立在关于人类本性的错误论断之上的。如果民主主义者反驳说，虽然人民事实上还没有作主，但人民应当想作主。纳粹的回答是，人民不应当想作主，因为人民只适于被统治。那些认为民主是包含选举权的民主主义者无法反驳，这是因为希特勒能够承认民主的这个含义从而取笑他们；也因为他们没有合法的途径询问公众把政权交给独裁者的决定。

普选权并不是民主，也不是民主的什么保证。它当然是民主的自然手段之一，但它和民主迥然不同。民主指人民拥有权力，而不只是指形式上有权表示，在那些能把自己推到前台的权利要求者中，谁应当拥有权力。对民主的这种错误理解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冷酷无情的权利要求者猛击其竞争者要害后，出现在“民主”的竞选演说台上，要求一种没有反对的回报。实际上，这就是希特勒在德国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所做的，并且我认为，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在苏联所做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不要以为这些话就是谩骂苏联或斯大林的开始，或者是证明纳粹和共产党极权主义在本质上毫无二致的开始。在基本特征上，它们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都认为选举并不构成民主，并认为把普选权作为民主保证的人是在流沙上盖房子。

苏联基本上是民主政体，纳粹德国则不是。虽然，在这两个国家，选举权都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但是，在苏联，整个社会占有主要的生产工具，并且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在德国，生产手段则是由私人掌握的，并且是为私利、为掌管国家的政治主人的利益而经营的。苏联基本上是民主的，纳粹德国则不是，因为苏联正在力图成为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正在对尽可能多的公民进行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教育，而不管被教育者的父母有多少财富和社会地位高低，也不受任何传统的权利或要求的限制；而在纳粹德国，阶级制度依然如故，只有一点有些不同，即一个人可以靠为纳粹事业卖力而升入富人和统治阶级的行列。在俄国而不是在德国，有尽可能给人人同等机会的思想，并由此产生另外一种思想，即权力和权威应尽可能来自下层，而不是由上面强加的。俄国和德国一样，事实上只有一个“领袖”；但是，俄国没有 Führer 原则——没有来自上面的领导原则——而是完全相反，有领导应来自人民的原则，并且这种领导来自人民的现象应该反映到苏维埃社会的每一地方和每一单位的活动中。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来。英国或美国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呢？我们已经注意到，选举权广泛普及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这个答案绝对不能把英美这样一些国家和那些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国家区别开来。试试另一个答案。英国和美国都有议会，人民的代表在议会里开会通过法律。哎，纳粹德国也有这样的议会——“德国国会”，人民的代表也在开会嘛。啊，但是，他们不通过法律，法律是由希特勒制定的。在这一点上，英国

的下议院，即民选的议院，也不能单独通过法律。这些法律还必须经上议院和英王通过，而上议院和英王都不是由人民直接挑选的。即使我们放弃这一点，难道德国国会就不能通过法律给予希特勒制定法律的权力吗？把国会制定法律的全部权力都委托给政府——英国议会则甚至战时也只把一些事情委托给政府——肯定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当然，实际上这是一个性质上而不是程度上的问题。但是，你要能这样说，只有摆脱了这一教条的束缚才行，即民主就是关于选举和立法权的一套特定形式的安排。真正的情况是，民主就是民主地工作——以便给人民权力——而不是赋予人民毫无实际内容的权力形式和影子。

如果我们为了真正的内容而舍弃形式和影子，民主将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人民不要权力并且不准备忍受使用权力的麻烦，人民就不能拥有权力。英国是（我们暂时把美国置于讨论之外）一个人民要拥有权力并准备忍受使用权力的麻烦的国家吗？不是，同时也是！因为这完全取决于怎样解释“人民”，取决于被看作足以承担民主责任的那种“要”和“麻烦”的程度。

“人民”是什么？抽象政治的理论家常说，人民大约只是组成社会的所有单个人的算术总和。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废话，它直接导致民主的毁灭。即使每个公民都单独地填他的选票，而且“投票极为秘密”，那也不能使“人民”仅仅成为大批微小的分散的个体，这既是因为选举不是民众力量的基础，而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份，也是因为男男女女都是在他们和其他人的联系——他们生活的小圈子和日常生活交往——的影响下考虑个人的选票的。他们不是象鲁滨逊那样居住在孤岛上。即使圣·西米恩·斯泰里特司(St. Simeon Stylites)^①从他的修行高柱顶部把选票投入投票箱，

^① 苦行主义者，最著名的柱上圣人，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在六十英尺高的柱上度过。——译者

也不会有一个检票员会向他喊出一个政治论据，说他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来投票，除非他的台柱从世界的视线消失，除非在他升入悲苦的高处之前忘掉了他个人的经历。我们在彼此交往中生活，而不是离群独自生活。我们的政治活动受许多联系交往的影响，这些联系交往，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富于热情的还是冷淡的，认识到的还是意料之外的，都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是“社会”动物。“人民”的含义是只能用社会的交往联系来解释的。

早在政治可能性这个地平线上出现普选权之前，就可听到坚决主张人民应当当家做主的呼声。在查理一世时代的保皇党和园颅党之间的内战动乱中，弥尔顿(Milton)^① 这样说过；在最后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并由新教徒议会掌权的英国革命时刻，约翰·洛克(John Locke)^② 也这样说过，或说过一点。甚至伯克(Burke)^③，这个把农民大众这“死鸟”撇之脑后、痛斥法国革命并对贵族的“羽毛”表示怜悯的人也认为，人民应当到最后才做主。这些“人民”——以他们的名义要求最高权力——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些思想中，过去有而且现在一定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弥尔顿所说的“人民”实际上都是好人，因为他不承认坏人也有管理国家的权利。洛克的意思是，英国的“全体国民”通过建立在民族传统基础上的组织和团体——郡的绅士会议、有自己的城市议员和自由民的自治城市、农村生活的传统组织——表达意见。伯克的意思没有很大的不同，但着重点不同，他强调把“人民”结合在一起和最能表达人民集体意志的拥有土地而闲散的贵族们的职能。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人民”几乎完全不是特指“下层社会”。在那以前，人民指每个人，或者，无论如何，指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于

① 十七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著有《失乐园》等。——译者

②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译者

③ 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反对法国大革命，著有《法国大革命回想》等。——译者

“人民”的每个人——所有的“普通人”，只要不是国王和贵族。但是 1789 年以后，“人民”日益专指没有特权的大多数人，或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指穷人以及没有特权的人；同时，另外一些人则继续把“人民”理解成既包括富人也包括穷人，只要这些富人没有高贵的头衔，也没有因其财富超过同伙而被提升。

“人民”这个词的精确含义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变化的。在十九世纪自由党人的嘴里，他们倾向于把“人民”和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权的思想等同起来，从而意义甚微。另一方面，天主教徒的社会作家继续用“人民”表示社会团结的概念，这种概念超越阶级区别，包括为履行各种各样的社会职能而被分成各种等级和阶层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这个词，因为他们否定社会团结这个概念，强调社会制度中阶级的根本重要性。他们说“无产阶级”而不说“人民”。在代议制国家里，这个词蜕化了，愈来愈变得只简单地指选民，它使选民具有笼统的虚无的人格——其所以是虚无的，是因为事实上，“人民”不是作为“人民”，而是按照他们实际上的组合和社团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存在的。

“人民”，仅仅作为一批选民，显而易见是不能当家做主的。选民确实能用大多数选票决定两个人中哪一个应该被选入议会任职或为其它民选机关服务。但是，在他们不能不在两个以上的人当中进行选择时，或在有许许多多选民进行选择时，问题就变得复杂得多了。在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选举史密斯先生还是选举琼斯先生，而在于把这个党或那个党选成多数党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如果只有两个党，选民还能选这个或那个为多数党。但无论在哪里，若有两个以上的党，选民就不一定能简单地靠选某些人、而不选其他人来决定政府的组成和政策。法国“人民”一而再地投“左派”的票，却发现“右派”联合起来照样继续执政。比例代表制的弱点就在于，它给选民日益增大的权力去选择他们喜爱的

个人，而牺牲了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政府的权力。

在决定政治事务当中，能够真正具有重要性的“人民”，不只是选民，甚至在实行普选权的情况下亦是如此。除选举议会议员外，“人民”还有无数的其它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每一个要求这个事情或反对那个事情的坚强而又积极的团体，都表现了大众的情绪，并且在决定国家应当如何管理上，其重要性完全不逊于任何投票选举。大部份工会会员、合作社社员、教士、新教徒、农民、店主、教师和自由职业者共同采取的意见和很多其它共同观念及情绪就构成了“人民”的“意志”。雇主、金融家、地主和社会上的所有既得利益集团的意见同样是“人民”的“意志”。“人民”在任何差异很大的社会，思考的不是一种思想，而是很多互相冲突的思想。就政府的任何活动来说，要使人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多数党，它对任何政府的全部活动始终都满意。因为同样的一批人并不是对所有的问题都持同样的态度。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代议制政府，是一种假定其活动获得最大多数人同意的特定机关。它只能这样，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政府使自己不断地受各种意见的影响，不是单个选民的意志，而是那些强有力的团体的意志——在具体事情上，如果不考虑这些团体的愿望，便容易出现麻烦。当然，任何政府都不得不让其中的一些团体不满意。但是，最充分表达“人民意志”的政府，就是和这些团体考虑的东西休戚相关的政府，就是使这些团体的不满尽可能减少的政府。而这些团体大体上也是这个政府而不去选择其它可供利用的政府。

这些团体发生的影响大小不是和其人数的多少成比例，而是和其感情的强度、意见表达清楚程度以及在被反对时制造麻烦的力量成比例。这些因素取决于许多情况。在“富豪民主政体”中，少数银行家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失去信任”并想教训它一下，他们便能使千百万人失去工作。少数几家

报馆的所有者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能使许多人强烈地有一种想法，假如他们还没有强烈地有一种相反的想法的话。以一人对一人来说，富人通常要比穷人重要得多，因为他们有大得多的使自己对周围事物感到不满意的力量，并且更加习惯于自行其是。有组织的少数民族，甚至人数非常少的少数民族，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他们感情强烈得足以心甘情愿地为一件事而死，或者为它而坐牢，或者为它抛弃财产或原有的生活方式。团体的力量大都决定于他们的“损害价值”，虽然也有一种力量来自进行有益的服务的意志。

现在，这些互相冲突的团体决不都是民主的或民主的拥护者。但是，在它们都有助于促进“人民”的思考和期望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人民”。“人民”并不一定是民主的概念，人民的声音是一种在政府方面影响社会政策形成的声音。这种声音可能是聪明的，也可能是愚蠢的；可能是理想主义的，也可能只是为自我的；可能是赞成民主的，也可能是反对民主的。实际上，它是所有这些的混合物。它的占支配地位的音调决定于真正权力的分配。在一个富有贵族政治传统的国家里，地主贵族的声是最响亮的，并且常常几乎淹没了农民群众的声音。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里，金融家、商人和雇主发出最强烈的喧闹声或最有影响的窃窃私语。教会说话的影响，不是和其掌握的统治阶级的多少成比例，就是和其掌握的市民主体成比例，或者同两者成比例。在“人民”有民主思想而且已被组织起来表达其民主愿望的地方，“人民的声音”才主要是民主的呼声。但是，“人民”本身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不民主的。一个有大批民众追随的政党不一定是一个民主的政党，“人民的声音”不一定是民主的声音，甚至一种多数声音也不一定是民主的声音。

详细阐述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目前这个时候，有代议制传统的国家的大多数人本能地倾向于把民主作为“人民”的主权

来理解，并把民主政体和依靠多数选票上台的政府等同起来。其实，民主依靠的不是任何形式的选举制度，而是遍及整个社会的精神。最民主的社会是其中的大部份公民希望广泛分配真正的政治权力，并能保证这种权力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得到广泛的分配。只有在充满民主的愿望同时社会结构也允许这种愿望成为现实的地方，民主才可能存在。

因此，民主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成为绝对民主的，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全没有民主成份。有些社会甚至处于基本上不民主的政体下也能拥有很大的民主，因为这种政体有一些由于民主感情的激发而准备尽力反抗压迫的组织得强有力的团体。反之，一个社会可能在纸面上有高度民主的政体，却几乎没有民主，因为公民缺乏使民主生效所需要的那种愿望和组织。

存在这种要求民主的愿望并不是偶然的和无缘无故的。从历史上看，它常常是建立在财产广泛分散的基础上，或是建立在统治者和国民主体之间在民族或宗教方面明显分裂的基础上，或是在结构单一的社会里，建立在由于财富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没有明显不同而产生的天然平等的基础上。但是，在一个财富和权力有很多等级的社会里，上下两端的阶级差距甚大，而区分明显的各个阶级在任何方面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愿望是不容易存在的。无论如何，在没有外来统治者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没有深刻的宗教信仰分歧的社会里，这种愿望是不容易存在的。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都是这样发展的，所以民主的愿望往往趋于削弱，甚至在共和政治制度具有一种适合于行使民主权力的形式时亦是如此，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形式上的政治机构不能反映真正的社会结构，民主的愿望往往由于中间阶层疏远低下的阶级而被麻痹，而这些阶级的上层处于升入更高阶级的最好

位置上,他们倾向于和比他们“优越”的人在一起,而不和不如他们的阶层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紧紧抱住他们的微小特权和个人上升的希望,而不那么怨恨少数比他们生活更好的人的统治。

尤为重要的是掌握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社会较富裕阶级已经和投票箱的形式民主协调一致了。富人愈是清楚地认识到民主现实不是依靠选举权而是依靠公民的精神,他们就愈愿意给公民投票权而不是给权力并把公民的民主感情转移到单纯的竞选活动上。在大不列颠,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一样经常扩大选举权,他们这样做并没受到更大的损害。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只要阶级关系十分复杂,就不会仅仅因为给了更多的穷人选举权而使他们对所有较穷的阶级联合起来反对较富阶级的局面。

象大不列颠这样一些国家里确实存在的民主成份,在王国的宪法条文上所能找到的比在公民的习惯上所能找到的要少得多。民主只能达到这种程度,即公民为了共同目的拥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他们使用这种自由是要使之作为表达他们愿望的工具并承认别人的同等自由。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不是轻而易举地获得的,它们是经过多少世纪斗争才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说,这些自由权利还是不完全的,但是,它们的的确确存在并已达到很有影响的程度,同时还带来了其它自由。工厂的工人比在其它地方当工人要自由得多,因为他们获得了联合的自由。言论自由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个人行为自由,打破了统一行动的惯例和传统上的限制,扩大了个人表达意见的范围,并且由于那些志同道合的人自由联合而使自我表达意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基本上是在争取言论、结社自由的斗争的掩护下进行的。

说的是基本上,但决不是整个地,因为经济的依赖性本身包含着大量的不自由,甚至在有言论、结社自由的地方亦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拥有足以使之具有安全感的财产,具有一种任何言论、结

社自由也不能表达的自由感情。在大不列颠，真正自由的多少深受大多数人缺乏安全的限制——即他们觉得在保持习惯的生活水平方面依赖别人比依赖自己更强有力。

然而，对自由的这种限制和对民主的限制是两码事。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限制可以通过煽动消灭它的愿望而大大激发民主精神。它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做了，否则，工党在国内就不会成其为一种力量。但是，这个进程效果甚小，因为“安全”动机遭到很多其他人的反对。很多人宁愿要不安全的优越地位，而不要建立在平分基础上的安全；很多人担心，为他们的阶级寻求更大的安全，可能会损害他们自己欣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安全。广泛扩大小特权是对抗民主精神的人所共知的方法之一。社会等级最复杂的社会也有最多的小特权可授给。

在这样的社会里，民主精神是很容易变得黯然失色的。然而，民主精神必然会碰到另一个危险的敌人——巨大性。组成社会的男男女女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使每件事情不得不在这种日益增大的规模下组织，从而具有破坏民主的倾向。“巨大性”迫使人们有太多的邻居。在道地的小规模社会里，民主能轻易地扎根，因为每个人对旁人的容貌和内心都熟悉，或者至少只要愿意就能够熟悉，并可在小范围内争取这样的社会所能赋予的崇高荣誉。在现代世界的大国里，城市人口增长得已经和过去国家的人口一样多，在这些大城市内部以及整个地区从一个城市往另一个城市，人口都在流动，联合达不到其目的就是极为平常的事了，除非联合是全国性的。为了这种目的或那种目的而进行的全国性联合，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分裂成保持睦邻精神的分支组织。但是，这种你来我往包含许多从一个分支到另一个分支的转移，并妨碍地方密切生活的发展。此外，更加重要的是，全国性的大联合必然会发展自身的类似国家官僚政治的官僚主义。全国的领导者和高级职员也无法

为他们应当代表的大多数人所熟悉，他们成了一种不同阶层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同阶级的生疏而又高傲的人。结果，自发组合本能的自发行为被扼杀了，组合变成了机械的工具而不是精神的力量。这样，联合本身不再维持和促进民主精神，日益和领导它的官僚政治一致而不是和主要成员一致。在某些组织里，例如，在大的联合股份公司，在人的友好协会和在房屋互助协会中，成员关系逐渐徒具形式，根本没有在共同事业中的合伙关系的观念。还有另外的情况，例如，在合作社和甚至工会之类的组织里，虽然成员关系中仍然存在对联合组织的事业积极活跃的成份，并具有共同一致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仅仅感动其主要成员。他们付出应付的款项，接受应得的款项，同联合组织或其伙伴的感情联系并不多于他们在国内或在殖民地买一磅茶叶或给安全保险公司每周应付的便士。

这的确使幸存的以邻居关系、私人相识和在共同关切的事务中的私人合作为基础的真正人类组合成为十分宝贵的。这种组合可能使教会更易于加强对信教男女的控制，因为教会在很大程度上的确维护邻居关系这个基础。这个事实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并没有比实际上衰落的速度更快地衰落下去。特别在最贫穷的区域，各种教堂确实给男男女女提供了他们非常需要的邻居组合。在别的地区，由于城市居民对任何一个规模小到适于邻居表达意见的中心兴趣减退，教堂的衰落加快了。在家庭和工作地点相距甚远，在这两地又距城市中心甚远，而主要的娱乐活动和大商店又都集中在城市中心，这样甚至隔壁的邻居也互不了解。家成了寝室，家庭的社会生活崩溃了，外部世界是通过报纸和无线电知道而不是通过邻居的个人访问知道的。小酒店不再是地方上闲谈和发表意见的中心，也没有什么替代它的地方。教堂的社会成员逐渐只剩下还在

减少的教徒的一小部分。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怎能期望人民会有民主的感觉呢？他们间或还能激起一种看上去象民主感情的群众感情。但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互相了解和进行有条理的合作的那种人们的本能的一贯的民主精神在萎缩，这种民主精神现在变得只有少数敏锐地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并主动寻求它的人拥有，这与其说是这种民主精神本身的缘故，还不如说是因为这些人特别敏锐地认识到社会理想的需要。这少数人制造运动，同时他们也就是他们所制造的运动。大多数人不注意这些运动，只有在某些大事把生活常规搅乱到他们要在一个不友好的世界中寻找伙伴关系时，才偶然有所例外。美国的大萧条使那里的千百万人搜寻会给予他们生活意义的联合；战争也震撼人们的灵魂，使他们寻求伙伴关系和互相救援。

在我们这个正在迅跑的生活不断变化的巨大世界里，除了在纯粹个人方面，是很难找到同伴关系的。在防空洞里，或在遭到猛烈空袭的城市中人们从被摧毁了的家里逃出来而躲入的可怜的避难所里，一些人才能找到同伴关系。更多的人仍然是孤单的，甚至处于困难之中。每夜都睡在伦敦地下铁道的隧洞里的人最突出的事，莫过于他们几乎互不相识，并且差不多从不交谈，更谈不上促进他们的一致精神了。个人在人群中的孤单感更强烈：“我们越是在一起，我们就越孤独。”

可是……苏联人是多么众多啊！他们表示友好的声音又是多么响亮啊！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人的精神一直非常高昂，而这种精神在这里从来没有高昂过。从传统上来看，俄罗斯人是意志消沉的人，俄国知识分子，如同伟大的小说家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一样，确是不快乐的；俄国农民只有在酗酒和因酒醉而昏迷之间的片刻才兴高采烈。但是，苏联工人是心情愉快的——或者说，一直到这次战争的灾难降落在他们身上以前，他们是心情愉快的，甚至，

我觉得他们现在也是心情愉快的。在这里，不管对共产党专政的“不民主性质”能够说些什么，苏联各族人民在这种制度下表现出来的情感是非常欢乐的，也是非常喜爱伙伴的。在他们建立的巨大新国家中，他们的举止行动好象彼此友爱，感到自由，象在家里一样。

那么，这种巨大性就不象我提出的那样对民主是致命的——根本不是致命的，是这样吗？我们的毛病不出在巨大性上，而在于没有使我们的结构和生活方式适应这种巨大性，是这样吗？我相信，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那些没有严格地使其结构适应技术情况的变化而仍被设想为民主的国家，在其痛苦的时刻，必定会发现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已经衰退了。德国人发现了这一点——但是，这可以说民主在德国的土壤上没有扎下深根。我不是说它没有扎根，我现在不想停止争论这一点。然而，法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法国人在大部份世界是民主的伟大鼓舞者。但是，他们的民主在痛苦的时刻在他们身上衰退了。如果我们经受同样痛苦的考验，我们现在这样的民主也会在我们身上衰退吗？

在法国沦陷以后，我们经受住了一定的考验，民主没有衰退，反而加强了。在1940年的几个月里，英国是一个比这以前或从那时以来更为民主的国家。英国人民在考验中显示了一定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使新政府能够依靠这种精神临时采取紧急的防卫措施。工厂生产猛增，那时差不多社会各界都特别齐心协力。但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一种临时出现的现象，从其本质来说，它无法持续下去，因为负担过重，必然不能长久。在眼前危险逐渐减少时，就会回到老路上去。丘吉尔先生领导战争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但全国志同道合的感情渐渐减弱了，人民又开始用老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回到老的对抗状态中。

这没有任何值得奇怪之处，因为实际上英国所采取的防卫措

施并没有克服任何老的矛盾，也没有使英国社会组织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阶级结构丝毫没有受这些措施的影响。没有把工业——雇主和工人一样——纳入为全体国民直接服务的机构中，没有在该时或战后改变社会关系的前景。议会，这个想象的民主代表的象征，依然如故——一批可笑的微不足道的小人于 1935 年又成了内维尔·张伯伦的亲信。这些人没有威望，也缺乏才能，无法把全国团结起来作他们的后盾。反对党也是一团糟。艾德礼就其本人来说是一个好人，拥有进行社会活动的本能，但完全缺乏领导的基本特点。至于其余的人，操纵工党的主要是一些精疲力竭的年老的“党的忠诚者”，因为在 1935 年的选举中，这些人夺取了牢靠的位置，党的大多数年轻的积极分子则由于缺乏有效率的全国性领导而在自己的选区里遭到失败。

如果战争环境没有导致许多在正常情况下表达群众意见的代理机构陷于瘫痪的话，议会的这种劣点本来不是那么紧要的。首先，干涉地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完全不必要的和愚蠢的。在许多情况下，地方议会已把一些完全不需要的权力移交给了其常设机构或紧急委员会。地方议会和各委员会的正常会议也停止举行了。这意味着许多地方政府在社会研究方面的活动消失了。此外，很多最积极的地方议会议员和很多精力最充沛的批评家都致力于和国防部有联系的紧急工作、疏散以及其它战时服务工作。并且随着地方议会所有选举工作暂时停止，动员群众舆论的党的机关也大部分解散了。灯火管制和空袭妨碍了公众的会议。很多比较积极的地方政治家应征入伍了，或在制造必需品的工厂里长时间加班加点工作。地方舆论的正常领导因而大部分瘫痪了。没有领导就没有有效的办法去牢牢维持其追随者的政治觉悟，或者，无论如何，没有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办法。当然，共产党人仍以其固有的精力继续前进；但是，他们的反战政策使他们显得荒谬可

笑,直到纳粹进攻苏联,他们才再一次改变“党的路线”,而到那时,自相矛盾已经使他们名誉扫地,要恢复影响困难重重,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

不仅在地方政府方面,这种自觉的努力陷于停顿。看来国家的一切精力都不得不用来打胜这场战争,再也抽不出任何人来搞正常意义上的“政治”了。甚至有一种感觉,认为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就是不爱国;并且由于害怕妨碍“全国团结”,在国内政策上,也要避免对政府进行任何批评。由于所有政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政府,对政府的政策共同负责,所以不管在议会里,还是在全国,都不存在有组织的反对党;试图对政府进行批评,既为参加政府的领导人所不满,也为那些控制某些政治机构的人所怨恨。

然而,批评不一定是宗派的,同时,也决不会是从任何阻碍战争努力的企图出发的,而很可能是出于使战争努力组织得更为有效的愿望。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之间的长期争论,就是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也不能真把它作为毫不相干的东西置之一边。非常有争议的一点是,不管和平时期这两种制度各有什么优点,社会主义乃是进行战争工作的正确原则。有强有力的理由这样做:在战争情况下,整个工业和服务机构都必须置于计划和协调的管理之下;而这只有把它们作为社会企业完全接管下来才能办到。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把所有的战时收入都限制在真正需要的范围内,同时不仅定量配给一定种类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而且也定量分配任何消费者可以花用的总收入。如果这样做了,在战争方面所作的努力就会大大加强。但是,由于所有的党在政府里都有代表,由于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害怕提出任何可能遭到政府抵制的意见而没有这样做,因为政府本身赞成“全国团结”。“全国团结”实际上意味着,不制造保守党人和他们的资本家朋友反对的任何重大变化。政府的工党成员接受了这个观点,他

们的处于政府之外的舆论领导者也接受了这个观点。

其结果就是，民主被放到冷藏库中去了，或者，至少民主的一种最具活力的形式被放到冷藏库中去了，因为在决定社会政策时，问题不在于“人民”要什么，而在于那些彼此竞争的政党能接受什么。实际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完整无损地保持原样，因为只要保守党人不同意停止采取资本主义的方法，现状就会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

不管是从打胜这场战争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着眼于未来的观点来看，这种情况都是危险的。保持资本主义的刺激、方法和管理形式对战争努力的妨碍究竟有多大，我现在不想进一步争论，因为对于这一问题，我在本书的前一部分已经说了我必须说的话。现在我必须极力陈述的是，要是把由社会争论来决定政策的民主实践中止，那是极度危险的。在平常的时候，各种政策的拥护者力图将其建议提交社会讨论，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由各政党采纳。现在，社会讨论大部分中止了，互相竞争的宣传工作者已经忙于其它工作了。政治家们也不再在社会舆论面前争辩了。除了零零落落出现“反常的”候选人的地方之外，没有补缺选举。当前在战争结束之前，看不到大选的前景。在空袭对策、食物配给、恶劣的运输条件、煤的短缺和直接影响到消费者一般情况的其它大量问题上，是存在批评意见的，而且不是一点点。但是，这些批评是不一致的和非直接的，并且大部分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这些批评宁愿集中于表面的结果上，而不愿集中于原因上。也有政治批评和大量含糊不清的政治不满以及到处从那些看来手边藏着一些日用品的人那里寻求鼓舞。但是，这些政治批评大都夭折了，因为那些已经建立的党抵制这些批评，而各种联盟、地方议会和委员会本来抱着希望建立起来，以使批评有效，但找不到任何事让其成员做，并且除了让他们清谈，除了以中等阶级为主的十分狭小的圈子以外，也

没有办法让别人听取意见。

如果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战败，那就不仅是一场大灾难，而且会使我们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它可能把大不列颠的民主成份发展成新秩序的主要特点的机会永远扼杀掉，这种新秩序以英国传统为基础并保持这种传统的真正价值。战败不一定彻底扼杀民主，但是，战败意味着，为了使民主获得成功，必须有一个新的开始，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艰苦的战斗。这可能意味着，新的民主将不是往昔胜利的继续，而是基本不同的某种东西，也许坏些，也许好些，但是不管好些坏些，只有作出新的震撼世界的努力并以几代人的进一步受苦为代价才能赢得。打赢这场战争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以便在我们已经奠定的基础上着手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而不要让这些基础被毁掉而代之以新的反民主基础，以致我们必须再挖掉原有的基础，以奠定我们新的民主基础。

战争本身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完善地和忠实地在我们正在为之战斗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决心。如果我们打胜了这场战争，结果却不能建立任何与此相适应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白白进行了多少战斗和作出了多少牺牲！因为如果我们打败了纳粹，然后仍旧依靠破旧的资本主义房屋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生活下去，我们自己 and 纳粹就都有罪，这不仅仅是由于当前的贫穷，而且也是由于生活在已经失去希望的时代里的灾难；在这样的时代里，腐朽的结构逐步毁坏，所有东西的质量都会逐年降低，而其暂时代用品则会逐年增多。

召唤我们去建造的这个建筑物，不只是砖和灰浆，或坚固的物质建筑，或按照富裕时代的需要重新计划工业和财政的问题，也是，而且最重要的是，人类精神品质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求这个新的时代不同于以前的那些时代，不仅在它的生产丰富产品的较大的能力上不同于以前的那些时代，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它的公民

的品质上也不同于以前的那些时代,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到一个方法,使民主精神在面对组织的巨大性时有力量站起来维护自己。这种民主精神把尊重每个人作为目的并在每个人身上引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在建设社会的服务机构中,争取尽可能多的公民给予支持——这是他们最好的方法来表示什么是好的——我们必须在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运用这个原则。我们在上一章提到,在经济事务中多么需要实行这种原则,以便让每个工人都能获得充分的机会象在共同生产事务中的伙伴那样感受和行动。这大概是超越一切的最重要的方面;因为一个人除了睡眠时间,其他时间的很大一部分花在工作上——即使劳动时间缩短到我们所能缩短的地步仍将如此——以致他的工作生活的感受必然极大地影响他作为一个政治公民的能力以及空闲时间的利用。自由政治制度和奴隶般的工业制度不可能共存下去。不是自由政治的代理人要坚持解放工业,就是奴隶般的工业要损坏微小的政治自由,二者都会使人们象奴隶一样地思想和行动并使他们完全避开社会思想方面的成就,而使他们的空闲时间只作没有创造性的接受之用。

但是,工业民主化尽管在争取真正的民主的斗争中居于关键性的位置,但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民生活和活动的其它各个方面实行民主化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在工业中,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民主化进程的有效性依赖于人们在工业秩序的基础上在小组内——小到足以使人人都互相了解或者能互相了解——对那些实际上影响他们的幸福和美好生活的事情采取共同行动。同样的情况在别处亦适用。如果我们要在普通男男女女中大大增强集体活动和理解社会事务的能力,我们就必须在邻居和工人的小民主基础上着手建设新社会。正如大工厂不一定成为这件事的障碍一样——因为它必须由较小的车间和部门组成,而每一车间或部门都存在自己的问题——大城市也不一定成为障碍。我们仅仅靠选举

负责城市事务的地方议会绝不能使大城市成为民主的。这样的机关在接近普通公民方面并不比议会强多少。地方政府的基础应当是住在一个街区、或一条小街或几条小街里的小而互为邻居的居民小组，因为每个这样的单位都应当有一个集会的公共地方——一个为小组的共同目的服务的小规模市民中心。这个中心应当既是俱乐部又是集会大厅，它应当设有市民饭店，它应当有人能够帮助解决成员中的生活烦恼，它应当既是儿童中心也是成年人中心，它应附设有在父母离开时照料儿童的设备以及为儿童和成年人游戏活动的地方。

应当鼓励这个小社会联合的全体居民把这个中心看成他们集体生活的真正活动中心。对于他们来说，它应当不仅是政府的一个单位——一个将在其上建立较大单位的基础单位——同时也是表现市民精神的一种手段。它应该是教会一度对农村所要求的东西，但是，即使不说宗教感情的衰退，它也决不应当是教会现代化的市镇所要求的东西。

我深信，如果我们不在这样一些基础上建立民主，我们就不能成功地把民主完全纳入我们的新社会结构中。做不到这一点，可能不会扼杀民主精神——因为象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在具有高度不民主的结构条件下，民主精神也能非常活跃——但是，这会妨碍民主在政治秩序中找到其表现方式，或者妨碍民主在国家和工作起建设性的作用。民主精神若不能起这种作用就会白白浪费精力，而国家丧失了民主推动力就将成为追求私利者、空头政治家、官僚和自命不凡的小官吏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和各种掠夺成性的阴谋家为所欲为的狩猎场。普通人民，除了养成习惯对直接经验范围内的事民主地共同行动外，是不能管理大事的。如果他们确实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们就能学会处理重大事件。他们能学会分辨老实人和骗子、聪明人和傻子、勇敢者和胆怯的空话连篇的吹

牛者。这种对人的选择是良好的政府管理艺术的核心——不是由于全部权力都应归于选出的最好的人，决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因为良好的政府管理存在于忠诚精明而又勇敢的地方行政官员和积极明智而又友好的主要公民之间的合作。

因此，这就是我们必须建立的民主。我们必须现在就着手建立它，而不要等到战争结束才开始这项工作。我们决不能等待，首先，因为等待可能使我们打输这场战争并因而完全丧失建立任何东西的机会；其次，因为公民的这些积极的权利和义务会由于不使用而蜕化，而认为那些战时丢掉民主的人会成为战后重建任务中民主精神的有效代表是荒谬可笑的。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抓住能促进民主事业的每一个机会。

只要愿意，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能拒不把政治投入冷藏库，并且不管有什么障碍，我们都能坚持维护政治组织——坚持举行会议、传播文学作品和详细讨论我们的邻居以及工作伙伴对当前重大问题的意见。第二，怀着对战争努力的绝对忠诚，我们能够想方设法把公众舆论集中于那些做错了的或应当改正的事情上，以便使胜利更快地到来。我们可以拒不缄默，我们可以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使丘吉尔先生是国家最好的领袖，也难免有一些人精心策划地阻止他去完全了解各种麻烦的事实。第三，由于当前的灯火管制以及旅行的种种困难使人们更加密集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努力组织小规模的活动，使人们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得到所需要的保证和鼓励。我们彼此能成为好邻居并且能靠成功地结交朋友来促进民主。我们能粉碎墙隔离，这种隔离是郊区和住宅区现代生活的祸根。我们能靠实践和谈论来进行宣传，而如果我们实践和谈论，我们的话就将更有人听。我们决不答应缄口不语——决不。我们一定要说出我们掌握的真理，因为我们的文明的全部未来就在于使这种真理马上占优势。我们在小事情上也必须是民主主义者，否则，在大事情上我们的民主便会成为空话。

七、现在就行动起来

自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原文如此。——译者)最后一批宪章运动的随声附和者离开人世以来,我们英国人基本上一直是安份守己的人民。我们有过政治争吵,还不时伴随着不小的混乱和暴怒。但是,除了爱尔兰动乱这个例外,联合王国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可能导致战斗的政治事件。不时有人谈论暴力行动——在布雷德洛(Bradlaugh)^①的时代出自愤怒的共和政体激进分子之口,在联合王国的鼎盛时期出自社会民主联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而在1914年的前几年则出自工团主义者和好斗的要求扩大参政权者之口。在1926年总罢工中,使外国观察者吃惊的是,甚至很少谈到暴力事件,无论如何,在工人阶级一方是如此。总罢工失败了。除非政府由于惊慌失措而退却,或者除非罢工者不仅作了罢工的准备,而且作了革命的准备,罢工的失败是必然的。他们不是频繁宣告整个工业和立宪特点的领导人,在罢工者中他们也只是一小撮。

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大不列颠的制度一直在和平的立宪道路上发展,曾出现过以贵族来克服上议院顽固的威胁或者工业上的争论偶尔引起的争吵,除此以外,没有更大的暴力行为。英国社会主义在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销声匿迹后的八十年代重新形成以后,在这种立宪制度的发展气氛中成长起来。社会民主联盟不能吸引工人阶级的领导人,而独立工党和后来的工党吸引了他们,这大部分是由于社会民主联盟——不管它是否打算进行革命活

^① 十九世纪英国激进政治家,鼓吹现世主义,主张社会改革。——译者

动——的确使用了革命词句并把其教义建立在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思想是革命的。工会——工党以其为基础，工党的先驱者独立工党以其为主要助手——是在极度敌视革命情绪增长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大不列颠作为“世界工厂”得到日益增多的收益时，雇主因而发了财，工人的生活也因而有所改善，并且尽管他们在瓜分经济进步这块面包而取得各自的份额时可能发生争吵并已发生争吵，但他们不做任何有可能妨碍从每个新面包房得到较大的面包的事情，因为大家在这种事情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剥削全世界的事业中，资本和劳动是合伙者——即使他们是争吵不已的合伙者。并且，尽管他们的行动所根据的原则被认为是可以使“经济人”活跃起来的，双方也已经没有兴趣把他们之间的争论推向极端。雇主受到压力时宁愿做些让步，而不愿坚持到底反对他们容易做到的改进。对于工人来说，则最好是接受这些让步，而不是拚命地争取对方作出更多的让步。

在经济世界，宗教情况是和这种迁就脾气相辅相成的。英国国教的确很少掌握工人，但是就在不久之前，非国教主义派的控制还是非常牢固的，并且至今仍很牢固。雇主和工人不仅常常进同一个教堂——在其它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也进同一个不信国教者的教堂。因此，他们信仰的宗教一直没有同国家、贵族政治和整个已确立的特权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是处在这些东西的对立面。和非国教的其它形式形成对照，美以美会作了很大努力留在国教中，并在政治事务中传播“教会和国家”的教义。但是，已确立的秩序没有任何复兴的热情，而是被推向前的。非国教主义派逐渐地、几乎是坚定地变成自由党的宗教同盟者，如同国教是托利党的宗教同盟者一样，只不过没那么坚定而已。当自由主义不再是一个持久的反对党并在格拉德斯通 (Gladstone)^① 的领导下爬上了和改

^① 十九世纪英国自由党人，曾四次出任首相。——译者

良的保守主义轮流执政的政治权力宝座时，非国教主义派的种种无能就逐渐消失了，如同国教一样，它接受了社会制度基本条件，并能获得其主要教徒的赞同，因为这些教徒的经济利益以及他们的宗教倾向很容易把他们导入维多利亚时代那种自我满足的安全港中。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在这个安全的维多利亚的英格兰，人人都去教堂；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受宗教动机和经济动机这种同一混合物的支配。在我们回顾英国商业繁荣的“黄金时代”时，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如同当时给予狄更斯 (Dickens)^① 和罗斯金 (Ruskin)^② 的印象一样——是隐藏在维多利亚时代舒适而堂皇的表面下越来越糟的可怕的贫穷状况。这些“底层穷人”大部分不去教堂，或者，譬如爱尔兰人，甚至不到牧师那儿去，即使当时有去的，也是偶尔出于拯救灵魂的考虑。他们一直无人过问，直到基督教救世军去搜寻他们的灵魂，天主教徒为了唤醒那些在八十年代出现的社会道德心，也去访问贫民区——我想，这主要是周期性商业萧条揭开城市苦恼盖子的结果。但是，尽管宗教在那时以前并未为那些被打垮的人操什么心，它却有效地吸引了工人阶级大部分天然领导人，并且——要点就在这里——和大陆欧洲的宗教比较起来，它是一种民主的宗教。非国教主义派的声音和感情都是单调的，但这种单调却有反对贵族主张的强烈成分。它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仅理论上而且实际上在宗教仪式方面都是平等的；并且它是一个有力地发泄民主感情的地方和一种阻止用暴力来发泄对富人不满意的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提出来世的补偿，

①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其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为其特色，著有《双城记》等。——译者

② 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政论家、散文家，以写艺术和社会问题为主，抨击旧秩序，主张改革，著有《永远的喜悦》等。——译者

这种补偿使那些在今世条件还没有坏到绝望境地、而整个来说是在不断得到改善的人受到诱惑。

九十年代的英国社会主义，也就是基尔·哈迪 (Keir Hardie)^① 和罗伯特·布莱奇福德 (Robert Blatchford)^② 的社会主义，就扎根于这些条件中。哈迪和布莱奇福德——愈到后来就愈加激进——脱离了有组织的宗教。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基础是伦理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的，并且从来不是革命的。如同大规模调查《伦敦的生活和劳动》的布思将军和查尔斯·布思认识到的，他们已经认识到，大量苦难处于伦理或宗教的呼吁之外，因为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表面福利生活所掩盖。他们被这些苦难深深感动了。布莱奇福德和基尔·哈迪倾向社会主义，很少是因为相信社会企业的优异经济效果，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强烈得难以抗拒的愿望，这种愿望不是仅仅寻找救济或安慰，而是把造成这种苦难的原因斩草除根，以此来消除苦难。他们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运动，这种运动主要不是要求相当富有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不再受资本主义剥削，而是要每个生活过得还不错的人来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贫穷和可怜的物质状况。

这种运动本质上并不是采取革命形式的运动。它的确能求助于对“流汗”的雇主、冷酷的贫民救济委员会和把穷人苦难归咎于酗酒和堕落行为的自以为是者的强烈义愤。它并不缺乏活力来痛斥那些听任这种罪恶存在而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权势人物的自满和残忍。但是，这些漫骂背后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好人参加并忠于争取提高赤贫者生活的道德改革运动，而不是煽动工人阶级去进行全面彻底的阶级战争。布莱奇福德和基尔·哈迪热望的就是为最受压迫的资本主义受害者得到一种较可容忍的命运——也就是

① 一次大战前英国工党领袖，是独立工党创始人。——译者

② 二次大战前英国新闻工作者，主编《号角报》，著有《我的八十年》等。——译者

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接近于工人阶级中已经取得较优裕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水平。他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要社会主义。如果后来他们由于主张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仿效马克思,他们也是意在加强最初的论据,而不是要用革命的阶级战争哲学来取代之。

然而,他们的主要呼吁必然面向工人阶级。他们只能个别地接近中等和上层阶级,希望在他们中间找到一些正义的人。但是,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已经组织在工会里,而工会运动实际上所代表的工人比每周交工会会费者要多得多。因此,基尔·哈迪特别努力把工会争取到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方面来,并使它们同他的独立工党结合起来,去创建一个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政党,保证为最低工资、最长劳动时间、“劳动权利”而斗争,总之,为在现行制度下忍受最坏的艰苦生活的那群人争取较好的待遇。现在,工会被说服了或者半被说服了,结果一些工会和独立工党以及中等阶级的费边主义者携起手来去组成劳工代表委员会。但是,它一直缓慢地进行着,直到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才使整个面貌改观。这个偶然事件就是塔夫山谷案^①,由于这一案件威胁要剥夺工会的罢工权利及其权力,它们相继跌入作为争取得到赔偿的工具的劳工代表委员会的怀抱中。劳工代表委员会变成了工党,并只用了几年的时间,社会主义者对工会的征服就似乎完成了。

实际上,远远没有完成。工会加入工党不是因为工会会员的主体转向了社会主义——不管是伦理的还是经济的——而是因为他们要一些符合自己利益的社会和工业立法,而这基本上包括在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中。然而,社会主义者还有大量的要求,在工党

^① 1900年8月,英国爆发南非战争,在南威尔士塔夫山谷(Taff Vale)的一条铁路上,曾发生一次罢工事件。这次罢工严重影响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运煤计划。罢工很快结束,但英国铁路公司向铁路员工联合会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经高等法院判决赔二万三千镑,后联合会上诉,英国贵族院维持原判。——译者

内部那些主要是由于道德的推动而去帮助“底层穷人”的人和那些主要是要帮助自己的人之间发展着一种潜在的冲突。当然，在工会队伍中也有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的确，大多数优秀的社会主义者来自工会方面。但是，工会作为组织起来的单位，在工党形成期间，既没有在他们的集体政策方面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也没有——除了半心半意以外——把那些非常穷苦的人的要求放在前头。他们对塔夫山谷案比对最低工资更感兴趣，对立即见效的改良比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更感兴趣。

这种二元论从来没有完全克服过。工会在世界事态发展的压力下比早期工党时大大地成了社会主义的。它们现在毫无困难地同意宣布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并且同意以工党的名义起草一个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纲领。不过在采取行动时，工会并没有施加走向社会主义的强大压力。矿工、铁路工人以及一两个其它团体，出于特别的动机，确实想把他们的工业国有化。但是，工会大部分组织没有施加要求公有制的强大压力，而且在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之间也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它们把加强它们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的任何措施都看得重要得多，把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取得让步看得比取代资本主义重要得多。

从伦理意义上说，工会也没有彻底转向社会主义。的确，由于失业的经历——这种经历告诉它们，失业可以把最自豪的技术工人和非熟练的劳动者一样地打倒——对失业者的要求来说，它们成了非常热心的辩护者，虽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对给予非工会会员和工会会员同样帮助的政策还是有些疑虑。但它们对最低工资政策仍然没有多少热情，因为它们主要给予工会水平以下的工人帮助，并且它们以为，这种政策可能妨碍工会吸收新会员。它们当中的一些人仍旧倾向于反对家庭补贴，这倒不是因为人口众多而收入又低微的工人家庭不太需要补贴，而是因为这样做可能干

扰已经确立的劳资谈判程序。实际上，工会主要关心的仍然是保护和改善加入工会的那部分人的地位，而不是处境最恶劣的那部分人的生活。而且他们更多地考虑的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其会员的地位，而不是争取结束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

我说这些话不是要怀疑工联主义。决不是这样。工联主义是我毕生热心的事业，并且我希望我已证明本人是它的好朋友。但是，把工联主义伪装成它不是的东西，那是无益的。工联主义主要是，也一定主要是一种工会设法使之加入其行列的那部分人共同的抱怨和共同的抱负的表现。它能够并且正在被理想主义以及利他的和伦理的动力所感动。除了主要谋求其成员的集体自我利益之外，它自然再不能做其它什么，因而只要资本主义是一营业发达的商行，它就容易表现得更愿意和现存的制度达成交易，而不那么企图改变它。

因此，一个主要建立在工联主义基础上的政党就必须使它的政策和工会的需要一致，而不是完全受工会目标的约束。它必须在其纲领中给工会所坚持的任何东西一个重要的位置，并且它不能积极地追求工会所反对的任何目标。如果它的领导者本身是些坚强的具有理想主义目标的人，那么，这些限制并不一定妨碍党的日常工作，因为工会对和自己的目标不冲突的理想主义呼吁是敞开大门的，这样的呼吁绝大部分和自己的目标并不抵触。但是如果领导没有坚定的目标和理想主义，党就会处在危险中，因为那时它容易被圈在工联主义的框框中，并且对于党来说，仅仅用少数人的呼吁来控制全国是不可能的。此外，如果一旦出现必须采取勇敢的決定去影响社会基本结构的情况，工会按照狭隘得多的目标来思考和行动的倾向可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障碍。它可能让党做些修补工作，但不会努力进行根本性的重建工作。并且在速度恰好是成功所不可缺少的时候，它在危机中可能使党的缓慢行动成为

灾难性的。

一些社会主义者看到这些困难后得出的结论是，工党以工会为基础是错误的，必须为党的活动寻找更为广大得多的基础。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个更广大的基础呢？一个办法就是从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的对资本主义不满的广大民众的呼吁中寻求这种基础，这种人今天在战争的影响下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这种呼吁的困难在于，它绝大部分必须是对个人发出的，而不是对已经组织起来的团体发出的；而在这些个人中的那个共同因素，即不满情绪，只有能为一个用清晰规划的纲领武装的运动所利用并且连贯得足以采取联合行动来达到其目的时才有建设性的价值。数不清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有着几乎完全值得赞美的思想和纲领，而这种思想和纲领是怀着炽烈的激情建立起来的，然后在几个月内或者最多一两年内它就逐渐消失了。因此，这些团体和组织是滥用理想主义的鉴诫，这可能是没有使方法和目的一致性的政治活动形式造成的。

真正的情况是，在大社会里，大政治派别仅仅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些政治派别不做动力就做阻力的话，那就必须还有别的东西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政党，不管其目的多么理想，只要打算获得权力，就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有组织的力量。伟大的自由党，在其光荣的日子里，就是依靠这样两大支柱——不信国教者以及致力于自由贸易的商界和航运界。托利党过去依靠、今天仍依靠英国社会很顽固的贵族分子和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支持自由贸易，而支持各种形式的国家保护制度。由于非国教主义派的政治利益随着宗教信仰平等的来临和宗教呼吁的衰弱而衰退，也由于更多的资本家团体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形势抛弃了自由贸易而转向赞成国家保护制度，虽然自由主义仍然是很大一部分人的个人信条，但它在政治上的力

量已经消失。

在追求社会主义的纯洁性中，如果社会主义者打算抛弃工会这个同盟者，那么，他们也就抛弃获得权力的希望，因为再没有其它能依靠的足够强大的有组织的团体了。合作象今天这个样子，作为运动是过分狭隘了，因而不能作为基础，虽然它可能是一种很有用的辅助力量。它的人数的确比工会更多；但是，大多数人对成为成员的要求看得轻得多。此外，那些批评把工会作为党的基础的人，并没有转向以合作为基础的愿望。除了他们的拥护者当中的个人信服这一基础，他们想摆脱任何基础。实际上，他们是在水中捞月。

问题的正确解决不在于敲掉工党的工会基础，而在于加强其内部理想主义成分，同时促进工联主义在更加现代化的路线上——在工业的而不是行会的基础上，以车间而不是以分店作为基础单位——进行改革。自从工党实际上停止依靠工会和那些坚持理想主义信条并设法把这种信条渗透到工会中去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者团体之间的联盟，停止把工联主义的结构和政策改变得符合其理想以来，工党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在工党的早期，它把它的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归功于这个联盟——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构成工党的社会主义一翼的独立工党和费边社的宣传人员，是在内部进行热心的服务的，而且是以一个既表达了工会的期望也表达了社会主义者的期望的政党的名义进行这种服务的。

这种令人愉快的结合需要重新建立。一些人希望通过加强各地方工党的各个会员和使他们转变为更广泛的运动中的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的代表者来重新建立这种结合。我也要求加强各地方工党，但是并不希望他们履行这个职能的限度能稍大些。各地方工党是并且必须是更多地作为选举事务管理处，而不是作为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信念的贮藏所。它们必须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党的选举

政策中得到启示，并去争取获得尽可能多的选票——这和培养社会主义者决不是一回事。此外，它们没有，也允许没有自己的不同于整个党的思想机器。任何为它们建立这样的机器的打算，都会迅速地被全国执行委员会打上标记，因为全国执行委员会从中看到一个对工会领导及对他们控制党的机关怀着敌意的区域性运动。这个观点并不错。党不能有不受约束的自行其是的地方选举事务管理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党的统一不遭到威胁，就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进党的质量。它意味着，只要不干扰党的选举机器或以党内竞争威胁党，能够做的就一定要做到。对于一个纯粹的宣传员组织来说，需要由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拥护社会主义并在人民中传播社会主义知识，但既不提出它自己的议会纲领，也不作为一个单位参加选举工作。当然，它的成员将需要进行选举工作，就象其他任何一个要党获胜的人一样；但是，他们必须不是通过专门的社会主义宣传组织，而是通过党的正式选举机器来做这一工作。

此外，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组织必须下定决心，就如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独立工党创立者下定决心那样，把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渗透到工联主义中去。基尔·哈迪和他的合作者，在那个时代不得不发动一场激烈的反对老工联主义的斗争，因为老工联主义的领导人不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且根本不相信工联主义能够作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战斗武器。老工联主义者认为在不那么熟练的工人中建立有效的组织是不可能的，并且把工联主义看作是领取颇高工资的熟练技工的有限组织的谈判机器，因为这样的工人——并且只有他们——能够付得起每周都要交的相当高的为维持有效的工会所必需的会费。新工联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理想的鼓舞下尽力反对这种排外的观念，并且由于实际上的成功而能

够证明象煤气工人、码头劳动者、市政雇员和海员等人的组织能够形成有力的联合,以及各种工人都应在工会运动内占有位置。新工联主义者还能大大地影响很多老工会的政策和组织,使这些工会更广泛地扩大队伍,或者为了谈判目的而和新工会结成联盟,或者甚至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象矿工那样。同时,行会工联主义者广泛认为,要求法定最低工资或法定劳动时间是无用的,这种老信条逐渐破产了。法定最低工资、八小时工作制和国家保证“劳动权”成了不断成长中的劳工运动的口号。

今天,工联主义在态度上和政策上都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新的革命。正如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工联主义由于再不能满足工人阶级日益发展的需要而不得不销声匿迹一样,今天的新工联主义也处于同样的境地,它创立于五十年以前,现在已经变得过时了,迫切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此外,基尔·哈迪、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①和汤姆·曼(Tom Mann)^②所不得不面对的情况和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工联主义的领导者所面临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八十年代的老工联主义的领导人不能符合新的需要,这大部分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严重经济萧条时期。在这样的时期内,对工联主义来说,向新的胜利前进是不可能的,它只能竭尽全力抓住它在较好的年代所获得的东西。那些曾经领导运动度过这样一个不幸时刻的人,由于曾不断地避开战斗或在无法避开时就遭到失败,发现要适应一种基本不同的情况是很困难的。他们已经和现存秩序的防御性合作政策联系得如此地紧密,以致他们往往不能改变其战略,就象法国在1940年要废弃马奇诺防线的陈腐军事概念一样。因此,他们把所

^①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工党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任贸易委员会主席。——译者

^②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工党领袖,著有《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宗教的看法》等。——译者

有促使工会的结构和政策进行改革的人都看作是工会和雇主之间的既定关系的危险扰乱者和不负责任的扰乱者，他们尽力阻止新思想扎下根来。

这就是工联主义现在的处境。最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发展要求工会组织采取全新的方法。但是，这些新方法和那使工会度过两次大战之间大批失业和持续萧条的困难时期的资本主义设备相冲突。许多领导人因而对于他们的需要仍然茫然无知。所以尽可能清楚地陈述这种变化的性质是必要的。如果工联主义打算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成为充分有效的武器的话，它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1) 各种高级熟练技工的数量下降了，并且高级熟练技工已经倾向于更多地成为不那么熟练的工人劳动的管理者和协调者，而不是靠自己工作的独立生产者。当然，这种情况对某些工业比对另一些工业更为适合，但是它适合于最近几年扩展的轻工业的几乎所有部门。

(2) 老的重工业、矿业和纺织工业——这些通常是工联主义的主要根据地——在重要性和雇佣能力上都衰落了；而轻便的消费工业以及办事员和分配职业却都有很大的扩展。

(3) 这些不断扩展的商业和工业只需要补充少数高级技术工人。它们主要需要的是能够非常快就能达到的迅速性、一般智力和手的灵活以及非常容易从一种工业或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业或工作中去。

(4) 在工业生产进程变得更加科学时，对技术人员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而工业中需要日益增加的那部分熟练工人逐渐不是来自手工训练的技工，而是来自技术学院或类似机构所培养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工人通常在参加工作时的年龄比手工工人大得多，他们常常拥有某种学位、毕业文凭或证明书，从而使他们把自

己看成属于中等阶级而不属于工人阶级。

(5) 过去通常主要由技术或行业来区分的生产方法，逐渐转变为更多地靠所建立的企业类型来区分。除了少数高级技术工人之外，成批生产完全不同的商品的工厂的工人之间比生产同样商品的大小工厂的工人之间更倾向于没有什么区别。例如，在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线”或奥斯汀汽车公司“生产线”上的工人转到固定大批生产，譬如无线电装置或电冰箱的部门，比转到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公司容易得多。

(6) 每个工厂，或者无论如何，每个使用现代方法的大工厂，不管它是什么行业，都趋向于存在许多对所有雇员共同的问题。而这种工厂的共同性趋向于代替老的技术或职业的共同性，只有极少数高级技术工人例外，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他们也一样。

(7) 管理成为更加专门的职业，也变得更加和所有权无关。今天典型的管理人员不是资本家，而是领取相对来说较高薪金的被雇佣者。这种变化影响了较小的兼做管理者的雇主的的态度。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认为自己有双重地位，并且承认管理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工作。这种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必须学习，而且它和其它“业务”的性质是不同的。

在工业工作中，这些重大的更替要求工会结构和政策作些什么改变呢？

(1) 高级熟练工匠的相应减少使在行业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工会更加没有可能，并且使行业工会为了继续垄断实际上不再需要高级技术的生产过程而进行的斗争成了无望的维护旧制度行动。其结果是，行业工会既失去了作为熟练工人和学徒工人的唯一代表的特点，也没有转而有效地代表主要的非技术工人，从而两头落空。

(2) 煤矿、重工业和纺织工业的衰落，把过去常常是工会运动

最先进的部分置于持续的保守和被动之位置，这必然地感染着整个运动。

(3) 不断扩展的轻便行业能够很快地学会，工人们也能轻易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这一事实要求工会的组织形式既不建立在行会的基础上，也不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上，而建立在足以包括各种行业的范围的广泛基础上。这大可说明为什么迎合这种类型劳动的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以及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扩大得那么快。

(4) 工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性的增长，要求把这样的工人组织在和手工工人紧密联合行动的协会中，或组织在迎合手工工人的工会的特别部门中。生产中所需要的技术大部分不是专门为某些具体工业服务的，因此，对于技术人员来说，恰当的组织形式大体上应包括若干不同工业的技术雇员。这就要求有特殊的方法把这样的组织和那些手工工人的组织联系起来。

(5) 组织的恰当单位以及技术人员和手工工人之间有必不可少的联系的地方是各个工厂。对于行业工会来说，把自己组织在从许多不同的企业中吸收有专门手艺的工人的分支部门里是自然而然的事；而这样的工会主要集中于为尽可能广泛的地区的手艺工人创立标准工资等级和工作条件章程，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由工会代表劳方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的现行方法，主要建立在行业劳资谈判的老式方法的基础上，这种方法是为具有同样训练形式的（例如通过当学徒学手艺的形式）同样技术的人所进行的。其结果是，车间的问题和某个工厂所特有的问题便在工会所关心的问题中降到极不重要的位置。但是，现代技术使这些问题变得愈来愈重要，对于工会来说，如果找不到处理车间和工厂问题的方法，要在工人主体中唤起强烈的忠心，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厂矿中代表劳方跟资方谈判的委员会和车间委员会有所发展，但是

只要它们要求权力或施展影响,工会领导人就常常不以为然,因为这些领导人害怕它们会使用其权力来逐渐破坏老的领导,这种老的领导所依赖的是全国和地区就标准等级和条件进行的谈判,而不是对车间问题的处理。

(6) 在使用现代成批生产技术的工业中,车间是组织的自然单位,车间组织结合起来成为工厂组织,而工厂组织结合起来又成为地区组织。熟练工匠和技术人员,除了和这些工厂以及车间组织联合以外,毫无疑问还需要建立在地区和全国基础上属于他们自己的联合,并以此代表他们自己的手艺和职业的利益。但是决不容许以这些联合的需要掩盖那种在共同受雇的基础上把包括更多类型的工人组织起来的需要。

(7) 管理作为一种职业的演变,使得手工工人、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有可能联合制定和执行改进工厂和车间组织的计划,有可能把这种形式的联合与“劳方”和“资方”就工资、劳动时间和一般条件之类的事情进行的谈判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作为管理人员不再一定需要简单地被看作是“资方”代表,而工人和管理人员作为生产组织的实际工作中的伙伴进行协作的道路已经打开。

我建议工会运动在新的条件下应当做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在做了。把很多不同企业和工业里的工人组织起来的“普通”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把工厂作为组织单位的,并且仍然有不少分支单位建立在专门企业的基础上。但是,(一)他们不包括高级熟练工人,或者说不包括那些适合于成为更专门的工会成员的主要人员;(二)大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常常发现,甚至要在一个大工厂里找个立足点都是困难的,因为较熟练的工人自然具有较大的组织能力并往往走在前面;(三)虽然他们在工厂的基础上部分地组织起来,他们却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高一级的机构,

或者说不能达到足以组织高一机构度的程度,尽管在这方面,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已大大走在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前头;(四)对于给予车间工会代表或委员会一定的权力仍持猜疑态度,甚至在为了组织上的目的而利用他们或它们时亦是如此。

其次,尽管有这种猜疑,车间工会代表运动的力量仍日益加强,并得到工会一定程度的承认。但是,(一)仍然是勉强地承认不同工厂的车间工会代表共同制订政策的权利并容许车间工会代表运动和工会的地方及全国的正式机关分离;(二)在一些地区,仍然过分倾向于把车间工会代表紧密地附在每一个行业工会上,以致妨碍他们在代表一家工厂中所有等级的人的公共组织中起有效的作用;(三)车间工会代表的职能往往受工会章程的限制太多,以致他们企图对车间民主管理的愿望施加实际影响时就遭到阻止。

第三,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在工会型的组织里组织起来,但是,(一)这些组织仍旧大都是小型的;(二)不管在工厂还是全国,这些组织和手工工人工会之间几乎不存在足够紧密的联系;(三)很多技术人员仍然对工联主义怀有敌意,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属于高级的社会和经济阶级,而且也是因为他们把工会看作是阻碍而不是促进技术进步的组织。

第四,战争使大多数生产军火的大工厂建立了生产委员会,这明显地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一)工会以各种障碍束缚生产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工作,以致削弱了他们的代表性,特别是因战争的需要,劳力从一个工厂往另一个工厂大量流动;(二)关心增加产量的生产委员会的职能与主要关心维持和改进雇佣的期限和条件的车间工会代表委员会及工会的职能究竟怎样区分,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以致生产委员会应当处理什么和不应当处理什么都成了非常不确定的事;(三)管理部门仍然一直不愿意建立生产委员会,而在生产委员会建立以后也不善于和它们一起工作,这

主要就是由于它们的职能不清楚。

于是,为了适应今天的要求,工会必须解决的第一个突出问题是,创立一个包括车间和工厂组织在内的运动以及在工匠、技术人员和主要的非熟练工厂工人之间的结构内部建立正确关系;第二个问题是,确定迫使车间和工厂的管理民主化的政策。

根据上述第一个问题,我相信,所有的高级熟练技工应当保持双重的成员身份——加入一个目的在于保卫他们的特殊利益的行业工会或类似行业工会,加入一个包括一个工业(在这里工业和工业之间区别劳动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或几个工业的总工会。矿工、铁路工人、纺织工人、建筑和城市工程工人、印刷工人以及一些其他工人大概能最好地被组织在各种工业工会里,无论在哪里,在车间还是工厂,在煤坑,在仓库还是干杂活处,作为组织的基础单位都可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在冶金、工程和造船工业中的大批工人能够非常容易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以致他们似乎只需要那在车间的基础上按类别分的单一工会,但是要包括所有的冶金工业,并且大概也包括大部分其它这样一些工业,这些工业既使用同样的非熟练劳力,也使用基本上同类型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来照管机器,进行分析和研究,设计生产方法及计划产量和技术的变换。这充分说明需要把所有工人都组织到一个单一的普通的分成工业各部分的工会里,这里要把那些劳力的区分十分清楚的工业里的工人和公共服务设施里的工人除外。

然而,熟练的工匠和技术人员对此显然不会满足。除非他们也有照顾他们特殊利益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专业协会。此外,这些行业和专业团体将需要在广泛得足以包括那些有同样技术和专业知识的人的基础上进行组织,而不管这些人是在属于“普通”工会的工业里还是在有自己的工业工会的工业里,譬如,煤气厂、矿山、纺织厂里的工程师或加入轻便消费行业的化学师。这些专业团体

自然将处理学徒和技术训练的问题,安排行业和专业的资格评定,制定管理标准、规定专业人员薪金表和雇佣的特殊条件以及处理涉及某些行业和专业的任何其他特殊的事情。普通工会和工业工会将不管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工会准备帮助实施所赞同的行业和专业标准。技工和专业人员反过来将成为普通工会和工业工会的成员,他们将和非熟练工人通力合作,去改善他们的标准和条件,并努力通过生产委员会和其它方式建立车间民主。

其目的就是使生产委员会完全代表各种类型的工人,包括技术的、行政的,也包括手工的,并摆脱联合生产委员会的观念。在这种委员会里,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代表,同意听取手工工人要说的话,而技术人员则照例被完全忽视了。这种形式的生产委员会只能起极为有限的作用。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委员会,理所当然地包括技术人员,才能成为争取工厂民主管理的最强有力的工具。

这就是我要把我试图描述的社会主义主体带到工会运动中去的那种纲领,这和基尔·哈迪以及他的同伙在半个世纪以前成功地把他们的新工联主义带到运动中去的方法是相同的。当然,反对的呐喊声将增大,就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反对独立工党的呐喊声增大一样。这呐喊声就是:社会主义者没有权利去试图影响工会政策,社会主义者的建议是空想的批评家不负责任的观念,等等。但是,这肯定吓不住社会主义者;即使他们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不能挫败他们的努力。甚至当今最坚定不移的老工联主义者也不能断言,工会运动的一切都是恰当的,因为工会运动在丢掉其主要力量所在的工业中的地盘。而且它没有赢得新的不断扩大的工业中大多数工人的忠心,没有把技术人员争取过来,并且仍然试图按照大部分日渐陈腐的行业区分来进行谈判。

很清楚,我简略描述的新工联主义,除了是成批生产的工业唯

一合适的谈判工具外，乃是最符合社会主义者期望的民主管理的那种工联主义。社会主义者知道，只要普通人在其工作时间内仅仅被当作劳力，并且终其劳动一生都不能分享任何管理之权，那么在政治事务中建立真正的民主就仍然是不可能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要求对关键工业实行公有制和管理，而对仍然是私人所有的工业也采用大量的社会管理；但是，强调的是，他们不要这两种工业中的任何一种进行官僚主义管理。防止官僚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在工业本身内部，在广泛得足以包括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和高级熟练技工以及普通非熟练工人的基础上，开展一个富有生气的负责任的社会民主运动，并把管理的重要责任委托给这个运动的代表。这些就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在工会里和为工会工作的目的，而不管工会领导人可能对此说些什么。

费边社作为参加工党的唯一全国性社会主义团体，现在处于非常孤立的状态中。我作为费边社的主席，希望该社在执行这个任务中能够起重要的作用。它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团体，它宁愿靠写作和研究探讨而不愿靠任何广泛的宣传来寻求做出贡献。只要独立工党仍留在工党内部做这个广泛的工作，对于费边社来说，专门从事其选定的工作就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既然没有人做这项广泛的工作，费边社写小册子和搞研究工作就成了空中楼阁，就不能广泛地对整个党产生所需要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如果没有别的人来做这一广泛的工作，费边社成员就必须走出去，进行广泛而深远的社会主义宣传。

但是，我能听到我的许多读者急切地发问，为什么非要宣传社会主义呢？很多人认为非常成问题的经济万应灵药与阶级仇恨及十足的唯物主义那种最不道德的教条毫无二致，那么，为什么用这种药来束缚友谊、博爱、公正的交往和使世界变得更幸福的理想主义愿望的信条呢？我希望我的读者不至完全忘记这本书里写下

的东西，以至谴责我煽动阶级仇恨或者谴责我主张他们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理论。我所拥护的和绝大多数英国社会主义者拥护的社会主义，从其基础来说是道德的，拥护社会主义是出于我们要增加全人类的幸福和公正而友爱地相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再没有别的了。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确不象半个世纪以前的社会主义倾注那么多的力量于“下层穷人”的不幸。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已经朝着减轻这种不幸做了不少事情，虽然做得还远远不够；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不迅速地整顿好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幸现在就会威胁着我们所有的人，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先驱者生活在一个似乎有强大基础的世界里，我们的世界受着随时覆灭的威胁。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拯救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拯救穷人的希望。

不管我们的目的多么高尚，我们一定要有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否则，这些目的有什么价值呢？就因为这个原因，数不胜数的曾经开出如此灿烂的希望之花的理想主义运动，如此迅速地凋谢了。它们的领导人设计了美好的改革蓝图，但是从没有问问他们自己，靠什么力量把他们的愿望变成现实。他们无益地徘徊在一块无人的政治罗曼蒂克土地上，他们拒绝承认世界并非由人的理想来统治这样一个事实，除了到他们变得从属于有生气的运动的时候。他们组织进步分子联盟，在一起开会，通过激励人心的决议，但是再没有下文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发生，因为与其说他们把车放在马前面，还不如说他们完全忘记了马。

让我再说一遍，揭露这些可尊敬的理想主义者并没有给我任何快乐。我希望他们的大车没有马拉也能行驰，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我们仅仅靠梦想或靠通过决议就能使社会更加美好，但是，我知道，我们办不到。我知道，那样的社会，象人的

童年时期一样，产生于痛苦和劳动，因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理想尽可能使用那些就放在我们身边的工具来工作。

这些工具就是男人和妇女——以及由男男女女在其环境影响下创造出的团体和有组织的联合。我们找到他们就一定要利用他们，并且一定要和他们中的那些不是反对而是赞成我们的目标的人结成联盟。我们既然有了理想，我们就必须寻找出那体现了我们部分理想——不管多么不完善——的生动的运动，并使我们的共同事业和这些运动结合在一起，否则，我们的理想仍结不出果实来。这有时是一种艰苦的训练，因为如果不把如意的事和不如意的事一起接受，不为我们非常想要的东西而去接受我们不想要的一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接受人和运动的现状。在所有的联合活动中都存在这种互相迁就的成分；当我们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社会制度处于不健全状态时，这种退让相应地就更多。

为了“取”我们能取的东西而“给”一点东西似乎是值得的时候，就是只争论次要的事情而对更广泛的社会正确和错误问题则几乎不进行实际讨论的时候。另一方面，危机的时候就是值得“给”很多东西的时候，因为不“给”的不良后果是巨大的。例如，今天在一个面临全世界法西斯统治的世界里，为了把反法西斯力量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和一项共同政策的周围而作出巨大让步是值得的。如果仅仅由于我们拒绝作出让步，使法西斯主义分子碰不到团结起来的坚强抵抗，从而能逐一地征服我们，那么，坚持一些琐事或者甚至坚持一些在别的时候可能认为是重要的事，便是犯罪的行为。在建立战后应该盛行的新秩序这一工作中，让次要的分歧妨碍所有要民主不要暴政、要富足不要垄断造成的不足作为即将到来的社会基础的人进行有效的团结，同样是犯罪的行为。

但是，需要进步力量团结并不构成模棱两可的原因。起草一个含糊不清的隐藏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的纲领，不能导致有效的团结，

而只能导致争吵和在战斗中半途脱逃。因而，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为了得到自由党的支持，用“社会管理”的含糊废话代替积极的社会化政策来接受是毫无用处的。新秩序的基础一定要么是社会主义的，要么不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在一些事情上是社会主义的，而在另一些事情上不是社会主义的。如果新秩序要部分地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就必须列举出社会主义应当在新制度的那些部分占优势——不是逐一地而是概括地指出，这样就能给那些接受这明确目标的人一个关于他们必然会碰到的问题的足够清楚的概念，并可作为制定明确而又实际的行动计划的充分基础。思想模糊不清的进步人士的政见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他们的政见实际上只是一种把一切重要的实际结果都抛弃掉的办法，也是一种缺乏制订得切实而又真正经受得住考验的计划的办法。

新秩序在某些事情上也许是社会主义的，而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则可能不是。但是，在其必需的基础方面，它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或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必然依赖或者不依赖争取富余和社会福利的计划，依赖或不依赖那些决定生产制度一般特点的关键机构的集体所有和管理，依赖或不依赖国民收入分配的集体管理，以及依赖或不依赖试图建成一种需要尽可能多的公民积极参加政治、经济管理机关和行政机构工作的社会结构。无论如何，在这些事情上，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搞“妥协”、平分秋色，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打算靠“私人企业”提供主要的刺激，我们就必须允许私人企业有广泛的一系列的自由去自行其事。如果我们靠打算控制它而不废除它来继续阻止和妨碍它，结果它起的作用必然很坏——坏到我们可能被迫把无限制的私人垄断作为一种祸害较小的事情加以恢复。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决定依靠社会服务在民主领导下的刺激，我们就必须保证民主服务精神不再受资本主义影响的阻挠。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一些服务机构社会主义化而另一些置

于私人管理之下。但是，新社会的主要动力将必然是这个或是那个，而不会是二者的妥协。在次要的事情上，妥协可能起作用；但在面临真正决定性的问题时，就不能回避作出真正的选择了。

我在本书里的论点就是，只有作为支持新社会秩序的主要动力的社会主义才适合现代世界的情况。我已经论证，选择不再在“自由的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而是在社会主义和私人垄断之间进行；我还进一步指出，私人垄断的统治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因为垄断资本主义除了靠准备和发动战争之外，不再能维持人民的就业；也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对市场、原料和剥削机会的国际性争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我已经论证，资本主义从前一度是一种扩展的制度，现在则正到处进行收缩，并且依赖愈来愈具有限制性和反社会的政策，除非在保证能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有市场这一基础上进行认真的计划，否则，将没有办法避免这种限制。我已经呼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普通工人和消费者及时认识这一点，并且不是消耗精力去保卫正在明显衰弱的制度，而是携起手来，不在旧物倒塌的废墟上而在旧秩序里那些值得保持的东西不可挽救地被消灭以前，创立一个新秩序。我也已经要求共同努力建立民主社会主义，以免我们即使避免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也是以非民主的形式强加给我们的，而不得不完全重新开始建立民主。

此外，我呼吁本书的读者，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而且也在国际规模上着手完成这项任务。我已经试图说明，作为最终的政府单位，单纯的民族主权国家在世界上已经过时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关键性的服务机构需要在比全国基础还要大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广大区域的货物交换也需要比全国计划还要大的计划；同时小国在军事上注定是虚弱的，而大国则注定要花巨额费用于军备，除非有某个比国家权力更大的力量足以阻止战争。我已经试图说明，这

些目标仅仅靠独立国家之间的公约是不能达到的，因为这些目标需要切实可靠的合作和大于国家的行政机构以及在各国人民中发展一种比国家范围更大的民主意识。

反复重申这些需要，使我又回到基本需要上来——在那些引导公众舆论的人们当中更广泛地阐明对时代的基本条件和需求的了解。对于全国的领导人来说，了解是不够的——他们也不会去了解，除非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不断地推动他们去了解。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领导的质量取决于被领导者的质量，至少取决于在全国领导人物及其主要追随者之间进行调停的少数人的质量。这些调停者乃是任何民主政体的关键人物，民主政体可能取得的成绩就取决于他们共同工作的智慧、勇气和才能。没有给这些关键性的男男女女应有的位置，是现代民主运动最大的弱点。在大约三十年前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在独立工党和费边社里可能找到这些人。他们，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在费边社里，但是费边社只有一小批追随者。过去独立工党常常为社会主义做的工作，现在简直没有人做了。遍布全国的男男女女在地区工党里正在英勇地斗争，或者正在参加希望甚微的事业——它仅仅提供给他们一种完全不符合政治现实的贫乏的理想主义。在地区工党里的工人是孤立的，他们也感觉到这种孤立。除了纯粹的竞选计划之外，没有人给予配合或指导。“希望甚微的事业”失去新手几乎象征收他们时一样快，因为这种事业不能提供什么实际的或建设性的工作让他们去做。

所以，写这本书是一种恳求，不仅是恳求更清楚地理解社会主义及其所依靠的道德和民主基础，而且也是并且主要是恳求把那些具有这种社会主义看法的人组织到争取新秩序运动的团体中去。此外，本书还恳求采取高速度行动，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为以后世代代人安排世界未来的时代。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一个伟大

转折点上,我们必须迅速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或者陷于法西斯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最后的也是最野蛮的统治形式的全球性统治下。这个世界斗争的结局,就其重要性来说,无论如何超出了自从巴士底狱陷落以来所决定的任何事情。这场斗争的关系之重大还在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时候,将把自由主义的真正成就也带到新的社会主义秩序中去,因为法西斯主义必定要把自由主义连同社会主义一起连根拔除。争取社会主义的战斗也是争取民主和文明本身的战斗。这场战斗的失败所受到的惩罚将不仅仅是被打败,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的一切希望的全部破灭。即使如此,人类大概还会再次兴起,并会再次坚持宽容、言论和结社自由、同情弱者和人人互相爱护的伟大文明的价值。但是,在即使可以重新获得象我们所知道的和享有的那么多的东西以前,也需要多少代人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我们不能让人类由于我们的任何懈怠或无益的争吵而陷入深渊。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找到将给我们力量的那种联合的方法;并且我认为,除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再没有任何我们能满怀胜利的希望在他下面团结起来的旗帜了。

费 边 社

当我把费边加在本书的书名中并敦促那些同意我的总的看法的人参加费边社时，就费边社本身说几句话似乎是必要的。费边社创立于 1884 年，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研究和教育宣传为其目的的主要组织。从历史上看，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是和对其早期的发展负主要责任的悉尼（Sidney）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及萧伯纳（Bernard Shaw）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费边社本身是一个全国性组织，设有分支机构。但是，很多主要城市的地方费边社和它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地方费边社既作为扩散传布费边社研究成果的代理机构，也作为地方调查和宣传的独立中心。费边社也和自治领的费边社保持联系，并有很多成员在殖民地和国外。就全国范围说，费边社首先是一个进行社会研究和调查的组织。它设有处理国际事务、殖民事务、经济问题、社会保险和其它问题的专门局或部门。它设有妇女组专门研究特别影响妇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它也热心于教育改革。除机关报《费边新闻》外，它还出版一种研究评论《费边季刊》和两种专门的杂志：殖民局的机关报《帝国》和致力于促进英法两国相互了解的《法兰西和不列颠》。然而，它的主要出版物是体现它的研究成果的书、小册子、传单和在社会主义宣传委员会的赞助下出版的一系列宣传小册子。这些书和小册子为所有希望明智地研究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的当代问题的人提供极为宝贵的材料。费边社所经营的书店，不仅供应它自己的出版物，而且也供应各种书和小册子，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有关的书。它经办夏

季学校、周末学校和现代问题讨论会，主持定期的社会讲演课程。希望更多地了解费边社或希望和最近的地方费边社接触的任何人，都可写信给总书记约翰·派克，下院议员，通讯地址是西南1威斯敏斯特达特莫斯大街11号(John Parker, M. P., at 11, Dartmouth Street, Westminster, S. W. 1.)。

